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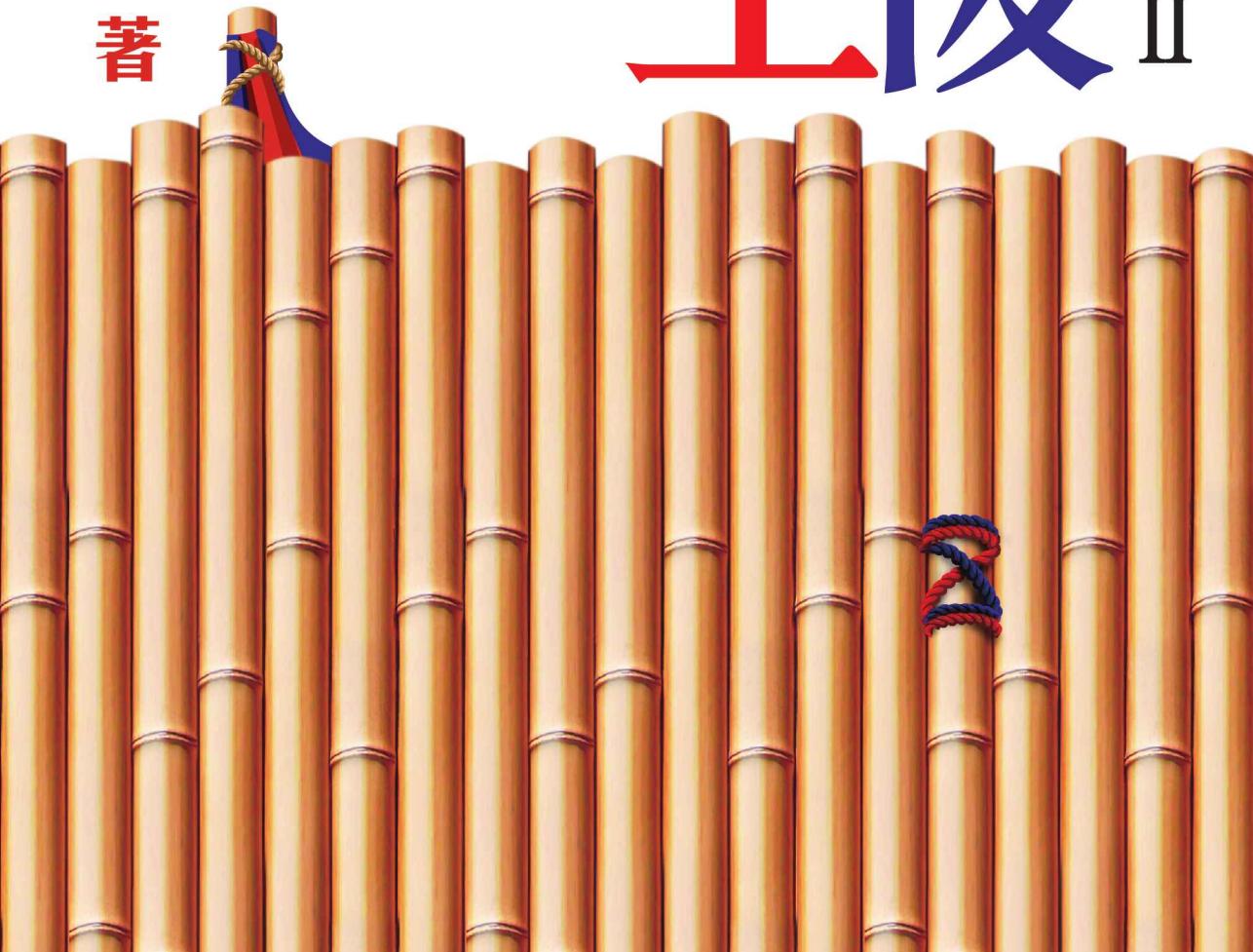


陳雲 著

光復本土，垂範華夏，
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光復本土

香港城邦論Ⅱ



打開天窗
敢說亮話

INSIGHT



香港城邦論Ⅱ

光復本土

光復本土，垂範華夏，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陳雲著

目錄

第二章

普世價值與本土傳統

第三章

傳承本土文化，扶助民間社會

序言：

006 守護香港，復興華夏

054 保舊開新：
香港的戰後重建

告別離地中產

普世價值與本土論爭

左翼的錯位，
右翼的缺席

第一章 無國可歸 回歸香港

第一

014 華夏仍未建國，
香港城邦自治

023 中國民族共和，
香港君主立憲

027 香港城邦與大國政治

031 華夏國魂，如何丟失？
香港城邦，如何救國？
香港沒本錢混雜下去

045 群體道德與主體建立

083 香港的本土價值與
確立主體性

087 華夏遺民與
香港族群的使命

092 中港區隔，
基於華夷之別

107 平等論的華夏根源：

香港的自由論與

平等論的華夏根源：

115 帝國的統治術：分而治之，
培養本土歸屬感

119 香港用社會建構，
中國用民族建國

126 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方法

136 區隔香港的民間社會

143 低下層安居樂業的秘密：
累進發展及二元經濟

154 麥理浩總督的歸化工程：
公共房屋及公費教育

169 殖民政府撤出，
香港如何替換功能？

174 重建香港的世族與士族

第四章

殖民地士族、傳統中文與文化產業

- | | | | | |
|---------------------|------------------|------------------|-------------------|--------------------------------|
| 234 | 222 | 215 | 198 | 181 |
| 復興香港文化產業，
提升庶民品味 | 香港流行文化之
興衰及教訓 | 香港的文化格局與
王道天下 | 粵語的優勢與
第二波中文運動 | 殖民地士族與
金文泰總督的
反五四運動及古文教育 |

第五章

香港大城邦計劃： 統合深莞惠， 建設大香港

- | | | | | | | | |
|----------------|----------------------|-----------------|---------------|-----------|----------|--------|-------------|
| 286 | 279 | 276 | 270 | 267 | 263 | 260 | 253 |
| 結語：香港不是霸主，而是師傅 | 香港的外環帶：
購物、水貨、工農業 | 香港本部：
高端增值活動 | 不必懼怕港獨，香港深入大陸 | 西晉五胡亂華的啟示 | 重新釐定中港關係 | 新時代的改革 | 大城邦計劃的構思與藍圖 |

序言

守護香港， 復興華夏

香港的青年人，如何發達，如何突破僵局，如何自謀發展？誤竅就是四個字：光復本土。請將本土的元素放入你的事業，你一定會闡出一個新世界。

我在一九九五年決定從德國回來香港發展，因為我在德國看到的是本土，在日本、台灣、韓國，看到的也是本土，但我在中國、在香港，看不到本土。故此，我回來香港，在一九九七年，我決定將本土放入我的事業，至今開花結果，愈做愈大，從懷舊文章、到城邦論，到組織政團、政黨，一直要做到組織香港城邦政府，締結華夏邦聯，復興華夏，解放東亞。

九七年香港主權轉移中共之初，「本土」兩個字，猶如「港獨」一樣的可怕，政府和傳媒都顧忌，不大敢用。幾年前，沈旭暉先生提出香港擁有「次主權」，被人罵個狗血淋頭；現在，我以憲政、法治、人權、國民福利、公民歸屬感的五大元素，提出香港擁有「實然主權」，半年了，沒人出聲反對。各位香港青年，我為你們開路，大家勇往直前吧。

本書承繼《香港城邦論》首部曲，回應當前政治，提煉兩大觀念，解釋香港乃至近代華夏政治的歷史現象，以此為香港締造一套建構政治主場的理論，令香港人可以有本土文化尊嚴，促成香港城邦自治，進而復興華夏的天下。此兩大觀念，第一點解釋原因，第二點指導行動。

一、離地與在地：穩健的政權獎勵在地者，所謂安土重遷，使人民安於地方自治，減輕政府的統治責任。賣國的政權獎勵離地者，驅使人民流離失所，不能植根本土而建立政治主體，取而代之。中國靠人口離地來統治，以便鼓勵跨省流動的農民工以供跨國工廠剝削。香港在九七之後，靠離地中產來成全地產套利術及姑息極權統治；左膠（工黨、民主派、左翼社運界）靠離地的新移民來討生活及取得道德榮耀，騙取選票或捐款，並勾結源自英美的世界NGO組織。

二、帝國的天下與共和國的國家：香港源自滿清時代的華夏王朝，是帝國的天下格局。中國大陸和台灣是民族共和國格局。香港包容、典雅、永續；中共排外、粗鄙、短命。中華民國在大陸原本是要消滅本土的華夏文化的，這個使命由更為兇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達成，中共在中國大陸推行黨國制度、建立新的民族語文（簡體字、普通話及現代漢語），成立一個源於一九四九年的新興民族國家——中共民族共和國。中華民國退居台灣之後，本土原住民不待它的消滅，短暫鬥爭過皇民化的閩南移民之後，國府得到本土的救贖，完成台灣民族共和國，獨立一方。至於香港，是開放的帝國城邦，族群複合，有華夏王朝的粵語漢音、正體漢字及古雅文言，外加英國語文及制度、美式辦事作風，卻不強求文化齊一。香港的使命，在於守護華夏的天下傳統，繼而推廣到華夏地區（中國大陸、台灣、澳門及華夏文化的流播區域），以邦聯的現代政治締約方式，恢復周朝的天下。

《香港城邦論》首部曲出版之後，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各方攻擊不絕。然而，香港本土及海外港僑默默支持，城邦論屹立不倒，原因好簡單：香港城邦論、華夏邦聯論是香港和華夏唯一可行的政治理論，源自先秦儒學、揉合現代政治，並尊重中、港、台、澳各自的政治歷史及文化遺留，協助華夏在大國政治之間周旋，確保生存空間，開拓發展機會。

我的政治理論的用心，出自儒家誠明之論。政治理論首先要邏輯維持一致，要誠實，不要欺騙，此謂之誠。其次，要繼承文化傳統的理性，此謂之明。這就是《中庸》的誠明之道，自誠而明。在政治理論之中，轉變理論最危險，孫中山當年的驅逐滿清韃虜轉為五族共和（漢族統制諸族的委婉詞），就是失信，就是敗筆，令民國崩潰於一統專制的共和國。毛澤東的國際主義、世界革命論轉為一國的社會主義，中途變卦，自己卻不下台謝罪，就是出賣革命理想，令共產中國崩潰，往後淪為美帝國的次殖民地，終將覆亡。台灣的民進黨的外省人論、境外政權論，後來也因為陳水扁當了他們當初痛罵的中華民國的國家的總統，民進黨被逼轉變了理論，令民進黨潰不成軍。

香港城邦論的理論是華夏天下，用城邦自治、香港與中國大陸、台灣、澳門同時自立，創建華夏邦聯，再締結華夏文化區的鄰邦和海外僑區、僑社，由繼承歷史現狀開始，經營轉化，有層層推進、一以貫之的邏輯一致性。至於華夏邦聯論，源自周朝，是華夏的文明始源，也符合現代的政治行政與國際關係。香港城邦論是經營現狀，華夏邦聯論是順勢而行。古今中外都接通了，理論就可以實踐，各種勢力可以參與而互相制衡，過程可停可進，由締約關係而定，達致共存共榮。自誠而明，吾道一以貫之。我的政治理論的威力在這裏，大家看到了吧？

香港城邦論、華夏邦聯論並非忽然而來的新思想。一九九五年我從德國回港之後，用了五、六年的時間，思考香港自立自治的前途及復興華夏天下之路，文章收入《一國定兩制——黃老道術與香港政治》。原本只是著述思想，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以待來者，如明末遺民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然則，香港情勢危急，政黨驕慢，平民無依，於是將之化為城邦論、遺民論及邦聯論，如道教之「一氣化三清」，並親自組織政團宣揚，掃蕩阻礙。人之機靈，人之志氣，遠在意料之外，這是人的高貴之處。有多少擔當，就有多少能力。假若我不毅然出山，擔負守護香港、復興華夏之大任，也不過是學士一名。

故此，各位香港同胞，不要灰心喪氣。人有了志氣，可以頂天立地，民眾有了志氣，可以戰勝一切。

陳雲

序於香港沙田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夏曆甲午年正月十五日寅時
西元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一· 陳雲：《國定兩制——黃老道術與香港政治》，香港：花千樹，二〇〇七年。

第一章

無國可歸，

回歸香港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華夏仍未建國，
香港城邦自治

中國民族共和，
香港君主立憲

香港城邦與大國政治

華夏國魂，如何丟失？
香港城邦，如何救國？

香港沒本錢混雜下去

群體道德與主體建立

棋局已成，天下大定。反共、復漢（華夏文化復興）、抗秦（放棄秦朝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興周（以邦聯制度及聯邦制度恢復周朝天下）。香港之憲政，華夏之共和，必經城邦與邦聯之路。三年五載未必成事，但華夏之復興，必循此路。

陳雲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四日 面書留言

(一) 華夏仍未建國， 香港城邦自治

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誰更似國家？同大家講一下道理，大家便知道為何中共這麼忌憚香港的雙普選。香港有憲政、法治、公民權利、國民福利及本土族群歸屬感，但中國一樣都無。香港

依照《基本法》，有了雙普選之後，香港等同一個國家。北京的權力只限於軍事保護和外交代表。但香港在現實上，容許美軍軍艦駐留，而且香港對外談判和簽訂協議，可以獨立進行，香港從不需要過北京的外交代表，反而香港的國際優惠地位，受到美國政府的《香港關係法》的間接保障。為甚麼會這樣的呢？因為：香港在九七之前，已經是一個自治城邦，《基本法》只是承認並且用憲法的形式肯定這個現實。這是北京千方百計要阻撓香港普選的原因，也是千方百計要人大釋法的原因。但這些都是徒勞的。

上述的五個建國元素：憲政、法治、公民權利、國民福利及本土族群歸屬感，是構成現代國家的必需元素。香港都有了，但中國一樣都無。然而，香港不能自外於中國，香港必須要同時與華夏四邦——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同時建國，彼此締結盟約，建立華夏邦聯，化解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單一體制和蘇俄的黨國官僚行政，化解中國秦朝的一統獨裁制度，恢復周朝的仁政天下。華夏邦聯之設，也令到香港的建國衝動得到安頓，歸入華夏，而且令到《基本法》的年限危機得到化解：二〇四六不是香港自治的死期、大限，香港在城邦論和邦聯論的運動之下，擺脫殖民控制，解殖歸華，港人恢復國族忠誠、本土忠誠，華夏一家，將來獲得的自主權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以華夏為國，以香港為家。《香港城邦論》，不得不寫，是因為國破家亡。你當香港是個國際金融交易場，是本地財閥的金錢展覽廳，是大陸豪客的銷金窩，是個水貨之城、跳板之市，當中國是國際大租界，攻城略地大家做買賣，得錢之後捲逃美國，你一切不上心，在中國在香港作異鄉之客，我是不激動的，清朝覆亡之後，中國無一日不是如此。但中國人、香港人那種處於被人瘋狂剝削與掠奪之中的無奈與苦痛，我是感受得到的，必須做一點事，逆轉沉淪，起死回生。

可笑的中國

中國的高層，由一群賣國賊組成。香港的高層，由一群賣港賊組成。華夏仍未強大，是因為未能建立合適的國家制度，故此無法愛國求榮，只能賣國求存。香港也是。為甚麼這群主政的人要賣國、要賣港？因為他們從未擁有這個國、這個邦，只能好像轉口貿易一般，留在自己手上的時候，盡快找到一個買家，談一個價錢，將貨物出賣。親英的羅德丞如是^二，親華的司徒華如是^三，看風使舵，首鼠兩端。

香港在中國邊陲，香港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後遇到的問題，源自中國，多於源自香港本身。中國的大問題，是中國仍未是中國，既未曾以憲政分權，建立立法統，更未有文化立國，建立道統。十三億人圍攏一起，裏扒外偷，夾帶私逃，不知自己是誰。

中國有國家體制（黨政軍合一的黨國體制），但無國格，更無國魂。開放改革之前，中國是脫離蘇維埃的共黨殖民統治機器，所謂黨國體制。中共建國初期，承諾給平民的是庸俗的生活幸福感——來自暴力掠奪的物質佔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衝鋒式的產業衝動——抓革命，促生產。物質佔有與產業衝動，就是共產中國的建國目標。這令到中國成為可笑的國家，衝動、狂妄、幼稚。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是以文化建國的，故此它無國魂，不能國格獨立，只能東張西望，尋找盟友或勾結者，以前是輸出革命，追求國際主義或世界社會主義，現在是輸出工業品和資本，購買美國債券，追求全球化交易、全球資本主義。共黨不以國族建國，故此中國墮落到今日，成了無家無國的利益掠奪者及被掠奪者的集合體。共黨統治六十年，無法發展出一套現代的國家核心價值，全國信守。中共健在，中國是美國霸主的砧上肉；中共滅亡，中國是美國霸主的階下囚。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二〇一〇年。

二一 羅德丞（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出自香港望族，乃香港富商何東之外孫，英國政府扶植為行政局議員、立法局議員，權傾一時。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主權決定移交中共，羅德丞辭去其兩局議員職位，與英國決裂，投向中共。「六四」屠殺之後，羅德丞赴京見中共總理李鵬，成為六四屠殺後，第一個與李鵬握手的港人。

三 司徒華（一九三一年至二〇一一年）出身於中共的學友社，組織教協及支聯會。六四期間，協助英治政府遏止香港罷工及暴動抗議，而二〇一〇年，司徒華帶領民主黨杯葛五區總辭之香港變相公投決議民主的運動。

建國精神，從何而來

中國在清末討論過地方分權，在民國初年經歷軍閥割據、聯省自治，然而孫中山先生毅然決定北伐，用單一體制的民族國家來接收滿清王朝的滿蒙帝國，用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生硬地將漢、滿、蒙、回、藏五個大族，拼合為所謂中華民族。其建國參考，是歐洲的民族國家建立運動（nation building），當中德國是表表者。

德國，特別是希特拉第三帝國時期，是民族國家的極致。統治精英集團廉潔奉公、剛直守法，平民誠實、紀律、勤奮、順從、公正虔誠、實際、勇毅，並高舉國族尊榮。這種所謂德意志民族精神，來自普魯士，但普魯士並非民族國家，而是封建諸侯國的聯盟。交往三十年之後，具有選舉權的諸侯選舉普魯士大公國的公爵為國王。這是一個領土割裂而不相連的領域，民族為一半日耳曼、一半斯拉夫的混雜人民，波蘭人可以成為普魯士人民而上升為官員，執政集團為教養嚴謹而自我克制的地主子弟，守獨身主義、信奉基督、教育良好，稱為容克集團（Junker^四），猶如士族，人民以國家利益為重，然而國家確是虛無縹渺的臨時聯盟。

理性開明的和平弱國

有國家理想卻無國家可以效忠，崇尚理性而寬容，信任開明的權威官員，當時普魯士成為歐洲受迫害者的避難所，雖然生活刻苦，但有窮人的美德和宗教的寬容。普魯士只打過幾次小仗，大部分時間是平庸的和談與諸侯結盟。普魯士是十八世紀最有現代精神的國家。它是諸侯國的結盟，但有商人城邦的開明與寬容。普魯士人是具有歐洲情懷的德國人、世界公民和人道主義者。這是十八世紀的光輝。

十八世紀之後，進入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時期，普魯士先被拿破崙擊敗而被法國統治，後來成為梅特涅（Metternich）的歐洲體系，最終成為德意志國的一部份而被消融。普魯士的死亡，是由於它想肩負起德國統一、成為實體國家的使命。德意志的美好一面來自普魯士，但德意志的侵略性和高傲，也抵賴到普魯士身上。德意志成為民族志氣高昂卻排外的民族國家：波蘭人樂意成個普魯士人，但波蘭人不可以成為德意志國的國民。

四・ 德文Jungfrau的簡稱，年青地主的意思。

德國史學家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撰寫的史論 *PreBend ohne Legende*^五，書如其名，就是將一切加諸普魯士身上的傳說撕破，還回普魯士的本相——一個崇尚理性自由、由具有科學理性和基督精神的官僚統治的鬆散聯盟。

中華民國的建國精神

讀哈夫納的普魯士史，令我感觸不已。普魯士變成德意志，就如秦國變成秦朝，春秋時期開明的秦穆公變成戰國末年殘暴的秦嬴政。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七代君主開明，廣納賢士，人民敦厚而剛勇，國家富強，技術先進。秦國就因為嬴政有統一天下之志而變成秦帝國，將秦人的美德變成暴行。西漢賈誼在《過秦論》總結秦朝的敗亡原因，是不識得分別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戰爭時期是獎勵軍功，「明恥教戰」，但和平時期必須廣施仁義之政，方可長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普魯士的國家狀態，也像中華民國，國土支離破碎，文士充滿理想、文化寬容但國力荏弱，然而中國經歷日本侵華而終於被共產帝國取代，民國政府被驅逐到台灣，成為長期的偏安政府，民國面向世界的大愛美德，與憨厚而帶點狹隘的台灣鄉土情感結合，成為今日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然而，草創時期的中華民國是

兼備傳統儒家天下及現代基督國家的美德的，也繼承了明遺民的復漢意志和周朝道統。它始終會是華夏以民族文化建國的藍圖。當代中國要前進，必須回復到中華民國的建國美德。

中華民國的憲法精神調和了儒家仁義及西洋啟蒙時代的人權，志氣好大，但民國志士執迷於理性管理而不理傳統社會得以延續千年的合理之處，也不願意地方聯省自治或全國推行聯邦制。在公共行政方面，民國用的是歐洲單一民族國家的體制，採用歐陸成文法，以法治代替禮治，官僚的公共行政權力（公權力）代替士族傳統，行政不尊重禮俗，而且經濟政策也有頗多空想社會主義成分（如平均地權之議），只是欠缺時間證明其失敗，但民國破除傳統的做法，確是為共產主義驅除障礙。民國政府一樣有法西斯傾向，然而一九四九年遷台之後，遇到本土閩南民間社會的團結來制衡，法西斯性質的官僚理性主義發揮不了劣性影響。^六民國遷移到小小的台灣，在當地用單一民族的方式來建立國家，規模容易處理，遇到的本土障礙，也可以順利適應。台灣的本土鄉社力量，日本殖民教育形成的遺民群體——台灣本土的士族，乃至美國的政治輔導，補救了民國的國家統制的缺陷，可以說，台灣救了中華民國。

五 德文：除去傳說的普魯士。地道的漢譯，應是「普魯士之本相」。
六 二二八事件，就是國民政府的國家統制力量，受到閩南和原住民民間社團力量的反抗。

至於在一九四九年佔領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蘇聯在中國的蘇維埃殖民分支，具備了一點蘇維埃紅軍的美德——平等、儉樸、團結，然而這只不過是普世的軍團精神（regimental spirit），恰如普魯士的騎士團（Rittertum）精神，但共產中國卻缺乏了自己的、在地的文化內涵，例如普魯士的基督信仰和條頓民族精神。故此，中共是無法以文化建國的，無法在自己國土上自主自立的，它只是一個不斷擴張的軍團，一個官僚利益集團體系。它只能寄生於大國——先是蘇聯、後是美國，它不能獨立生存於世界。它見不到人。不斷擴張的軍團——即是黨政系統無限伸延，是不可能的。黨政集團必須要有人來實踐統治。共產中國承諾給人民的是毫無精神內涵的物質富庶。到了開放改革和走資時期，幹部的紅軍精神沒落了，平民瘋狂追逐物質。這就是今日的中國。

以此觀之，共產中國是沒前途的，它的前途就是腐朽和衰敗。要復興中國，只能「大政奉還」中華民國，與在台灣偏安的中華民國政府協商，將中華民國國體和憲法歸還回大陸去。台灣成為主權具足的台灣共和國，與中國大陸的新政權、自立後的香港和澳門，共同結成華夏邦聯^七。將中華民國復興在大陸，可以避免

(二)

中國民族共和， 香港君主立憲

帝國的悲劇，因為帝國已經被共產中國消耗掉了。恢復的中華民國，將與台灣、香港和澳門建成邦聯，這是我在《香港城邦論》的華夏建國藍圖。我在本書改用「華夏邦聯」一詞是要避去「中華」的中國觀念，華夏不限於中國本土。

錦繡中華，何以盡在香江？香港為何保存更多的王朝文化？而王朝文化竟然又如此容易與現代文化接通？中國毀壞傳統文化，得來的卻不是現代中國，而是飄蕩之國？

民國初年，更改曆法，改換正朔，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於一九一四年仿倣日本，更換曆法，將夏曆新年改為「春節」，端午、中秋、重陽、冬至，依次改稱夏節、秋節及冬節。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政府厲行文化革命，將西洋的

七：從城邦論到邦聯論的進程，見本章的後部。

八：此節的後部，改寫自《香港遺民論》的序言。香港次文化堂二〇一三年一月出版。

陽曆稱為國曆，西曆一月一日稱為「元旦」及國曆新年，將王朝中國的夏曆年初一稱為「春節」。夏曆稱為「廢曆」，政府禁止國民慶祝舊曆節慶，強迫在舊曆新年期間休業的商店，開門營業，並將元寶、酒茶及供祀果品搗毀，並處以罰金。一九三〇年，民國政府頒令，要將夏曆新年的賀年風俗、祭祀及慶典，改在西曆新年舉行，原本的舊曆新年假期取消，並且禁止售賣西曆及舊曆的對照表。

然則，北京千里之外的英國殖民地香港，西曆新年與夏曆新年並行，名稱並用，夏曆新年通稱「農曆新年」，過年風俗絲毫不改。夏曆的曆書（通書、俗稱「通勝」）不單不禁止，而且大行其道，風行南洋及美加僑社。香港出版的曆書更是中西曆法並列。

民國政府與香港政府的作風，兩相比較，大家可以覺察民族共和國與帝國君主立憲之不同。民國是破舊立新，新舊禮制勢不兩立；香港是保舊開新，新舊禮制並行不悖。

要認識這個問題，必須要將英治時期的香港，放在華夏的現代史上看。香港是華夏地區唯一用傳統漸進方法進行現代化的地方^九，香港在一八四二年跟隨現代化始源國英國來進行現代化，這裏保存了華夏的精銳，也示範了華夏如何現代化。香港（一八四二年——）走

的路，與中華民國（一九一一年——）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截然不同。香港跟隨的師父是英國，中華民國跟隨的師父是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跟隨的師父是蘇聯，而且中途變卦，土法煉鋼。此後，三地命運迥異。

香港與中國大陸不同，是由於香港有不同的現代性（modernity），源自英國漸進改良、官民合作而致的現代化，與大陸的國家統制式的現代化不同。英國尊重傳統文化和傳統社群，在需要的時候也願意改革，保舊開新。這與法國的破舊立新，大相逕庭。由於英國的殖民統治，帶給香港不同的史觀及文化視野，例如中國大陸的人喜歡單一體制的大一統，香港市民則認同自成一國、各處鄉村各處例的地域特殊性。

滿清末年，嚴復以官學生的身份留學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回國之後主張滿洲全盤仿效英國，及後，康有為、梁啟超輔助光緒帝仿效英國及日本維新，可惜功敗垂成。英國的帝國體統、君主立憲和普通法制度，本來就是適合華夏社會的，只是滿洲的立憲失敗，於是志士先後仿效法國的革命及俄國的革命，令中國走上歧路，乃至絕路。

九 · 這是指出八四二年至日本太平洋戰爭時期（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的一百年而言。然而香港在戰後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現代化頗為急遽，八十年代至一九九七則是另一個急速攀升期。

自一八四二年，英國佔領香港建立殖民地，滿清末年，企業家、文人、官員蜂擁來港避難，帶來人才、資金和業務關係，香港開展城邦自治的歷史。其後，大陸走向共和國，香港則是君主立憲之下的城邦，走的是與大陸迥然不同的另一歷史進程。英國殖民官也有此意識，於是香港不鼓吹白話文，反而聘請前清翰林賴際熙等人在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復興古文教育，促進國學研究，戰後官定廣東話為華語交流語，不在電台及學校推行國語，殖民官和人類學家考察鄉間，將宗社規章化、法制化，促使祠堂、祖業與廟宇以現代之規章公營化，風俗得以保存久遠。英國殖民官與鄉長一道祭祀天地神靈，殖民官的行為，一如滿清的儒官。華人社會賢達獲英王賜封爵位，獲港督提拔為議員，猶如漢王朝察舉賢良方正。華夏遺民寓居香港，託庇於英國統治，就好似清朝君主立憲和採取英國制度的歷史補償版。

小小的英帝國，統治龐大的海外殖民地群落，好似周朝統治天下。《孟子·公孫丑》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語譯：「用武力而假借仁義的，稱之為霸，故此稱霸必須是大國。用道德而實行仁義的，稱之為王，稱王不一定是大國——商湯王只有方圓七十里地，周文王只有方圓一百里地。用武力使人歸服的，別人並不是真心順從，只不過是力量

不夠罷了；用道德使人歸服的，是心內喜歡而誠意歸服，就像七十個弟子歸服孔子那樣。《詩經》說：『從西從東，從南從北，無不心悅誠服。』說的正是這種情況。』

英帝國統領殖民地，靠的是文化優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香港的經濟增長超越英國，但英國仍然領導香港政治。以文化優越、禮樂端正而統治藩屬，使其心悅誠服，就如周朝之王道統治；靠軍事壓迫和經濟勢力來欺壓藩屬，令人氣憤難平，就如秦朝之霸道統治。此中的王霸之別，豈非儒門之教？

(三) 香港城邦與大國政治

香港介於中國和美國之間，四戰之地，無法逃避大國政治，故此香港不能自己獨立，必須中、港、台、澳結成華夏邦聯。新加坡可以在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西亞聯邦之後獨立，不必理會馬來文化的問題，但這也令到新加坡無法成為文化大國，只能用經濟利益與鄰國交易。新加坡的意外建國，其實是個大災難。李光耀也知道的，新加坡如果不是被逼獨立，李光耀就可以做到馬來西亞的總理。新加坡的前途暗淡，香港必須引以為戒。假若香港貿

貿然獨立，我們要用幾多公帑來賄賂鄰國及列強，要讓出幾多香港利益，甚至要被中國或美國來名正言順殖民統治，香港才可以苟存於大國之間的夾縫？

香港應該高舉華夏文化，並且將英美價值納入到香港本土價值，目的就是要在文化及制度上帶引中國，再交換經濟利益。香港必須要有大中華視野，因為這是香港的現實政治，香港必須與中國大陸維持良性互動關係。相反，泛民那些所謂大中華，他們只是高舉西方的自由人權，除了幫助中國重新革命建國之外（泛民也不會！），毫無現實政治意義，只會被中共當作親美力量來排擠或利用，借力打力。

香港目前一些青年人或評論人（如黃世澤）的港獨建議，一味取法於新加坡，著眼於國防而忽略邦交。新加坡不怕擺出好戰姿態，無懼於與鄰國交惡，因為新加坡的鄰國不是大國，也不是同一文化源流的國家。香港的國際環境不是這樣，中國、日本都是大國，而且文化源流接近，香港最佳的策略是城邦自治，區隔中港，恢復華夏正統，帶引中國前進，中國大陸的人聽不聽教，是他們的造化，但教導權、華夏文化的話語權掌握在香港手裏。香港文化在對大陸輸出的時候，也得到強化和更新，當然輸出地區也要重新開拓南洋華人和海外華人地區，搭成華夏文化的世界橋樑。這是《香港遺民論》⁺的精髓，也是香港參與大國政治、世界政治的踏腳石。

把中國圈禁起來，任由中國崩潰，並非良策，因為中國擁核子武器，而且經濟總量龐大，牽連鄰國甚廣。良策是提攜中國的文化復興，中、港、台、澳四國締結邦聯，拉攏鄰國加入（先是越南、朝鮮、新加坡，後是日本），維護東亞繁榮穩定。我的城邦論、邦聯論與遺民論必會成功，就是因為令地區得到最大裨益，而不是互相攻伐。而這一切，以香港為中心，以華夏為本體。本來帶領華夏前進，台灣也有力量，不過台灣去中國化，自廢武功，現在輪到香港了。台灣的盲目去中國化，不單止違反文化進程，也令台灣丟失文化領導權。民進黨人也許後悔不已。

香港假如放棄用華夏文化身份來融合中國大陸和周邊的儒家文化流播區，破門出家，孤身投靠美國外強，取得國防援助，終被外強殖民，去中國化，不得超生。台灣今日就是如此，進退失據，動彈不得。台灣即使接受美國協防，但美軍之馳援並無保障，台灣國防虛有其表，而且在中國逼迫之下，邦交空間狹窄。新加坡的立國由於缺乏國族基礎和傳統文化，無法以文化統治。不以文化建政，而是軍事建政，只能走向殖民統治。沒有文化基礎，沒有文化維新，對內用官僚機器威逼利誘而行，對外靠美國掩護。

十 陳雲，《香港遺民論》，香港：次文化堂，二〇一三年。

在參與國際秩序的國家文化體系之中，有歐美體系、阿拉伯體系、俄羅斯體系和華夏體系，它們是無法結合的，只能維持友好合作。香港的發展模式，有三個選擇：新加坡、以色列與瑞士。香港要走的是瑞士模式，以優秀的金融制度和商業服務，輔助中國經濟發展，並以豐厚的華夏文化，輔助中國大陸的文化建設。香港某些港獨派的人，主張走的是以色列模式。以色列是美國安插在阿拉伯的文化敵對陣營裏面的。華夏文化並不是美國的敵對陣營。香港也不是有美國根基的猶太民族在內撐持，香港自己充當以色列，好像台灣那樣做美國的不沉航空母艦，是自討沒趣。

香港制度和文化，香港的重建過程，對於中國大陸，有莫大的參考價值和模範作用。英國人在香港建立現代文明，也在難民社會之中重建民間自治社會與華夏正統文化，輔助香港成為華夏地區的現代城邦。目前，大陸在中共統治六十多年之後，已經變成流離失所的難民社會，香港在英治時代的文化重建，對大陸有垂範作用。香港的文化立邦，輔助中國的文化建國，這是儒家的內聖外王、推己及人的理論。香港將因為這個功能，而得到發展和競爭力。香港靠的是文治的能力，不是武功（軍事力量）。那些整天在說香港要建立國防之類的，是笑話了。

(四)

華夏國魂，如何丟失？ 香港城邦，如何救國？

香港源自華夏，城邦立命，要由周朝開始，故此必須正本清源。城邦之神聖道統地位奠定了，方可以號令天下，流傳萬世。民主只是毫末操作，缺乏神聖的國族信仰，民主制度令社會「上交征利」，飄忽不穩。

中國文明早開，王朝之中國，獨步世界，然而亦因為文明早開，在現代時期，遇上歐洲及日本之民族國家，手足無措，匆匆廢君主而建共和，王權失落而禮制崩潰，士族凋零，現代化之解魅（disenchantment）過激，致令中國丟失國族信仰，為蘇俄共產主義佔據民族心靈，舉國蠻野無文。

朕即國家，在民權時期，這句話惹來人民對君主的鬥爭，在民族建國時期，這句話，令人惋惜：象徵國族的王，無處尋覓了。日本之王室萬世一系，王權有時旁落於幕府，但從未有革天命之事，是故日本以君主立憲建立共和國，只須排除幕府，尊王攘夷，舉國臣民即可歸心。歐洲王權由貴族自王侯世家選舉而來，天主教盛行之後，君王由教宗或大主教加冕，雖然殺戮頻仍，王權之血脉仍可追溯久遠。共和國體制盛行以後，君主立憲國行虛

君與內閣大臣之制，共和國行總統制。君主立憲國之王族，如英國，則勇武衛國，身先士卒；如瑞典、荷蘭，則刻苦自持，德為世範。即使共和國總統也向上帝宣誓，執政黨也多高舉基督教信仰，執政世家（如美國之甘乃迪家族）也仿效貴族，擔負邦國，濟世為懷，是故，西洋、東洋之神道不滅。即使經歷文藝復興及現代之解魅，也有相當成分遺留，堪為國本。

由天命到民命

華夏之王權，由堯至舜，天命與聖德並重，以禪讓而非血脈相傳，夏禹治水有功，得舜禪讓王位，也得天賜予統治大法——洪範。夏傳位於其子啟，開始帝系血脈相傳。夏桀無道，成湯伐夏，奪其王位，謂之「湯武革命」，自此華夏帝王可以由革命而來，革命的結果是攻伐者取代王位，卻不是由貴族推舉君王。春秋末年，孟子論斷，夏桀喪失天命，不再是天子，只是一夫，故此成湯誅殺無道，並非弑君，而是革其天命。商紂無道，西伯侯姬發攻克，成立周朝，是為周武王。姬發攻打商朝之際，在諸侯義軍面前演說，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天將用我們人民的眼去看，上天將用我們人民的耳去聽），將天命與民命等同。^{十一}商朝遺民箕子認定武王有聖德，向武王講述「洪範」。^{十二}成湯乃大貴族，革命之後可以安居王位。西伯侯乃小貴族，得王位之後，商朝遺民仍在，四方諸侯環伺，周武王必須制禮作樂，鞏固王權，並以文治教化天下。制禮作樂，由周公

(姬旦)而行。周公作詩，歌頌文王聖德（《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語譯：文王神靈上升天，在天上光明顯耀。周雖是古老的邦國，承受天命建立新王朝。這周朝光輝榮耀，上帝的意旨完全遵照。文王神靈升降天庭，在上帝身邊何等崇高。……）

周朝以虛君之位，而欲行實君之權，雖然分封天下，乃至於「興滅國，繼絕世」，然則中土幅員有限，諸侯攻伐，擁兵自重，多有僭越禮法而欺君之事。春秋之世，禮崩樂壞，即使商朝遺民孔子呼籲克己復禮，也是徒呼奈何。秦嬴政統一六國，二世而亡。劉邦克服楚國貴族項羽，以庶民之身，取代秦朝，登位為王，劉邦既非貴族，只能廢除封建，起用文士，以復興周禮及神道設教的方式，鞏固王權，奠定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華夏道統。道統由士族弘揚，士族上升則為世家，下降則為遊俠。

歐洲之國族精神在貴族世家的尊貴責任及皇室代表的國家靈命及莊嚴禮法，華夏之國族精神，在士族與遊俠。士族匡扶天

十一、其事記載於《尚書·泰誓》。此章疑為漢唐之際的偽作，但當作後代帝王之自我榮耀其天子道統，仍可作準。

十二、《書經·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下，遊俠捨身從義。士族在廟堂，遊俠在江湖，前者主政輔教，後者急公好義，華夏精魂，賴以不墜。

禮教失常，華夏沉淪

華夏士族精神之失落，與民國之後的古文教育丟失有關。中國近代之敗亡，是由於現代學校由商人贊助或控制，走向科學、工業及商業技術教育，丟失華夏的士族傳統，於是我們今日見到在中國政壇及香港政壇的，不是士族，而是工程師、會計師、律師這一類專業人員。

清末，西學第一人嚴復留學倫敦，駐英公使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對其古文修養頗有微詞，嚴復回國之後，即拜曾國藩之弟子、桐城派古文大師吳汝綸（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三）學古文。中國在清末設立第一家大學——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講學，此乃華夏現代教育之始，桐城派吳汝綸在大學堂主講，謂然而嘆，曰：「本意謂中國書籍猥雜，多不足行遠。西學行，則學人日力，奪去太半，益無暇瀏覽向時無足輕重之書。獨姚（姚鼐）選《古文辭類纂》，萬不能廢，以此為學堂必讀之書，中國斯文，賴以不墜。」嚴復進修古文之後，用秦漢文體編譯《天演論》，接通古中華與新西洋。同期，林紓用活潑通俗之古文及明清白話，翻譯西洋文學作品。此際，華夏雖經歷滿洲異族統治，然而斯文仍在。

民國創立，新舊士人並用（如蔡元培即為前清進士），前朝留下的世家大族、鄉村士紳猶在，雖則推行新式教育，然而啟蒙讀物、國文教本仍有古文及詩詞，也遵從古訓教學。民間市井，戲曲、唱本、謠諺傳承如昔，《水滸》、《三國》，《隋唐》、《說岳》，不絕如縷，似斷非斷，電台、電影之流行文化，往昔英雄兒女與新派社會奇情並立。民國政府治下，縣官、里長、鄉長及村中紳士，體統雖不如王朝時代，仍有舊學根底及仁義氣節，即使後來之軍閥，也有若干家學淵源，可以掌政一方，如往昔之王侯大吏。

及至中共統治大陸，掃蕩士族，殘殺地主鄉紳，逼死僧人道士，淘洗滿清遺老、民國遺官與新進知識分子，口謂推行平等，事實則陷舉國於俄羅斯土匪軍痞革命政權之野蠻。中共屠殺士族之前，威逼他們當眾自我否定及供認罪行，在精神上虐殺華夏道德。蒙古屠殺南宋士人，只是一刀了斷，故此中共之遺禍民族，百倍於蒙古！今日大陸之道德淪喪，乃亘古未有。同時，中共也摧毀傳統文化與道德之載體——土地私有制度和傳統基礎綏結（primary ties），充公全國土地，毀壞世家產業與士紳莊園，用黨支部組織取代傳統的親族、師徒、學黨、僧團、行會，將傳統宗法組織連根拔起。

十三

類似德國古典社會學家Gemeinschaft觀念。參閱Tönnies, Ferdinand.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Leipzig: Fues's Verlag, 1887.

二十世紀改革開放，中共急忙引入美式全球化集團經濟，投入國際金融大循環，而不以細水長流之民間鄉鎮農社及企業復興中國。共黨之野蠻不文，遇上美式普世物質主義，大陸之文明，頽然墜下。致令今日出國之大陸人，狼奔豕突，大呼小叫，穿戴國際名牌而不知廉恥為何物。

中國救亡，始於香港

香港由於託庇於英國，可繼承英王之君王典範，海外殖民官集團也類似華夏之士族，以邦國為己任。此地之世家大族，也刻苦自持，慈悲濟世。

中國要救亡，要兩路並進，兩條腿走路：憲政立國與文化立國。兩者可分，然而總是扭結一起，分不開的：中國不能憲政立國，就是因為中國未曾文化立國。憲政講求命運共同體之建立，全民信守核心的國民道德與國家精神，以此化成憲法，而此現代國家式的道德與精神，必須是多元一體的，國民個體的人格獨立的，故此須要權力分隔——以三權分立及地方自治來運行。權力分立及地方自治而又彼此團結，需要的是源自歷史傳承的國族文化。

憲政立國與文化立國，兩條路的起點，都在九七之後的香港。

香港在九七之後，憑中央與地方的立約——香港《基本法》，成為共產中國憲政的起步點。比起中國，有了《基本法》的香港，在實施雙普選之後，更像一個國家。只要將香港的普世價值變成結合華夏文化的本土價值，香港發展出自己一套全民信守的道德信念，以及發展出一套政府守持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香港就是一個國家，而中國卻甚麼都不是！自由民主的英國，培養香港成為自治城邦，是順應二戰之後的國際趨勢，也是英國的國家榮譽；但中共被逼依照《基本法》扶立一個雙普選的香港，卻是闖出大禍！這是令中共憂心忡忡的事，也是中共一直千方百計要阻撓香港雙普選的根本原因——防止香港萌生本土意識，防止血管出現建國衝動。香港建國並非由於龍獅香港旗，而是由於雙普選催生本土政府，以及中港衝突之中見到大陸人的嘴臉而刺激起香港人總結核心價值（soul searching）與肯定香港人的族群身份（self assertion）。這是實實在在進行着的建國運動。

中共目前的解套方法，也是怠惰的、不思進取的方法，就是阻撓雙普選，並向香港輸出資本和人口，操縱本土經濟及議會選舉，在香港行使惡性的殖民統治，在香港掀起劣質的族群鬥爭。雖然而歷史進程是阻擋不了的：中共的阻撓與干擾，恰恰就促進了香港的建國運動，而且將它推向非理性的、無可逆轉的叛離方向去。馬克思的辯證法，共產黨現在幾乎無人識得。

未完成的「香港計劃」

諸葛亮《後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漢是華夏本土，賊是中共或美帝殖民霸權。香港城邦論是以城邦的過渡狀態，調和香港人建國運動的衝創意志（尼采的*Willen zur Macht*），導正民粹，使香港城邦成為華夏建國的先聲。故此，香港城邦論是與華夏邦聯論並立的，香港啟動雙普選的時候，華夏四地（中國本土、台灣、香港與澳門），要準備結成邦聯，啟動點是兩岸和談，中華民國的國體歸還予大陸，所謂大政奉還中華民國。

華夏邦聯的構想來自周朝的天下觀念，是救治秦始皇統一六國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秦制）的弊端，也是用現代邦聯體制來統領滿蒙帝國（清朝）留下的幅員廣大而民情繁雜的領土。

香港過去由英國代理文化主體，英殖民政府以英帝國的貴族榮譽原則（honour principle）和傳統智慧統治香港，此地的價值觀來自王朝中國的遺民文化，也來自英國領主的傳統文化，兩者由英殖民政府隱密調和。殖民地統治香港一百五十五年，有其建樹，更有其缺陷。英國撤出之後，缺陷顯現，香港潰散：

一、理性方面，是工具理性重於價值理性，工具理性之中，也是專業界別理性重於整體綜合理性。在專業界別方面，顯示的是*sectarianism*，宗派主義、界別利益主義，例如依靠中港貿易、中港商務的高級中產會呼籲社會不要限制大陸人來港投資、居住及購買水貨，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工黨、社福界及宗教慈善界，會因為靠社會福利服務謀生及用公共福利來謀取新移民票源或教徒來源，然而卻以此犧牲香港整體利益。學術界（尤其是左翼的人文科學界）由於有大陸學生及中港學術研究的利益而偏袒新移民及大陸生，任何批評新移民或自由行妨礙香港的，都會被抨擊為歧視。資本家方面，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大於自由主義（*liberalism*），香港只有寄生於殖民霸主的資產階級，並無自由意志的資產階級執政黨，資產階級依附於王權而不是與王權爭奪權力，被逼與中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妥協，反而是瘋狂剝削。有鑑於此，香港主流社會必須從無根的、短線的利益考慮，回到根本的道德價值考慮，並將普世價值結合華夏遺民思想，增益為香港本土價值。

二、信念方面，是文化本位缺失，利益本位不存。國際金融城市成為大陸官僚資本及國際財閥的掠奪場，香港人利益無有着落。香港主流社會必須反省國際城市的本土利益立場，排擠英國留下的香港資地產霸權，驅逐民族敗類，歸華反殖，締造香港人的主場。

三、

文化方面：香港的文化性格論述，停留在模糊的中西合璧論、高低混雜論、各不相干論，學界一般以此當作自由、包容與多元、化，然而此乃消極的自由，並非積極的自由，各有意見，無從交流，至多只能保存個人空間，而不能成就公共領域，英國撤出主場之後，香港頹然潰散。香港文化要前進與發揚，也不能如此混雜下去，消極下去。必須辨正源流，返本開元。

(五)

香港沒本錢 混雜下去

我的香港問題研究，得益於洪清田、陳冠中，一個是內學，一個是外學。洪清田的路數，這裏不談。陳冠中是做傳媒和潮流文化的，他觀察到問題，描述到現狀，說香港人落入了自己設的圈套，譴責香港中產自私自利、自以為是，但陳冠中卻找不到答案，於是返回去描述現狀，用潮流文化的混雜，用城市設計的特色來為香港解套。冠中認為香港要實踐民主、振興產業和整頓民生，垂範於中國。他的書充滿了缺環（missing links），然而，由於他問對了問題，故此缺環是美好的。他給了我很好的工作素材（working materials），我一再感激他。他提出中產的道德價值反省與香港民主建設，中間缺了一個環節，我是可以繼續推論和補充的。

洪清田的，是我的遺民論——宋學。有宋王臺為記。此臺乃殖民地政府找來趙宋子孫立碑的。香港最早的華夏遺民，也是宋帝賞賜土地的鄧族。而宋朝的文化，就是重視商業與文教，武功積弱，與香港甚為相似。

香港要生存下去，不得不採取樂觀的態度。宗兄陳冠中的《下一個十年》，副題是「香港的光榮年代？」，帶上一個問號，但是他是樂觀的。與書名同名的文章，寫於二〇〇七年中，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第十年，他認為香港可以在下一個十年調整好自己，「做到中國的一分子，為內地的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作出貢獻、繁榮、安定、法治、自由、民主、和諧、善治、公平、環保、節能、宜居、好玩，一個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世界城市。到時候我相信很多港人、國人也會跟我一樣覺得與有榮焉。」^{十四}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二〇〇四年）的香港中產階級之懺悔，找對了香港的問題，卻給不了答案。他找到的問題，是香港中產的高傲自大與僥倖心理，不知道戰後的國際環境對香港的偏愛和優惠，學了一點知識，快手快腳上了位，賺了一點便宜錢，便自以為了不起，精於私人安排，卻不在公共領域爭權益，「愛國和民主都是香港這場實驗早該完成卻未完成

十四・ 陳冠中：《下一個十年》，香港：牛津，二〇〇八年。頁七十九。

的部份，是自利的我這一代人遲遲交不出來的功課。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好好的去研發作為民族國家一份子的民主憲政時代的管治。」^{十五}他認為香港要挽救產業偏差的局面，鞏固自身的優勢，發揮國際城市品牌，與大陸合作。

香港當作方法，還是香港當作主體？

由於陳冠中是做傳媒和潮流文化的，他觀察到問題，描述到現狀，說香港人落入了自己設的圈套，譴責香港中產自私自利、自以為是，卻找不到答案，於是返回去描述現狀，用潮流文化的混雜，用城市設計的特色來為香港解套。他歌頌香港的混雜城市、半唐番文化，提煉出香港人的辦事能力所在：搞掂精神（can-doism）和落足工夫（「香港的兩種精神：搞掂與工夫」）^{十六}，說香港應該善用自己擠擁城市、垂直建築的特色，顯示高效、環保、節能、宜居、方便、好玩的現代生活模式。^{十七}

陳冠中過分歌頌香港是雜種城市、採取附加法的城市、多文化城市而認為這是香港可以自恃的特色和老本，這無疑是危險的，麻醉人心的，昧於形勢，沉迷在新左派的多元混雜就是自由的理論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意見混亂，左翼稱之為好事，稱之為思想解放，視之為多聲部的眾聲喧嘩，而不知道這正是九七之後容許橫蠻霸權進入香港主場的大好環境。香港如果繼續作為方法，而不能作為主體，永遠只是做人家的工具和白手套，用完

即棄，而且弄污了自己。香港沒本錢混雜下去，因為借用香港的人，不再給香港人足夠的手續費，連清洗手套的錢都不給我們。他們還說，沒有我們來用你們的手套，香港早玩完了，你們香港人要吃屎了。

香港欠缺族群歸宿，中產缺乏道德承擔

陳冠中認為香港要貫徹愛國、實踐民主、振興產業和整頓民生，垂範於中國。他也反省了香港中產的自私自利，卻不夠深刻，不能夠將香港中產的缺陷和香港民主之停滯兩者聯繫起來。

香港的中產有私人道德，有普世價值，卻缺乏本土的道德承擔，故此香港無法產生憲政民主的動力，任由民主派用恐共情緒來壟斷民主議程，與各種霸權勢力妥協，出賣香港民主。為何過去三十年，香港的民主論述都是限於政制細節及普世價值，卻不能聯繫到本土經濟、民生及族群意識？這是香港民主派的階級成分及既得利益使然。民主派以高級中產為主，他們依附執政者（往日的英國殖民政府或現在的港共政府），得到利益分配，他

十五・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二〇〇五年初版，二〇〇七年再版，頁二十。

十六・ 陳冠中：《下一個十年》，香港：牛津，二〇〇八年。頁九十一至九十二。

十七・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二〇〇五年初版，二〇〇七年再版，頁三十五至四十。

們也依附財閥，得到職位分配。香港的高級中產行業，存在各種壟斷，與地產霸權的壟斷，同出一轍。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只有小部分是資產階級親身出場，大部分是高級中產壟斷議席的。故此，除非高級中產具備族群意識，否則斷不會打破地產霸權的壟斷，更何況，他們持有物業。

若果爭取民主議程落實到本土經濟、民生及族群意識，則民主變成全民投入，特別是低級中產及基層市民投入的社會大議程，則將來民主實現之後，高級中產過去壟斷的利益就要面臨重新審核和分配。一句話，民主派不能成事，是由於香港的高級中產自私，好多持有外國居留權，利用香港的中港關係謀利而不理會香港的長遠利益，他們的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大於族群意識，維持香港現狀對那群時刻準備移民和出走的高級中產有利，他們缺乏族群意識、缺乏本土認同的命運共同體的感情。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發表文章，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以發動萬人決意宣誓並事前認罪，在召開多次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s*）以討論雙普選的議案之後，於二〇一四年七月和平佔領中環。這種民主運動的方式，就是高級中產想將民主變成高深莫測的政制細節和靈性修養，將低級中產和貧弱基層，摒棄於門外。

香港要締造民主，必須從低級中產及基層的覺醒開始，令他們有族群意識，認識到民主是解決本土問題的鑰匙，投入本土政

(六)

群體道德與 主體建立

治，脅迫高級中產和資產階級跟隨。本土政治催生香港民主之後，就有新的制度，香港華夏新文化復興，覺醒大陸。中共一開始就缺乏建國憲法精神及國族文化理論，中共在喝罵香港本土政治的時候，間接反省自身的蘇維埃殖民性，解除蘇維埃的殖民性，擺脫馬列主義遺毒，建立中國的本土政治，重新以華夏民族主義立國。這就是香港城邦協助華夏重新建國，實現華夏復興的角色。我如此打通了宗兄陳冠中的理論關節，大家日後驗證。

行道需要的是主體的代入和體驗，多於智力或人品。《中庸·第四》曰：「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語譯是：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聰明的人自以為是，認識過了頭；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揚的原因，我知道了：賢能的人做得太過分：不賢的人根本做不到。就像人們每天都要吃喝，但卻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品嘗滋味。

現時香港的民主運動，是知（智）者太多，用功利去計算得失，一計行不通，討不到眼前利益，就不做了，就用其他方法來繞過障礙霸佔利益、交換好處。不認識政治的愚者，就認為從政的人總做不成功，民主制度是假的，從政的都是去佔便宜，智者愚者都用工具理性去看民主制度，而不是用價值理性，用道德主體去看民主制度——我要民主制度，不要質問我！義之所在，心之所往，就要去做。我先做了算，事情成不成功，誰說得準？^{十八}

要具備道德主體，行使價值理性，先要問自己，你是誰？你的安心立命之所、你的歸宿，究竟在哪裏？有了自我意識，你就會行仁義，謀福利，建功立業。甚麼都阻擋不了你。即使中途有挫折，犯錯誤，你也會誠心改過，繼續向前。

兩條問答，決定香港命運：

一、問：誰是香港人？

答：香港的居民，離開香港移居外地的港僑，都是香港人。覺得自己與香港命運與共，榮辱與共的，就是香港人。之後，停止解答。

二、問：甚麼是香港文化？

答：華夏為本、英國及其他外國為輔，兼收並蓄，在香港發揚光大的，就是香港文化。之後，停止解答。

《香港城邦論》為香港立命，《香港城邦論II》為香港立心。香港人要重整道德，就是儒家說的立心。立命就是奠定香港的城邦歷史身份與香港人的遺民身份，一百七十年來的歷史，超越華夏很多朝代了，香港保存華夏遺民精銳，也接收英國現代典章文明，足以自立自治。

城邦論為香港人建立族群主體意識。有了族群主體意識，就可以保衛族群的生存空間，建立自己的政治主場。建立政治主場，靠的是三方面：憲政、文化與道德。個人道德容易建立，修身、齊家而已。族群道德不容易建立，這是治國、平天下的道德。由個人而來，但那個人必須要有族群的文化意識。香港人的道德，一般只是聽於修身齊家，達不到治國，更達不到平天下。

沒有群體道德，香港無法統治，九七之後的政治難題，都由於群體道德不明，無法釐清權利與義務，無法展開任何有意義、有結果的政策討論，例如：

憲政民主：香港人有普選之權，這是毋須爭議的，港人卻任由中共在爭議，姑息中共用中國的民主進程來拖延香港的民主進程。

二、貨幣自主與經濟自主。

三、高地價政策：地價有助財富保值及增值，卻令後來者（無樓者）處於赤貧，我們如何看待同胞的不平等發展？我們視香港窮人為同胞嗎？

四、公屋政策：公屋是公民權利還是救濟貧弱？

五、大陸雙非人與香港福利的國民原則。

六、公積金：政府不負責保底，由公民自行投機賭博，每一位打工者都在股市計較輸贏，鬥個你死我活，這合乎社會道德嗎？

七、全民退休保障：我們願意為其他同胞共同承擔養老的責任嗎？福利國家的基本條件，是極有公民活力的憲政民主，以及高度統一的國族意識。何況，香港甚至華夏社會的民間社會基礎在近代被錯誤的西化政策削弱了，福利國家只會令官僚取得更多統治權。

八、自由市場與大量大陸遊客跨境採購：當大陸旅客過分使用香港的基本建設和影響民生的時候，香港本地人還可以用自由市場來姑息大陸人嗎？

這些紛紛擾擾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討論，中間的關隘，就是族群意識：你是甚麼人？香港是甚麼人做主人的地方？香港還是沒有主人？我們香港人是香港的主人嗎？如果我們不是主人，誰是？一個地方沒有主人，變成無主孤魂的時候，誰在統治它，它又為誰服務？我們香港人世代生息於此地，依然被人視為過客、移民，可以容忍嗎？當我們視自己為過客的時候，偏有一些大陸人說香港回歸中國了，香港是他們的，這不是好奇心怪嗎？

至今的族群問題，是：你是中國人或你是香港人？這個問題是沒用處的，不合理的，只是把你的頭腦弄昏。中國人在政治觀念上，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然而，香港人按照《基本法》，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香港人在大陸是當作境外人看待，不能隨便在大陸取得戶籍及國民福利，不能參軍、入黨，香港不向大陸繳稅和支付駐軍費用。至於中國國民，香港人與他們在現實生活上接觸之後，便會發現經歷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和六四屠殺的中國人，不是自己那個模樣：蠻不講理、輸打贏要，來香港取福利、霸醫院床位、佔學校學位、搶購洋貨奶粉，明明是喧賓奪主，卻擺出一副沒我照顧你，你早就完蛋那副惡形惡相，毫無禮數可言。香港人若是做了中國人，就與那些大陸來港的人，一個模樣。但我們明明是中國人，講的中國話，吃的中國菜，拜的中國神，那怎麼辦？

我們講的「中國」，是民國時代推廣到民間使用的一個官方詞彙，目的是加強中國人的國族認同，原本與華夏、中華的意思類同，後來共產中國建立政權，變本加厲使用，中共竟然定義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香港是否具備文化主體

論及香港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身份認同等問題，不得不提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觀念。主體性來自後結構主義、後殖民研究、性別研究等學科，語義分歧，然而一般包括下列四項特性^{十九}：

共同身份：與外來的群體或民族對立的本土共同身份。例如香港人遇到大陸人的時候，一般自稱為香港人。

二、文化自主：文化來源及生存意義自主，不來自外來的界定。例如香港毋須跟隨大陸的中文寫法，也毋須跟隨大陸的文化指導。然而香港人在過去仍然介意西方國家對香港的看法，但在一九七之後由於外國傳媒少報、亂報，甚至將香港與大陸混為一談^{二十}，香港人也不再理會了。

三、道德自律：有共同的道德主張，遵守自己訂立的法律與習俗。這方面香港人可謂成熟，即使在示威抗議期間依然遵守內化了的公共秩序。

四、主觀肯定：你說是，以生命經驗來印證你是，沒有人夠膽說你不是。不必全部依靠外來的經驗觀察，可以用內省、自覺的方法肯定自己的看法。肯定自己的看法，維護自己的尊嚴，這方面香港人比較缺乏，例如在聯繫匯率方面，只會考察金融穩定的用途，而不會直覺地設想到香港的經濟自主權問題。

從上述四點觀之，香港具備相當高的主體性，只是第二項和第四項比較弱。為了避免語義含糊，我一般用「自主意識」來代替「主體性」。

在香港本土意識覺醒之前，財閥、中產、政黨、平民，全部都是無可選擇地依照殖民地的老路，原地踏步，胡混下去。香港城邦論、遺民論的作用，就是要香港覺醒，自治自立，垂範華夏。

十九·

參考自吳豐維：〈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台北：《思想雜誌》，二〇〇六年九月。網上閱讀：<http://ipa.hss.nthu.edu.tw/committee/Thought/2006.pdf>。四項名詞略有改動。

二十·

例如在一〇一二年九月中，大陸人保衛釣魚台的反日示威，外地傳媒經常將香港包括進去，令香港人不解。

普世價值與 本土傳統



保舊開新：香港的戰後重建

告別離地中產

普世價值與本土論爭

左翼的錯位，右翼的缺席

香港的本土價值與
確立主體性

華夏遺民與
香港族群的使命

中港區隔，基於華夷之別

香港主場的政治哲學：
保守主義

香港的自由論與
平等論的華夏根源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有哪一個殖民地是擁有自己的國際貨幣、國際關稅地位、國際成員國地位、財政獨立、自己的軍隊（香港義勇軍）、自己的海外殖民官系統、自己的海外代表處（貿易代表處）、自己的文化教育政策……？九七前的香港，不是一般的殖民地，而是英國保護之下的自治城邦。

陳雲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面書留言

(一)

保舊開新：

香港的戰後重建

香港的戰後重建歷史，對中國有參考作用。戰後，日本投降，香港重光，英國恢復統治香港，重建了香港的經濟、社會

及文化，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間，超過一百萬大陸難民在二十年內湧入香港，英國殖民政府必須周密部署。此間，英國經歷大戰，國力虛怯，依然支援香港發展，早年的天朝棄民（水上蜑家人、海上走私客、中西混血兒）及後來的紅朝難民（逃避共產黨的難民），都在香港得到英治政府庇護，茁壯發展。英國用整體的工業化（外資大廠、中小企、山寨廠）來創造就業和培養本土企業家，用法治鞏固和轉化了中國民間社團（宗族、行會、學社、慈善社等進行有限公司化），用公共房屋締造新時期的華夏民間鄰舍精神及社區團結，用中西合璧的公費教育重塑華夏正統文化及引入西方現代文化。在政府規劃及管理的時候，英治政府還刻意退隱官僚統制的權力，授權行政官員酌情寬限，促進民間社會自治及推動小企業家創業。這是在民間厚殖勢力（capacity-building）、做到藏富於民及藏力於民的保守主義執政方略。

英國戰後重建的，還包括保育香港的自然水土環境，日治期間山林無人看管，遭到濫伐，英治政府在香港大量植林^二，開闢集水區和郊野公園，將香港七成土地劃入郊野公園保護區，免遭開發破壞，並獎勵漁農業，供應本地蔬菜及禽畜魚類肉食達到四成

^一 也最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二
查實香港開埠後，注重植林，一八六一年，有部門負責Government Gardens。一八八〇年，轉成Botanical and Afforestation Department。一九〇六年改名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讀者提供）

以上。香港在八十年代，香港民間企業將經濟重建的精神，部分傳播到廣東一帶，然而香港的社會重建及文化重建，中共並未學到手，這需要更大誠意的中港合作。然而，首先必須中港區隔，將香港的一套生活方式保存下來，才可以向廣東鄰近地區輸出。中港區隔的目的，不是隔絕，而是保存，之後向北輸出，回饋中國。北京領導層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必須保存香港的精銳。

右翼是保舊開新，有舊事物為背景參照，才知道如何漸進地開新，如何新舊對話，時刻反省，留一條退路，必要時退後一步，再思考如何前進。左翼的破舊立新，是錯誤的，破舊之後，一片空白，無法立新。

中共也是在戰後接管中國的，然而與英國殖民政府的重建成就相比，中共可謂一塌糊塗，至今危機重重。當然，共產黨立心要摧毀香港，我們香港人難以反抗，但我們有信心在中國崩潰之後，重建香港！因為一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已經走上軌道的香港，是不可能被摧毀的。

後進國的大志氣

相對於歐美，香港是後進地區。後進必須追趕，甚至趕超，否則永遠落後。追趕的方法，是對先進國家的事物，做哲理上的理解，觀察其缺陷與無奈，然後融合自己的文化傳統及地方優

勢，超越對方，或與對方並駕齊驅。故此，後進地區在追趕的時候，必須重視思想及原理，重視人文學科和社會思潮的研究及創新。德國、俄國、日本，都是追趕英國、法國的典範。俄國雖然被共產主義掏空國本，但至今在哲學、科學、美藝體育（花式溜冰等）和經典藝術（音樂、芭蕾舞等），都有可觀之處。德國更在哲學、音樂、工藝及尖端科學，在特殊領域及策略市場領先世界。日本則在工業化初期，哲學思想、社會科學和文學都有璀璨成就，如此才可以帶起工業及創意產品，將日式生活輸出世界。

九七之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政治思想及人文科學接通英國，外派的殖民官更有獨立的拓荒者性格（好多是反抗英倫的蘇格蘭人！），故此可以獨當一面，甚至排除英國政府的干預，帶領香港前進，甚至在經濟上超越英國。香港本土的精英，其用心不在政治思想和行政制度上（這方面有英國代理），而在思想文化上、在通俗潮流上，香港在六七十年代的思想，有源自華夏的新儒家、佛學，源自西洋的存在主義和文學上的現代主義等，領導華夏世界，這是香港可以在八九十年代催生輝煌文化產品的原因。當然，由於缺乏政治務實的歷練，香港中產階級的空想普世價值及中國民族主義，揮之不去，在九七之後兩者合併，用普世大愛在香港關懷中國大陸來港新移民及走私客（自由行旅客），結合為荒誕詭異的「普世民族主義」，成為香港政治的黑死病。

九七之後，英國人走了，香港人要自立，除了思想文化要反省之外，政治也要從頭學起，好似當年德國、俄羅斯和日本維新一樣。這是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人成長的歷程。總結到的理論，除了用於香港，也可用於中國。

九七之前，香港社會主流可以是實惠、拜金，支流是文化哲學、藝術實驗，各得其所，這是由於英國人在香港當家，搞掂了政治思想和教育哲理。今日，香港主流仍是實惠、拜金（例如發展東北吸引深圳富戶、拆毀農田興建別墅之類），香港就可以死得。

(二)

告別離地中產

香港文化進入九十年代，難言前進，這是由於九七主權移交問題，產生離地中產。這群人秉持所謂普世價值，要香港門戶開放，自己則在中港交易之中得益，吃裏扒外，不理低下層死活，也不在乎香港被中共赤化殖民。由於他們沒有本土利益與在地關懷，經商及搵錢手段有如蝗蟲覓食。有港人提出大陸侵略者是蝗蟲，要保護香港利益，他們便群起攻之，當那些港人是排外法西斯。

一個社會要做到偏離常理，思考詭異，需要長久的洗腦過程。香港在九七之後，也經歷一段洗腦過程：

一、香港邊緣化的恐懼。上海取代香港啦，香港人的競爭力唔掂啦，香港的芝士唔見左啦，青年人要北上謀職啦。當中，言論推手是土共民建聯陣營，離地資本家陣營，以及前政務司許仕仁和前財政司梁錦松。這是一個聯合的邪惡陣營。

二、公共服務的效率不如私營服務，於是房屋署的商場要私營化，賤賣託管予領匯。當中，言論推手是《蘋果日報》的一眾財經寫手。這是財經界的新自由主義陣營。

三、香港要與大陸融合，香港人要包容大陸人的文化差異，於是雙非人霸佔福利、自由行走私的問題，不能及時解決，令香港遭受無可挽救的損傷。當中，言論推手是《蘋果日報》的梁文道，民主派的鄭家富，社民連的長毛（長毛後來知衰，可以饒恕），及從事社運及高等教育的一群左翼。這群左翼學者，手下有很多大陸學生、從事大陸線的研究以便發表國際期刊論文，他們不是不知道大陸人湧來香港的禍患，而是私心凝重，自私自利。他們是代表離地資本家及美國利益的《蘋果日報》、左翼學者和代表離地高級中產利益的民主派，他們都是中港交易的得益者。

四、社運抗爭要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總之動武、講粗口就是不對。當中，言論推手是民主派的劉慧卿和黃碧雲等，認為粗口是男性霸權。

我為甚麼要激？因為香港沉滯不堪，被兩大謎團蒙蔽，不見天日。我於是揮舞長劍，劃破謎團，令香港人重見天日。

我這次是來真的，我老實不客氣。華夏地區的志士、華夏地區的公民社會推行民主，或者境外的美國勢力在華人地區推行民主，有兩大迷思（曰：二），誤盡蒼生。第一迷思，是中產階級壯大之後，會自然產生民主訴求，推翻專制政權。第二迷思，就是普世價值——自由、博愛、平等、民主、人權……這些一攬子的好事情，有助華夏社會，走向現代文明。這兩大迷思，是兩位一體的，因為普世價值是通過中產階級來呈現的。故此，信靠這兩大迷思，是失敗中的失敗，一敗塗地的失敗。我們在香港從事民主鬥爭，正面臨膠着狀態，陷入困局，就是中產階級論的失敗，普世價值論的失敗。

民主就是本土權利、本土文化慾望之伸張、本土傳統文化之復興，大家看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就知道的。迷惑的是，華夏地區的中產階級壯大之後，原來是「離地」的，他們會唾棄中文，鄙視粵語，咒罵本土文化及地方飲食，更不穿唐裝漢服，他們移民美國、加拿大，後代往美國送，錢財往美國

寄託，家裏用舶來品，手袋皮鞋手錶用外國奢侈品，住宅叫威尼斯、普羅旺斯。這樣的中產階級，你要靠他們來推行民主？然而，在美國發揮境外影響力的時候，這是會成功的，但那只會造就是賣國的民主政權、向美國輸送國家利益的民主政權。在菲律賓、在拉丁美洲，這種例子，我們看得少嗎？

目前的中產階級和西方的普世價值無助於華夏民主。要拆破這兩位一體的迷思，要看看這些迷思是從哪裏來的。它們主要是從美國來的。美國在華夏地區散播民主思想，動機除了促進以美國為首的地區安全之外，還奠定美國的文化霸權地位。換句話說，是殖民主義在作祟。看不清楚殖民主主義的議程，你永世也解不通，為何華夏地區的中產階級壯大與普世價值流行，無助於華夏地區的民主，更無助於華夏地區的文化自強（cultural empowerment）。

這兩大計策，盤算者是殖民主人，也就是美帝國。美帝國不在乎華夏地區能否成功推行民主，它在乎的，是華夏地區的傳統文明被普世價值淘洗而去，傳統結社方式和地方的血緣組織、宗教組織和自然締結組織，被新式的公共服務組織及跨國的慈善組織和NGO取代。這些被剝奪國族文化、地方風俗的人，稱自己是「世界公民」，一個文學比喻的名詞，因為人類並沒有一個世界政府會實踐這些人的公民權利。美國文明、美國金融、美國消費品、跨國剝削集團，可以長驅直入，進駐華夏。在淘洗華夏文

明、剷除華夏傳統組織的目標上，來自蘇俄的共產主義，與來自美國的普世價值，是沒有分別的，都是在華夏地區的殖民霸權。退卻蘇俄，擁抱美國，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出了虎穴又入狼窩。

在抗拒美國殖民霸權方面，解放離地中產、中產本土化和批判普世價值方面，大陸仍未覺醒，香港則在覺醒之中，而台灣則覺醒了，而且開始在本土華夏傳統、本土族群文化、本土民生、本土宗教、本土社團方面，彌補過去民主進程的禍患。

法國大革命，剷除了傳統貴族、教會、行會、鄉社的文化詮釋權，代之以普世價值的自由、平等、博愛。普世價值的危險在哪裏？是普世價值沒有準則！它沒有詮釋的本土主體，甚至它沒有詮釋的國體。你懂得這樣看，普世價值就很危險。這些普世價值，無人可以在傳統的字典、傳統的法典、傳統的長老和地域組織裏面取得解釋，民眾無法在周圍的自然締結裏面取得諮詢權力，取得向政府武裝力量的制衡，最終，普世價值任由取得政權的革命者任意解釋，國家官僚組織（政府、議會、警察、教師、社工……）取代了社群組織（The nation takes over the community），國家雄辯滔滔，民眾變成無言的奴隸，變成原子化的個體，孤立無援，失去後援空間（土地、莊園、宗族、教團……），青年才俊誇誇其談，父母長輩收起鄉音，羞澀退場。這就是法國大革命血洗巴黎、殘害傳統的教訓。最終，當國家向平民個體開刀的時候，平民才發現自己孤立無援，束手待斃。自由被國家扼殺了。

中國的革命，不論是孫中山的或是毛澤東的，都是學法國的一套的，不是學英國那一套的。故此，中國失敗至今，一敗塗地。原因是甚麼？原因是中國人被普世價值的簡潔理性迷惑了，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四書五經、二十四史、佛道團體、宗親會、廟會、行會、江湖幫會，權威處處，山頭林立，弄得事情深奧莫明，好難理解；法國的一套容易理解，於是吃快餐，吃方便麵，吃味精素，吃的一身浮腫，以便把身上的洋裝西服，鼓脹起來。西裝筆挺，好看啊。

我的老天！權威處處，山頭林立，凡事做決定，要問自己周圍社群的意見，要思考千年文化傳統如何解釋，要到處張羅，到處託情，修修補補，這不就是民主嗎？政府推出惡劣的政策，我走出議會，回去找鄉親父老幫忙，找老師詢問，找牧師神父和尚求開示，找行業工會抗議，找幫會、兄弟會來打鬧，到處都是我反抗的資源，這不就是自由嗎？中國人，你怎麼會這麼蠢！引入西方的普世價值，卻在挖自己的民主與自由的牆腳！你這不就是中了殖民主義的毒？^三

三 上述文章，二〇一三年六月於台灣兩岸公評網www.kpwan.com發表，改動之後納入本章。

跨國中產自驕身價，刻薄寡恩

老員工偷飲一樽汽水^四，任職十九年的隧道收費員，偷拾地上的一元^五，上司就要報警究治。一名廉政公署人員因為的士司機找錢的時候沒找回五毫子零頭，她沒向司機當面索回，而憑的士發票到消費者委員會及交通投訴組投訴，令司機要上法庭。^六其他的，香港的官僚和財團管理人也管束死，例如香港的公共空間在九七之後，就管得像監獄。

超市偷汽水一事，跨國連鎖店為了減低監管員工和培養員工忠於公司的成本，動輒殺雞儆猴，一點小事就借用正式刑法和動用公權力。若香港仍是在殖民地時代，這種偷飲汽水而告上警局的事情不會發生，只是上司記過或警告就算，因為舊時的上司會當庶務下屬是道德鬆懈的低下層，會予以寬仁，同時也會模糊地視他們為香港社群的一分子，而不是一個無名的、等待紀律教育的個體工人。

香港的中小企被大財團兼併和排擠之後，跨國規模的大財團招聘的管理人員，就排斥本土傳統社會上層人對下層人的厚道，也漠視行規——例如的士一般不會找回一元以下的零頭當作自己的小費，這些管理人員刻薄寡恩，嚴厲對付庶務員工。他們這樣便

可以瓦解中小企賴以生存的傳統社群關係，降低了管理成本，但社會卻要為此付出代價。例如令人生活在紀律森嚴而毫無寬恕的現代世界之中。

英國政府撤出香港之後，香港的高級中產壟斷了專業地位，忽然成為掌握專業知識和國際人事關係的行專，掌門把關。這群源自低下層向上爬的香港高級中產，缺乏來自傳統權貴階級的寬容，專業知識衍生的是狂傲，在香港的經濟受到壟斷之下，更缺乏挑戰者，這便化成壓迫低下階層的做事方法，在香港作威作福，低下階層缺乏英國模範之後，被逼以這些高級中產為職業上升的楷模，愚迷而甘心受困。^七

四・ 荃灣惠康超市一名資深女工，被揭發偷飲一樽價值七元的汽水，分店副經理公事公辦報警，女工涉盜竊被捕。見〈偷飲\$7汽水 女工被捕〉，《蘋果日報》，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五・ 「一蚊雞 惹禍！任職東區海底隧道收費員的中年漢，被上司從閉路電視發現他在工作期間拾起一枚一元硬幣放入褲袋，上司隨即上前揭發取回硬幣並報警，被告在觀塘法院被控一項盜竊罪，最終獲法庭准許自簽二千元守行為兩年，但須付一千元堂費，裁判官更問他：「男人炒咗未？」被告低頭回應：「炒咗。」參閱〈執1蚊 有份工〉，《東方日報》，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六・ 涉案女乘客為廉署人員，於北角廉政公署總部上了的士，經東區海底隧道過海到鑽石山蒲崗村道，當時顯示的車資為一百三十六元五角，她向司機付了二百元支付車資，而司機則贖回六十三元給乘客，並保留五毫子。女乘客當時並未向被告要求取回五毫子。參閱〈的士「濫收」五毫獲撤罪〉。《星島日報》，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七・ 取自小徒張樂天的面書留言。

(三) 普世價值與本土論爭

秉承香港本土身份，發揚香港本土文化，在香港遇到不尋常的阻力，這個阻力叫普世價值論。左翼學者、親民主派的評論人、電台網台主持人面對中港利益衝突，總是高舉所謂普世價值。例如說用配額限制大陸孕婦來港產子是不人道的，限制大陸走私客來港大量購買奶粉走私回大陸是破壞市場經濟之類。二〇一三年，當荷蘭、英國、德國、澳洲毫不猶豫地頒佈法令或超市內部通令，限制或禁止大陸遊客購買嬰兒配方奶粉的時候，香港仍在擾攘不休，纏繞本土_{s普世、民主}本土之類的對立命題。當中的差異，是歐美國家已經建立主權，捍衛本土利益是天公地道，是不須質疑與辯論的政治慾望，而香港人仍未意識到自己在一國兩制之下行使的實然主權，覺得這個無主孤魂的香港只能用普世的價值來支撐，如果要維護利益，就要同香港主權的擁有者——中國大陸的人民來一同維護，然而，大陸人一樣缺乏主權在民的意識，只有自私自利，這樣，香港的本土利益豈能得以維護？

大陸人來香港，有遵守普世價值嗎？

禮尚往來。來而不往，謂之無禮。有禮有義之人，我們以德報怨；無禮無義之人，我們以直報怨。依循普世價值的理論，請大

家清晰地看。包容雙非人、自由行奶粉走私客，民主派和左翼說這是普世價值。這是對的嗎？大家想過了沒有？普世價值的三大元素，是自由、平等與仁愛。我們來評評道理。

一、論自由。行使自由是有相應的責任的，來港的大陸人，行使遷徙或旅行的自由要有照顧當地人風俗的責任，他們有盡責任嗎？

二、論平等。境內與境外的人，大家都享有的平等權利，是消極的權利，即是不涉及公共資源的權利，例如免受酷刑虐待之類。至於涉及公共資源的積極的平等，必須取得境內的公民身份才可以享有，否則公共資源不敷應用。但危難時候的急救治療，境外的人也有權享用，事後要收回多少費用，視乎當地富裕與否。

三、論仁愛，大陸人要在香港獲得仁愛的對待，必也要同時以仁愛對待香港人。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大家發現，三項普世價值，在來港的大陸人身上，並不適用。各位，對待這些在香港橫衝直撞的大陸人，我們只能以外客對待，不歡迎的我們就要拒絕，還談甚麼普世價值和族群融合呢？為甚麼你們還要被普世價值之論迷惑了呢？然而，香港境內的中港資源爭奪之戰，卻偏偏陷於普世價值的論爭之中。

香港的本土利益與普世價值是沒有衝突的，我們香港具備一百七十多年的法治歷史，也有優良的華夏風俗和英國人文精神。香港的本土利益，本來就具備普世價值。香港不是野蠻社會，也不是共產專制社會，我們這裏的本土利益考慮，必然內化了仁愛、自由與平等。然而，此地的輿論卻認為保護本土價值就是排斥，就違反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與華夏文化並無衝突

普世價值甚至可以認祖歸宗。那些反對本土政治、反對華夏主流的民主派和左翼評論人，常說要尊重普世價值。香港秉承華夏文教，普世價值來自啟蒙時代的歐洲思想家，然而那些思想家的其中一個思想來源，是孔孟的仁義觀念。孟德斯鳩、伏爾泰等法國思想家都驚訝於中國可以不必宗教，只用儒家仁義之教便可撐起一個文明天下。普世價值的真善美，要由主體性來支持，主體性就是良知的覺醒，《孟子》說的：「非由外鑠者也，我固有之也。」

建立主權之後，再談普世價值

歐美很少本土利益與普世價值論爭，本土利益是現實政治範圍，凡立國必有本土利益之正當性。普世價值也是先在本土實踐，然後擴大到境外和外邦人。歐洲歷史是主權建構先於人權建

構。國家主權建立，始於一六四八年的《西發里亞和約》，人權卻始於一六八八年的英國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之頒佈，以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期間頒佈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二十世紀的非殖化過程，則有的是先建立主權再實施人權（如拉美、菲律賓），有的是主權與人權的建構並行（如印度）。^八香港高舉普世價值的民主派和社運界，只是空談普世價值，不去探究如何落實到香港的主體與政權內，普世價值只有具備主權保護的大陸人享用，沒有主權保護的香港人卻被剝奪了。城邦論要解決的，是根據《基本法》將香港的實然主權建構出來，保護香港人的本土資源和本土權利。^九

近年香港談普世價值，是直接抄襲中國大陸的有關討論，中共的主權建構完成了（國體仍未完成），大陸的自由派，可以只談普世價值。將大陸的話題用在香港，很多香港人對自己的實然主權不清楚^九，本土利益和本土意識也未提上政治議程，避開本土利益、本土自主權而大談普世價值，只會斷送香港人的利益。

八：此點來自孔詰鋒的面書留言。

九：文德彬：回應「陳雲VS碧輝依」對話，《明報》Pentoy網站，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二日。

自主權的維護需要本土意識的支持，沒有本土意識，即使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賦予了香港人合法的自治權，等同邦聯成員國的實然主權，香港人也不會覺察到原來自己在大陸人面前，有捍衛自身利益的合法性（legitimacy）。沒有這個合法性，就膽怯了，於是附和所謂普世利益，開門揖盜，向大陸開放香港的中門。

此外，香港的在野政黨喜歡講普世價值，也是由於香港沒有普選，它們沒有組成內閣的執政機會，故此只會用普世價值來標榜自己道德清高，騙取選票。普世價值是在憲法裏的，要鼓吹普世價值，角色上適宜用民間團體進行，不宜由政黨承擔，否則向外援助金錢，倒賠香港家產，無日無之。

民主制度是為了解決自主權之內的紛爭而設立的，它調和各方均宣稱有各自利益正當性的矛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就用選票來解決：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保護少數，這樣就可以做公家的事了。故此，民主必須先有自主權利的界定，民間自治的歷史，否則民主難以得到調和與制衡，容易陷於多數人的暴政。民主是從本土利益（族群、階級、地域利益）的調和與文化價值（新舊、中外）之伸張來的，一個地方要發展民主，必須從本土主義開始，美國如是、日本如是、台灣如是，開始的時候，有自保、區隔的趨勢，發展到後來，有外擴、融和的趨勢。這是由於本土裏面有多元文化價值和利益競爭的關係，而做出的循環調整，不是先本土、後普世，要用普世來矯正本土之類的傻蛋思

想。這裏面的思考，哲學上叫辯證法。香港人對大陸，有恨也有愛，要區隔、也要融合，這就是辯證法。目前是恨、區隔，將來是愛、融合。這很難理解嗎？仇恨不從本土意識而生，是從被人剝奪我們生存空間，眼看文明文化被中共劣質人口破壞而生。

普世價值與本土價值並不對立

很多人都在玩弄普世與本國／本土的邏輯謬誤。為甚麼我要抨擊泛民的普世價值論？因為普世這套說辭，容易與民族和本土衝突，而文明的民族和本土，與普世無異。香港是文明社會，我們自己就有普世價值，毋須外加普世價值這套說辭，混淆視聽。

香港是文明禮樂之邦，普世和本土的對立，並不成立。若真的用語言邏輯分析，「普世」並不存在，世界有人住的地方都有主權，普世只是我們描述那些跨本土的文明標準。普世價值與本土傳統，是好簡單的哲學命題，西方叫 *particular and general* 的問題（只能依靠 *particular* 來體認 *general*），華夏稱之為「理一分殊」（道理是共通的，但進路是不同的）。舉個例，你可以閱讀語法通則（*general grammar*）來認識人類的語言法則，但這無助你講好任何一種語言。語法通則是不存在的，因為它只是綜合各種語言法則而虛構出來的。如果人類要放棄各自的語言，來學一種用語法通則做出來的世界語，這就是人類文明的終結。

民主在於安排利益

香港支持民主派的中產，跟住民主派叫喊普世價值，如人權、幫助大陸弱勢、動物權利之類，經常限於空想理念，而不知道實踐的情況，反正叫喊一輪就上班，其餘等待政府工作，五十歲就移民加拿大。舉所謂動物權利為例，請大家看看下面的情況，便會醒覺過來：

一、森林裏面，惡狼追捕野貓，我們出於對貓的感情和鋤強扶弱的俠氣，如果手上有足夠武器，會出手阻攔，但我們不會報警求助，因為那是森林，森林不是人類造成的環境，裏面的動物自有其命運。

二、城市裏面，惡人追打流浪貓，我們會出手阻攔，如果自知不敵，會報警阻止虐畜，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流浪貓落入了人類經營的環境，我們有自主權，也有責任照顧落入我們有主權的環境的生物，令牠們得到足夠的保護。即使追殺流浪貓的是一頭惡犬，我們也會阻攔。因為這是我們的主權範圍。

同理，所謂普世價值，也要看我們的主權範圍和道義責任。在境外外地區的窮苦人，我們沒有很大的道義責任，因為不是我們的主權範圍，我們會酌量救援。在我們地區的本土人，落入窮困狀

態，我們有絕對的道義責任，我們會盡力救援。在我們地區的外地人，落入病痛狀態，我們會盡力救援，但落入窮苦狀態，如不能買很多奶粉回國走私謀生，我們沒有很大的道義責任去幫他們。

「徒善不足以為政」，價值觀念不能抽離經驗的真實感受。普世同愛，只可作為道德期許或大同世界的寄託。真的去愛時，必須要定下實踐的範圍，好像《孟子》講的，親親而仁人，仁人而愛物，始有機會實踐。

民主的基礎在於共和，共和是一群人願意放寬分歧而共同生存在一處地方，忠誠捍衛該地之自主權，在保護各自權利的時候，也區分出各自的利益，用選票來決定勝者，在限期內信守決定。以分而求合，以自治分權的本土城邦，達成協商共和的民主國家，這個先後程序是世界各個民主國家建立的經驗教訓。
+

此段有參考我弟子張樂天的看法。

(四) 左翼的錯位， 右翼的缺席

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建構了一個二元世界，統治階層的主流社會和被統治階層的民間社會。香港過去的主場，是英國殖民政府聯合本地的上流社會操盤的，平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戰役或採用過甚麼戰術。香港的民間生活經驗，可以看出殖民政府統治的效果，卻不能推論出它的政治意圖。⁺ 殖民政府捍衛香港主場的道德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判斷與現實政治技術（Realpolitik），是民間無法掌握的。九七前，殖民政府給予香港的區議會諮詢民主、市政局實權民主（社區政務）和立法會的反對派式的民主，各自割裂開來，並不能給予香港人足夠的自治鍛煉，產生在地政治。香港不是弱國西班牙的直布羅陀，香港主權在勢力強大的中共手上，英國主權懸擱的問題，令香港無法走向解殖鬥爭，港人只能一邊依靠英國頂住中共，自己尋求移民去路，於是催生香港的離地政治。

至於本地的中產階級，只是負責執行，故此心思都用在技藝之上、用在工具之上，而不是用在道德思考、戰略盤算等高級智能範疇之上，也由於這些高級智能範疇被英國人代理了，香港華人進入現代化的智力障礙和道德障礙被英國人掃清了，香港的華

人中產可以在職業範圍充分發揮技藝能力，可以拍心口將事情搞掂，做到又快又好，香港的專業中產對*discipline*（紀律）、*efficiency*（效率）和*streamlining*（流程舒暢）有着毒癮似的執迷，這種工匠尊榮（德文*Handwerkerstolz*），從中環的律師會計、尖沙咀的洋服裁縫、飛機場的行李輸送到醫學院的外科手術，都是香港稱譽世界的絕學。這是工具理性的場域，*can do*（能做）和*do it well and fast*（做得又好又快）。至於價值理性，*why shall I do it~*（我為何要做~）*what will happen if I don't do it~*（若我不做，會怎麼樣~）的問題，香港的中產是不夠膽問的。事頭婆（英女王）沒給他們這個膽。

香港給予下層社會上升至專業人士的途徑是公費教育，以實用及應試為主，文史哲知識用殖民地的離散方式傳授：世界史、中國史和地理學、公民等各有偏重，世界史是普世的、並非英國史觀的，中國史是民國史觀，地理學是英聯邦殖民地的，公民則是殖民地教化的低級中產心態。割裂的史觀、公民意識和地理概念，令一般港人難有民族文化尊嚴和本土意識，認識自己的位置，建構香港的政治主體。

+一 引申自《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頁一四四至一四五。

香港的低下階層缺乏政治代理人。在社區工作的土共（民建聯及工聯會）靠派發物資（「蛇齋餅粽」的街坊小恩惠）及關懷家庭來取票，而他們勾結境外政權（中共）及被中共吩咐要巴結資產階級。至於民主派的職工盟，爭取的選民對象是中產多於基層工人，故此必須保持優雅身段而令工運鬥爭不能成功為香港工人充權。八十年代之後的公共服務瘋狂擴張，也侵蝕往日香港民間社會的自主自治傳統，令香港的無產階級缺乏本身的階級覺醒，往往只是以失敗的中產自居。

資產階級在九七之後失去英國的政治保護，產業由本土實業走向地產套利、大陸投資及全球金融投機，勾結中共及美國求存，八十年代之前的一點在地意識消失之後，產生香港的離地資產階級。

香港中產，缺乏在地忠誠

不論在香港還是在中國，中產階級都有離地性質，崇洋辱華，以移民海外為榮，令西方通行的中產階級推動民主運動及族群文化復興的理論不合用。這是為何我們在香港從事民主運動，必須加上地緣政治（在地／離地）及解殖鬥爭（崇洋／歸華）兩個理論，才可以準確描述香港的現狀，指導民主鬥爭的方向。

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統治，在種種局限條件之內，可謂仁至義盡，然而由於始終是異族統治，而且鄰近一個共產專政國家，此共產專政國家卻未見消亡，令香港人不能長遠打算，雖然逃離中共之後，在此地休養生息，但始終仍要面對九七的大限。英國在一九八四年決定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共，此中引起的恐共情緒及移民震蕩，令香港至今仍頭暈目眩，好像一個人經歷猛烈撞車之後的創傷。

九七危機，令中產被逼往外尋求政治避難，手持外國護照，心態不在香港，也不在宗主國（英國），而是在以專業知識、財富及世界公民意識來接納移民的美國和加拿大，產生離地的中產階級（absentee middle-class）。離地中產這個殖民地現象，在香港特別嚴重。中產階級對香港缺乏政治忠誠，也對任何一個地方缺乏政治忠誠——如果他們的移民國家是前宗主國英國的話，還有一點政治特務式的忠誠。這是香港至今的民主派政黨及其選民的致命缺陷。

香港普遍政治冷漠，偶然爆發的和平示威遊行或憐憫地下階層的救濟，只是富裕中產的心理補償和治療。即使明知這種「和理非非」的鬥爭方式在港共政權之下必然失敗，他們也會用持續的失敗來達到自我道德榮耀（defeatism for self-glorification）。他們不敢成功，因為成功意味著政治投身（political commitment）及政治忠誠。預設失敗則是脫離道德困境，卻可以賺取道德光環。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爆發中英談判，香港華人卻無法參與，被排斥出去。孤寂的心態，找到宣明會式的「饑餉三十」（一九八三年）、*We Are the World*（一九八五年）式的救助貧弱的國際關懷的道德寄託以及周兆祥式的綠色環保的心靈救贖，八九天安門民運之後，香港人從電視直播及北上接觸民運學生，感染了大陸民主運動的激情，本地中產也找到一點扶助中國民主以解救香港赤化的司徒華式的投機民族主義，以此來自我道德榮耀，也震懾一下英國殖民政權和中共政府。

也不妨說破這群人。他們的愛國，其實是投機民族主義，是由他們文化是親英的，政治上則是美國的附庸。這些道德立場、民族主義和心靈價值是抽空地從外地入口香港的，沒有香港的根基。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英談判期間，這群司徒華的信徒依然不認識政治現實：香港即將主權移交中國，保護司徒華信徒的殖民政府即將撤退，他們的愛國主義的對象——中共政府即將成為香港的宗主國。這群司徒華式的愛國主義者不識得解殖歸華，只是重彈中國民主與香港民主捆綁的舊調，不識得建構香港族群，也不識得建構華夏國體，他們的中國觀念、華夏論述毫無轉型，一旦香港主權移交中共，這群民主派的司徒華精神追隨者便顯得進退失據，只能偽善地呼籲普世價值，對外依附美國，對內則退回自己的中產、小資的綠色有機、靈性充滿的私人生活圈子裏。

九七之後，面對中共君臨、面對大陸雙非人、自由行這些貌似弱勢者的入侵，面對大陸毒食物的入侵，香港的中產只能呼籲包容，自己吃一點有機蔬菜。有餘暇的，就在自己後園或窗台，搞一點菜園村運動。

左右翼合流的怪誕政治

香港所謂右翼只是高級中產，邊緣化的小資產階級，他們並沒有歐美的大世族、大企業主那種當家作主的世故老練。類似自由黨這類人，只會口說尊重家庭、中小企業發展，卻不去保育香港文化傳統及水土自然環境。他們高舉普世價值，卻不會回歸到本土文化，變成依附歐美的殖民主義者。

香港所謂左翼是低級中產，邊緣化的波希米亞人。他們都是左傾的，有一點浪漫和激情，他們同情的弱勢也是在大陸的弱勢，而不知道近在眼前的本土弱勢者，正受到四方八面的大陸人的壓迫。

在抗爭的時候，處於右翼的高級中產為處於左翼的低級中產做一點技術補課，低級中產為高級中產做一點行動先鋒。故此香港的政治運動，出現罕見的左右翼合流的怪現象。至於香港現在的主流——中共霸權+政府黨+地產霸權，是失語的、不言明的，只是他們沒有英國人那種統管香港、安定中下層的能力，沒有給予中下層生存空間的慷慨，更沒有給予中下層個人發展空間的雅量。他們也不是右翼。英國人走了之後，香港的右翼是真空的。

主場空虛之下，滋生了「潛主政治」，統治香港的是中共、本地地產霸權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財團的曖昧結合體，他們瓜分香港利益，卻不會為香港整體前途着想，也無法用正當的制度來現身、落場，面對民眾的挑戰。至於香港的在野黨和壓力團體，由於成長於英治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也與統治香港的英國政府有共同的價值體系，故此在英治時期如魚得水，然而他們的鬥爭只到了一半，香港的主權便落在中共手上，他們無所無所適從。他們懼怕中共和美國勢力，不敢高舉本土利益，也由於他們以和平協商的鬥爭方式起家，無法採取勇武鬥爭的新策略。

不論是民主黨還是社運人，他們都是自居於邊緣而不夠膽進入主流，不夠膽建構主場。香港的民主黨是不捍衛本土的，香港的社運人是不反對中共殖民香港的。民主黨做可持續的議會反對黨，社運人搞可持續的街頭社運。他們忌憚現在的中共，就好似他們當年忌憚英國殖民政府。

左翼原本是社會的批判力量，社會的道義堅持，左翼攻擊的是人類的自私貪婪與權力機關的機械處事，攻擊的是資本集團的貪得無厭，官僚機關的殘酷不仁。可惜香港的左翼頭腦簡單，道德立場不牢固，容易被中港融合的福利收益所賄賂（福利ZOO的就業）、被援助弱勢者的道德光環所迷惑。

出於人人平等的粗淺觀念，他們抗拒用族群和風俗來辨別人性，然而，香港在九七之後，偏偏就面對族群差異問題。在福利事業上，香港的窮人與其他文明社會的窮人一樣，為了在窄縫中生存，往往繞過道德，佔一點小便宜（例如領取綜援之後隱瞞政府做散工），然而由於不礙大道，這都可以體諒的。只不過，香港面對的，是來自中共治下的窮人，一群勢兇夾狼的浪人，他們沒有家國觀念，沒有道德底線，為了生存，可以好像病毒一樣，敗壞收留他們的地方的制度和風俗，他們以無賴流氓的方式蠶食宿主。於是，香港的左翼攬住大陸的窮人，一起道德沉淪。

左翼的烏托邦理想，遺害無窮

為甚麼香港左翼不惜犧牲香港本土利益，也要袒護大陸新移民和自由行的來港權，千方百計抨擊香港不應該行使大陸人來港的審批權？左翼的信仰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socialist utopia），過渡到這個烏托邦，可以忍受一切，可以摧毀傳統文化、可以摧毀地區福祉，因為他們相信烏托邦的報償，會大大抵銷了眼前的痛苦。當年的中共，也如此嘗試，結果潰敗，改行國家資本主義。然而，香港的左翼是一群空想社會主義者，他們寧願相信中共仍 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故此他們在目前維護中共。由於他們沒有條件與中共交換，也不會從事革命，他們只能用在地的香港資源來交換他們實現革命的資本，故此，他們一直做出各種賣港行為。

香港的左翼維護大陸人，但他們絕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不愛華夏文化（他們從不保護香港的正體字和粵語教中文），他們很多擁有美國或加拿大的國籍。他們也不鼓吹華夏一統，他們要的是：多

一、消滅資本主義

二、實現工人階級大團結

三、磨滅族群差異

四、消滅民族國家

五、建立全球社會主義

他們的總體目標是建立全球社會主義。限於形勢，這五點，他們目前只夠膽講一、二、三、五，因為他們在香港要依賴中共的姑息，第四點他們不夠膽講。基於第三點，中共用簡體字和普通話來消滅傳統及磨滅地域文化，香港的左翼是贊成的，因為這有助於瓦解華夏文化，最終消滅民族國家。然而，由於他們沒有執政能力，也不準備革命，在香港和中國出現文化真空，只會被美式文化殖民，故此他們只是美國殖民中國的幫兇。這也可以解釋到，為何源自英美的跨國NGO和親美的民主派政黨，會為香港的左翼提供職業仕途。

(五) 香港的本土價值與確立主體性

正如《香港城邦論》所述，英國殖民統治帶給各種香港先進技術，也保護了華夏文化及本土風俗^{十二}，然而由於香港在殖民政府撤出之前，並無完成本土族群論述及實踐全盤民主政治，故此無法將英治時期的優勢本土化，建立香港的政治主權意識及文化主權意識，即使政治學者及文化學者可以鼓其如簧之舌，談論民主政治及文化自主，但說食不飽，未曾實踐的事情，終究不能用在自己身上。九七之後，港人只能用中港利益衝突和與中共的民主鬥爭，補救九七之前未完成的解殖過程。

從解殖鬥爭之中，培植香港人的主權意識

港人鬥爭英國，如在九七之前的左翼及民主回歸派的反英鬥爭，是輕而易舉的，有民族大義支持，有中共秘密援助，英國也是發展了的富國，打擊英國沒有道義負擔。然而，大部分香港人不會參與九七前反英解殖的鬥爭，因為英國在香港保守住自由，也傳遞着文明，英國人不能成為解殖鬥爭的對象。香港在戰後

^{十二} 《香港城邦論》，頁一六九至一十四。

也因為處於中美大國冷戰之地，遽然來港的大陸難民也為此地帶來工業化，英國將香港培植香港成為接近自治領（self-governed domain）一樣的自由城邦^{十三}，而非典型的高壓殖民統治，故此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的香港，其實似在建國多於在被英國殖民^{十四}，這種幽深的政治現實，當年沒幾個香港人看得清，但香港在英國統治之下，欣欣向榮，香港以獨立的名義參與國際事務，揚威海外，那是香港人着實感受得到的。

九七之後，英國撤出，港人就用中共來填補這個空缺，這也令到港人陷入思想的困境：中共是同族，中共也是弱國，中共派遣來港殖民的大陸人，大部分是窮苦人。這是殘忍的鬥爭，但香港人不這樣鬥爭，對香港人是殘忍，對大陸人也同樣是殘忍，因為香港的制度搞壞了，香港不能前進，中港兩邊是兩敗俱傷。故此，反共保港（也是保華）的城邦自治運動，需要採用現實政治的成熟世故態度。一個擁有一百七十多年歷史的城邦，面對大國政治，也應該有這個成熟世故的處事方式。

殖民地民主化運動的主體，不能用虛幻的普世價值論，而要以本土民族主義或族群利益運動為本體。甘地領導的印度獨立運動，除了驅逐英國，實現民主政治，還有經濟自主（甘地的土鹽長征和手工織布機）、文化自主（甘地的印度苦行僧服飾），而非僅僅訴諸一個割裂開來的民主運動，而且抗拒本土文化，好像我們香港那種高舉普世價值的民主普選運動。^{十五}堅實的民主運

動，必須要牽涉總體，從個性覺醒、文化覺醒到經濟和文化主權覺醒，匯流到政治鬥爭之上，這樣才是全體參與而又各自分權自主的民主鬥爭，這樣的民主鬥爭的結果，才會是民主政治。香港的民主鬥爭之所以三十年不能成功，就是因為那是孤立的民主鬥爭，是假扮的、兼職的工餘運動，不是真實的生活運動。

九七之後，香港民主派政客講愛國主義或講普世價值，目的都是一樣：用民主中國論來拒絕香港本土或華夏傳統，用普世價值來架空本土文化及本土利益。

在香港，愛國主義與普世價值，同樣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土共講愛國主義，民主派講愛國主義加普世價值，民主派的說辭，就是大一統的民主中國。故此，民主派在二〇一〇年的政制改革方案建議擴大保留功能組別，李柱銘提議保留選委會提名特首候選人。這就是他們的愛國主義加普世價值。

十三·

近年英國政府的解密文件，可證明此說。英政府甚至在九七之前在部署香港民選總督或設立民選的副總督或民選首相（chief minister）的選舉方案。香港民選元首，即是將香港變成自治領（dominion）的做法，香港自治，英女王只是象徵的統治者。參閱〈30年前英研民選港督 全擁行政權力 豁中方不滿無提出〉，《明報》，二〇一四年一月四日。

採自讀者Tong Chui在我的面書回應。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十四·

參考無待堂的網誌文章〈可以做雪霜，不可以任凍桺〉，二〇一三年四月二日。<http://dadazin.com/journal/2013/04/falling-snow/>

在政壇講普世價值，往往是自我矮化、自我侮辱的詞。你有聽過英國政客、德國政客、日本政客、韓國政客、美國政客終日講普世價值的麼？普世價值例如自由、平等、博愛之類，是根植於社會的文明歷史，只要自認自己的族群具有悠久文明，就好少講普世價值，即使提及自由、平等之類，都會由自身的文明歷史講起，將普世價值結合本土道德文明來講。在文明國家，聯合國是被嘲諷的對象，因為聯合國的標準，是最大公約數，即是總括各個民族文化的小標準（最基本的標準），是現代文明的底線，而不是制高點。只有發展中國家，才會將聯合國的最低標準，視為瑰寶。我不是說香港不要聯合國的標準，而是香港要的是更有文化傳統和哲學深度的標準。做一個實驗吧：你口講普世價值的時候，是沒有心理壓力的。但如果你講仁義道德、禮義廉恥、天理人情、做人的道理之類的語詞，你會面紅心跳的，因為這是具體的東西，有歷史先例和文獻根據，不是憑空而說的抽象理論。

講普世價值的時候，你已經空出自己的文化傳統，自己一片空白的政客，才會講普世價值。故此，我提出華夏文明，好多民主派政客即刻大發雷霆，說香港文化是混雜的、多元化的，並以此來拒絕香港城邦論，說城邦論是自我封閉。如華夏這種偉大的文明體系，不論輸入的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如果只是強調這兩種思潮的普世價值部分，掏空自己的文化傳統來適宜它們，都是災難。例如中共勸人不要隨地丟垃圾，就寫「保持地方清潔是全世界文明國家的價值」這樣的標語。在我舊日生活的元朗鄉

(六)

華夏遺民與 香港族群的使命

大陸的富人、中產和窮人都蜂擁往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香港人愈抗拒他們，他們愈要來。香港是華人地區治理得最好的地方，中西文化結合得最恰當的地方，華人生活得最自在的地方。在台灣有意去中國化之後，香港人被逼變成上天要復興華夏的選民。這是香港人的使命，也將是香港人的集體信念、集體神話。

建立主體，是自立自主的第一義，也是脫離殖民，文化自立的第一義。香港要自立，必須要本於華夏文化的仁義，高舉西方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博愛之類，只是空掛的，無本族歷史根本的，大家都不知如何實踐的，於是就被外來政權操弄，不管那外來政權是俄羅斯還是美國。

村，在公眾地方吐痰、丟垃圾，長輩的教訓是「不成體統」。上一代的香港文人，不會口講普世價值，他們會先講仁義道德、禮義廉恥、天理人情之類的華夏文明，也會講本土的街坊人情。口講普世價值，是坐待文明國家來打救自己、啟蒙自己，講普世價值的時候，已經自我矮化為發展中國家，甚至野蠻部落。

香港要奠定本土的族群意識——即是香港人的意識，從而建立本土的道德承擔，本土的政治思想，成立有執政意識、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政治建制（establishment）。如此，才可以補充英國殖民地時期的缺漏——政治意識匱乏、政治人才不足、經濟體系不全。全方位建設香港，並且在中港的利益衝突之中，與北京中央和鄰近省市周旋，捍衛香港地方政府的利益。香港獨立或自外於中國，並非良策，因獨立之後仍要建立對外關係，說不定要輸送比現在更多的利益，喪失比現在更多的自治權力，才可以自保於中美之間。

香港是中美必爭之地，他們統治香港，需要香港人的默契，只要香港人形成本土意識，進行本土政治，分辨族群利益，香港人就可以奠定自己的主流意見，知道公共道德的所在，從而建立當家意識、主場意識，支援政黨形成執政意識，在普選之後，就可以為香港重新訂立建制。

香港不能「去中國化」，必須重認華夏身份

香港能否去中國化？有人認為，將中國的東西學到手，就可以稱之為香港本土，而去中國化。大家想一想，為何日本學了中國的文化、西洋的文化之後，揉合成為現代日本文化，卻不必自稱華夏文化國？答案是，日本有自身的、深厚的日本本土文化，日本是用自身的文化來吸納中華和西洋的。華夏文化進入日本，並沒有破壞日本自身的文化。

香港沒有自身的本土文化，台灣也沒有。台灣不能去中國化，香港也不能，因為兩地都沒有一個在華夏文化進入之前、事先存在的文化主體。而這個文化主體要有自己的神話傳統和宗教信仰，可以支撐得起一個社會結構，類似日本的天照大神和天皇世系，可惜，不論是嶺南還是台灣，原住民文化被華夏移民破壞了，成不了主體文化，台灣還有殘存的原住民，香港更沒有留下非華裔的先存文化主體。香港的本土文化，是華夏文化的本土化和西化。香港不能去中國化，就是這個原因。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近似波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s*），不是漢人。如果原住民主動漢化而台灣沒有甚麼福建移民大量進入，則台灣有台灣自己的文化，好像日本那樣。但事實卻不是這樣。主張去中國化的民進黨，他們也是漢人。玩政治最蠢的，就是以為能夠改造自己，成為外國人，夢想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個州。這種改造不會成功的，更會反過來被人殖民，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香港的本土政治，必須建基於真實的、沉厚的歷史之中，那就是香港人的遺民身份。中共的權力是真的，但文化意識是假的，在文化上、精神上，中共不堪一擊。香港人要自立自主、港人治港，必須要活在真實的文化感覺之中，以真鬥真，真金不怕洪爐火，才可以在中共的淫威之下，取得自主權。

商末，紂王暴政之下，出了三大賢臣，曰比干、微子、箕子，均為後世敬重。比干死諫紂王而被害，重義輕死；微子委身存祀，有所不為。箕子用智力與暴政周旋，只待時勢一改，天下歸正，他保存的商朝風俗，可以將仁義王政，重新發揚。

香港偶逢歷史因緣，保留中華遺教，承繼英國制度，中英文化之精華，不意兩者兼得，有若微子之抱祭器出走，保存文明禮樂（「存祀」）。九七之後，香港亦遭逢不幸，要親自抗拒暴政，再無寄託英國之憑藉。^{十七}中共來自蘇維埃境外殖民政權，所謂「王者不治夷狄」^{十八}，香港與中共無親，不是比干之於紂王，不必撲上去保皇，不設實際地感化暴君，如此只會落得慘死收場。

香港要學的，不是比干的孤忠，而是微子保存文化的苦心與箕子明哲保身的智慧。箕子在商紂王的暴政之下，不採取比干的苦諫而殉國之法，不採取微子去國而存祀之策，而甘願留在商朝，明哲保身，以期復興。與之比對，中共乃商紂之朝，委身中共、剖心瀝血而欲以「第二種忠誠」來感化中共的，是比干，如香港的劉山青、程翔諸位先生。出走而保存華夏精銳的，是微子，如國府抱住典章禮樂與宗廟祭器而敗走台灣。留在中國而姿態淡泊、如神龜曳尾於塗而保存文化的，是箕子，正是香港。故此，

香港的文化以市井文化、潮流文化為主，有一點韋小寶的江湖氣息與臥底精神，但也抱持正氣，正是箕子之學。商朝的三位賢良，孔子同等歌頌，稱之為仁人。「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論語·微子》）

香港人託庇於英國的殖民統治，「披髮佯狂而為奴」（《史記》），忍氣吞聲，明哲保身，保存了華夏文化，也以現代憲制及英國典章制度，復興中華。箕子乃殷商貴族，出任商紂王的太師（王朝教師），周武王仍封箕子於朝鮮^{十九}，箕子文化自立，受周王朝軍事保護，但不向周王朝稱臣。^{二十}

本節取材自《香港遺民論》，香港：次文化堂，二〇一三年一月。第四章，「前朝遺民論——香港族群理論之基礎」，頁一一一至一三八。

十七．寄託英國也是為奴，然而不及寄託中共之可悲。

十八．出自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蘇軾認為宋朝只宜自保，毋須教化遼國。

十九．箕子是商紂之兄（另說是叔父），封地在朝鮮，中國遼西一帶，後來朝鮮被燕國所滅，朝鮮人遷移到朝鮮半島，是為今日之韓國。

二十．根據《基本法》，香港人是不向中共稱臣的。香港人不納稅予中共，不入黨，不參軍。香港人只是此地的居民，不是中共國民，護照也是分開的。

(七)

中港區隔， 基於華夷之別

香港城邦自治之論，是基於儒家學說的，香港那些反對城邦論的評論人，一見我的城邦自治論、中港區隔論，就以為我是主張中港隔絕、香港獨立，但見到我的華夏邦聯論，又說我是大中華主義者。他們不知道，我的香港城邦論與華夏邦聯論，是基於儒家的夷夏之別或華夷之別的觀念。先秦時期，中原地區，諸夏與九夷的文化差別不大，都是祭天敬祖的民族（巫教信仰shamanism），可以彼此奉對方為宗主，所謂禮失求諸野，例如根據《孟子》之說，舜是東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孟子·離婁章下》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孔子說，如果諸夏之地容不下他，他就去九夷之地居住，《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左傳·昭公十七年》更說，華夷的學問是共通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天子喪失了自己的職守，官守的學術就散落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所處之地。）

我稱中共為蠻夷，但不稱中共為異國、外族，就是用儒家的夷夏觀念。夷夏必須區隔，以諸夏教化蠻夷，但夷夏同在漢土，始終是一家。故此用邦聯的關係來維繫中國大陸與香港城邦，是符合儒家文化的華夷之辨的。

儒家的學問，極其精微。反而，英美外國，是外族，是番邦，不能用夷夏之別來看待。美國佔領香港之後，香港會變成台灣，去中國化。香港將有很多本土庶民文化，街上很多咖啡館，很多悠閒男女，唱一些言不及義的情歌，舉國變成孤魂野鬼。現在的台灣，就是這種情況，孤魂野鬼。香港的左膠很喜歡台灣，因為左膠就是孤魂野鬼。所謂孤魂野鬼，是失去了本家祭祀的流離狀態。

若以仁義而言，華夏與歐美文明國家差別不大，都有普世價值。但以宗教風俗而言，華夏與歐美或伊斯蘭國家，仍有很大差別，這是巫教與一神教的差別。儒家信仰，是巫教信仰的文明化，故此華夏的概念，可以涵蓋東亞諸國。

(八) 香港主場的政治哲學： 保守主義

自由與平等，是現代社會的兩大價值觀，也是兩大互相拉扯的意識形態。不妨礙人民發揮活力，是自由，賺錢之後要交稅，就是為了平等。大多數歐洲的民主國家，都是左右翼兩黨輪替執政，如英國的保守黨與工黨，德國的基督教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這是保守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制衡。

雖說是政黨輪替，但一般而言，右翼政黨的當選的機會大一些，執政時間長久一些，為甚麼呢？現代化就是用科學理性和專業分工的方法，拆解傳統社會的自然締結（家庭、宗族、鄉社、行會、師徒、幫會等），實現科學理性的統制，故此現代社會更加需要不斷復興傳統，以對抗現代科學管理的冷酷不仁。

要實現合理的現代社會管理，一般是在本國之內用公共行政權力來判斷和分配，然而，這種願望往往落空，因為公共行政權力要行使得好，科學理性要實現得合理，需要一個恆久對話和調整的過程，而這個調整過程，需要權力的對等，例如一個村社與一個地方議會對話，就是對等的，但一個孤立的市民個體與一個地方議會對話，即使那個議會是守法的和民選的，那位市民也會

吃虧，也會受到欺壓。制衡現代國家官僚統制，當然可以用現代的NGO（民間組織）、跨國正義組織，這是左翼社運界鼓吹的方法。然而，NGO是基於公民的理性結盟，而且頗多NGO受到本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特別是美國）的補貼和控制，其威力難與植根於神秘締結和強制義務的本土傳統組織（如家庭與宗族）相比。

英國保存了港人自由

英國統治香港，放棄國家統制的快速現代化的方法，用的是提升民間權力與自由的漸進方法，民間社會（宗族、村社、師徒等）由中國大陸逃難下來香港，得到英國適時的保護，令民間社會可以在現代社會獲得幾十年的生長機會，變成現在香港的蓬勃自由狀態。舉例，舊式的屋邨管理，就容許同鄉會在公眾地方設立社壇和祭祀，也容許家庭在門口安放土地神，在走廊打麻雀聯誼，令屋邨變成現代村社。

以舊時英國殖民政府的威權，它可以隨時取締在屋邨走廊打麻雀和踢足球，禁止在走廊之間挑擔叫賣腐竹糖水和鹵水雞翼，但英國政府將權力克制住。這是為什麼？為了保存香港民間社會的自由。因為英國政府知道，只要它用力一捏下去，香港就變成新加坡，香港人就變成機械人。

九七之後，這種藏力於民、在社群裏面厚植力量的英國政術消失了，香港採取了法西斯式的官僚理性統制。我們老一代香港人，仍保有飽滿的個性自由、時刻提防官僚專制的警覺，應當感激英國的保守主義統治。

社會主義運動，導向官僚專制

香港也有社會主義運動，這些左翼政團不能執政，但在九七之後，香港失卻殖民政府居中調停，卻促成了福利主義思想。社會主義運動強調的就是所謂無產階級跨國界合作，但在十九世紀歐洲，國族運動興起，民族意識成為維繫國家體制之主導力量，跨國組織亦無辦法保持團結，第二國際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土崩瓦解。列寧有見及此，一戰後成立第三國際，意欲提供一全新模式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但隨着史太林奪權，社會主義發展再回一國體制之內，蘇俄利益優先。

戰後發展的社會民主主義及福利主義，亦無法脫離國家體制，要財富再分配只有依賴政府為首之公共行政權力，將其民主化與制度化，低下階層的民生訴求就可成為政策主要成分。左翼依傍的公共行政權力，正是左翼政治的恐怖之處。這是韋伯的官僚理性批評，政府福利政治代替民間自力救濟，最終令官僚階層坐大，公民自由萎縮，政府架構與民主政治脫離，自成龐然大物，為科學理性的威權政府開路，也滋生消極公民社會。由工業化開

始，導致宗族、鄉黨被消滅，就決定了政府坐大，個人依賴官僚的時代（昔日的大家族有救濟、司法等功能）。而左翼，是上承這種思維的產物。因此，無論是共產主義，抑或社會民主主義，其根本，皆是信任政府委任的官僚可以主持公道。

社會網絡比公共服務更可靠、更有效

本土主義（localism）是以族群文化及傳統團體為本的生活，警惕那些普世價值論者、跨國商業集團、跨國民間組織、政府行政官僚，使到他們不能成為社會網絡的代理人。它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而是審慎的現代化。

香港託庇於英國高官統治，高官很多雅好華人風俗，政府培養的中產階級，卻不容易否定自己，空出傳統生活，輸入西化風俗，精神上採納左翼或右翼的意識形態，香港左翼的福利社會思想、右翼的自由市場掛帥，各走極端，但都是挖本土的牆角的，在英國人主政的時候不會出事，英國人撤離了，就會糊弄本土社會。

本土主義強調的是政治忠誠及傳統信仰。進入現代化之後，傳統社群與理性社會處於角力關係，這是community vs society的現象。自然締結的社群，以家庭為本，是永續發展的，由於報償期很長，甚至橫跨幾代，故此有在地的忠誠，不斤斤計較，講究的是責任倫理，傳統社群裏面也有不合理的獨裁專制，如家庭、宗

族、宗教團體等，有權力的人卻是負責到底的。理性締結的社會關係，如僱傭關係、經濟委託關係、社工與客戶關係，社會服務團體等，是可以轉移和遊走謀食的。講求的是意圖的正當性，靠道德感召，用的是意圖倫理。共產主義社會是最極端的意圖倫理社會，但實行起來卻是戴上道德光環的官僚專制。

保守主義是英國反省法國大革命之後衍生的思想。保守主義是鬆散的傳統智慧，一直到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一七二九年至一七九七年）寫下《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七九〇年），才成為有系統的政治思想。法國大革命主張人民有權選擇和設計其理想生活，人民會依照自身的理性主導其生活和交易。但伯克懷疑人民的理性判斷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個人最好是依靠於民族的既有傳統，將裏面腐敗的、不合理的內涵更新，逐漸替換不能代表全體利益的主理人，保留傳統，將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拋離傳統而單純依靠理性來生活。這樣太危險，也沒可能實踐理性，因為理性需要一個角力的對象。剷除了傳統來實踐理性，結果是被逼創立一個不存在的敵人（例如共產黨的階級敵人）來給理性攻打，無中生有。

比起純粹抽象的事物，例如理性，傳統更可靠，足以安身立命。傳統經歷了幾個世代的智慧和考驗，逐漸改良，內涵豐富而靈巧多變，傳統是高傲的，同時也是寬容的，它容許若干漏洞和

矛盾而不加處理，脫離傳統者可以寄情物外，高傲的傳統信守者不屑去追趕逃逸傳統的人。理性則可能只是一個個人或一個學派的偏見，不但未經時間的考驗，最多只能代表一時的智慧，卻是系統嚴密，違反者無所遁形，必須緝拿歸案，遭受懲罰。任何既有的價值觀或傳統都是經歷了過去的時光考驗才流傳下來的，因此都值得尊重。保守主義也不反對變革，伯克嘗言：「無法接受改變的國家是無法生存的。」然而，變革必須是深思、有條理的改變，而非突然爆發的革命。革命為了某種理論或學說，會試圖改變人類社會中複雜的人類互動關係，這將會造成無法預料的後果。人類社會來自幾萬年的演化，文明社會也有幾千年歷史，由於習性根深蒂固，且被風俗及神話遮蓋，理性原則不易發現，為了達成某種意識形態的計劃而隨意修改社會結構和文化風俗，災難無可預料。

保守主義高舉財產權。沒有任何東西比財產權利更為神聖的了，財產權使得個人的利益得到保護，遠勝過那些華麗卻不實際的社會革命理論和改變社會的承諾。如果政府存在的目標是為了保護財產權利，財產必然是先於政府存在並且完全獨立的。這些獨立財產擁有者，交出權利（如武裝捍衛莊園的權利），放棄自然狀態，授權給政府，這種社會狀態，才叫做國家。伯克的思想，類似儒家的復古更化，不主張激烈的變革，而遵從傳統，逐漸更新和改良。

保守主義者置疑工會，特別是那些橫跨整個行業的總工會，動輒發起大聯盟行動的總工會；個別行業的、小型的工會還可以信靠，總工會容易有自身的組織利益（例如爭取議會選票多於工人福利）甚至官僚利益。我們應該用個人、用家庭的傳統組織去講社會，建立政治忠誠。那些可以隨便進入或退出的組織，不能建立政治忠誠。

香港那些抱持普世價值論的，非常信任政府和理性社會組織，而懷疑傳統組織。他們的思想接近新自由主義。香港在八九十年代之後，左翼和民主派忽然高舉普世價值論，而它是伴隨新自由主義一併出現的，故此香港的政團與財閥都行動一致。普世主義、財閥剝削及中共殖民侵略，在香港結成詭異的聯盟。

香港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不太依賴市場的商業服務。那年代香港還有些社會網絡，我們除了靠市場滿足需要外，會靠鄰舍照應，可以幫忙買菜，照顧小孩，修理家具，幫忙補習，嬉戲，社會網絡當然有其弊病，例如賒借金錢不還，無故滋擾，不重視私隱等等，但社會網絡總會淘汰這些不負責任的人。可惜，踏入八十年代後期，英國部署撤離的時候，社會也爆發移民潮，之後的社會發展，不重視網絡維持與建立，譬如北角邨、牛頭角邨等舊區的瓦解，及建築格局改變，不在培養鄰舍交流及公共空間自由使用，中產私人住宅區也不重視社會網絡建立，地產財閥乘虛

而入，將屋邨設計得私隱過度，原因是社會網絡越強就發展不到市場的商業交易。此外，高地價政策之下，頻繁的房屋買賣也無法形成鄰舍關係，大家只能依靠商業交易。

保守主義的主張：小政府、大社會

市場不是社會。保守主義的主張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保持克制，不貪功，不擾民。在戰後到八十年代中期，香港都是循着這個方向，藏富於民、藏力於民。然而，踏入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橫掃香港的輿論界，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商家說政府沒有效率，而且市民不能做主，最能夠做主的是消費關係，付款買賣。於是港人用市場解決需要，小朋友照顧或發展交託給補習社、興趣班，而不是親族和鄰舍；我們不信任官立學校，付高昂的費用找更好的學校；我們不去郊遊和打網球，去卡拉OK房間消費，度過空閒時間；有問題找社福機構和社工，年老找老人院照顧。人倫關係變成買賣關係，教得不好的老師遭受家長或學生評核而離開市場，消費者主導一切，過往的師生關係變得薄弱，知識教育還可以維繫，但道德教育也就垮掉了。

市場自由主義認為政府要減少干預，因為政府不知道甚麼是最好的，每個人可以透過市場獲得你需要的，但這種生活方式是講求成本的，尤其在九十年代末期，當香港本土產業空洞化而外來資金氾濫、港元掛鉤美元而跟隨貶值的時候，失去社會網絡的

支援，市民的生活費用變得昂貴而貧困。市場被地產財閥壟斷之後，生活變得越來越貴，於是我們不再自由，不少家庭申請綜援福利過活，生活方式落入行政官僚安排。[二十一](#)

要恢復香港的保守主義政治傳統，仍須我們的歷史反省，香港在普選之後，接續香港的八十年代。

保守主義反對福利社會

二〇一三年四月，立法會辯論財政預算案的時候，在野政黨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簡稱「全民退保」），除了商界循例反對之外，輿論沒有太大的反對，這是危險的徵兆。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將公民的私人財政委託予官僚組織，這比起強積金（[三〇五](#)）更加凶險。香港的公共議程的理性討論不足，故此反對派也是進退失據，經常為了「找點事做」，便將福利主義視為安全的反財閥政治議程。連帶香港的左翼和好多勞動者，都看不清楚福利主義的危害。

海耶克在《到勞役之路》反對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他的道理好簡單，金錢應該留在人民手上，而不是信託予官僚組織——即是國家，因為信靠官僚組織保管人民的經濟權利，不如人民自行處理。官僚是無辦法知道每個人民不同需要的，他們只會劃一管理，將人民的需要標準化，將真實的人變成一個需求社會服務

的抽象單位。久而久之，人民的自治能力削弱了，社群關係被官僚組織替代，成為無法反抗的奴隸。現實中的共產主義，可怕之處在此。即使是以民主來治理的福利國家，也犯了官僚組織擴大而社群力量削弱的弊端。原本在家庭、親族、朋友、鄰里、社區經濟圈的互助關係，被官僚的社會服務取代，地區理性、本土知識、文化傳統、人際感情統統消亡，被諮詢委員會、跨國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教育機構及社工與輔導員取代。左翼社會活動家和工會人士當然喜歡這種福利制度，因為他們就是這種制度內的寄生蟲。

我一向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除了上述伸張個人自由的政治道德原因之外，也是由於香港並無福利國家的基本條件——極有公民活力的憲政民主，以及高度統一的國族意識。在城邦民主未建立及城邦族群未確定之前，香港不宜採用這些福利主義的政策。民主確保基金受到監督，族群確保你願意為你的同胞彼此付出。這是政治常識，也是很嚴肅的問題，可惜香港無人討論。

以行政技術而言，用全民集資（pooled money）的方式來保障整體福祉，是十九世紀的思維。將龐大的退休供款放在投資基金之內，在二十一世紀初年見到的全球金融市場的環境下，是毫

二十一 · 部分內容，參考由William Yeung Yik Sang的面書留言，二〇一三年六月一日。

無保障的。首先，金融衍生工具、貨幣寬鬆政策、債券評級詐騙、橫桿交易、運用超級電腦組合散戶的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等，已經令股市變得高深莫測，與企業業績脫鉤，往日的平均投資法（cost averaging）的回報保證不再，隨時賠上本金，血本無歸。平均投資法靠每月投入若干供款購買股票，即使股市週期波動，但大致股市是向上升的，長期投資之後就有回報，這種規律，今日已經不再可靠。冰島等福利國家的公共投資失敗，令國家賠本，就是福利主義在今日走到盡頭的明證。

另外一個局限條件，是當今不是二十世紀中葉、二次大戰剛剛過去的僱員黃金時代，現在僱員的收入不穩定，企業外判和削減規模，工業和商業的產值鏈瑣碎化，令到勞工無法養成技術、職位降級、資歷貶值，供款殊不穩定。大家以為別人會幫自己供款，其實是自己找自己的笨。

將錢財留在小市民手上，獎勵家庭儲蓄、補貼公共房屋、保護社區經濟、小企業、宗族、教會、社團合作社、街坊老店、半工半農、本土漁業農業等永續的、來自傳統的在地社群網絡，才是香港應該做的事。這是右翼的保守主義，也是最有力對抗官僚宰制、跨國兼併及全球化金融剝削的政治思想。香港將來的主流，應該是華夏傳統加英式保守主義，而不是福利主義。當然，保底方式的福利救濟是必須維持下去的。

新自由主義與人道馬克思主義的合謀

美國如何運用跨國財閥及擺佈香港左翼陣營，割裂香港的階級合作，並摧毀香港族群主體意識，間接破壞華夏的復興？

一、香港跨國財閥的新自由主義，要香港政府放寬管制，容許財閥謀取暴利，化公為私，壟斷的經營，惡性的破壞（例如明知便利店是賠本的也要經營，目標是摧毀香港的街坊小店，破壞本土社會互助網絡），令香港產業單一化，摧毀本地的企業創新。

二、香港左翼的普世價值論及平等論，是幼稚的人道馬克思主義。左翼用似是而非的詭辯，破壞香港的本土保護鬥爭，將香港本土的生存空間開放予中國殖民及跨國資本集團謀利（傾銷商品及服務）。

三、香港下層社會備受跨國財閥及中國殖民的雙重壓迫，激起自保意識，但這種自保意識不能被中產階級及主流傳媒導正，限於情緒化的排外及憎恨。

四、中產覺得本地低下層民粹化、本土派民粹化而產生厭惡，不願意留在香港，形成離地中產，也會部署移民美加。

五、結果有三方面：

甲、跨國財閥取得香港利益；

乙、中產階級被逼移民，無法在香港推行華夏文化創新；

丙、低下階層、青年感到失敗及無出路，香港族群的文化意識無法形成。

美國得到香港的錢、人才，也摧毀了香港族群及華夏復興。美國的大國政治，就是這樣玩，香港人明白左翼的惡毒吧？

在這個剝削架構內，中共是依附於美國的。中共無可選擇，被逼賣國。除非香港城邦自治成功，可以扭轉局勢，否則香港解體或成為美國附庸國，中國則會滅亡及分裂。分裂的中國，對於香港及台灣都是惡夢。清朝的分裂是無問題的，但共產中國的分裂將會極為危險，就好像俄羅斯分裂了一樣。

極右會以新自由主義之名，騎劫社會制度；極左會以人道馬克思主義之名，取消社會制度。只有保守主義，才會要求修正社會制度，以開放參與及說明問責的方式，把共同體內各方的利益慾望及道義訴求，用政策安排來做到利益區隔及互相妥協。

主體性的顯立，來自本地共同體的身份認同，而共同體的身份認同，則來自制度生活及歷史傳統。然則，左翼將資本制度的社會，視為資本主義世界鏈，將議題擴大，再以 NGO 的方式，模仿上世紀團結國際無產階級一樣，「團結國際弱勢社群」，向世界資本主義世界討福利，然而在放棄制度憑藉和公共行政理性之下，必定加速人口殖民及資金跨境，正中財閥下懷。

(九)

香港的自由論與 平等論的華夏根源

香港位處嶺南之邊陲，而為英國統治一百五十多年，香港文化的性格，乃華夏遺民的儒家思想及英國王朝之保守主義，然而亦因為保守，故此也包容異端。一個道德修養到家的保守主義者，是以憐憫的眼光包容和寬恕別人的，因為他們不會認為那些異端可以動搖他們的道德和社會地位。異端者不入流。

有修養、有能力的人，才可以對敗德者講包容和寬恕。沒修養、沒能力的人，只能怯懦和姑息。現在香港那些講包容大陸敗德者的言論，只是出自怯懦與姑息，是一些沒有自知之明和不自量力的蠢人囁語。香港城邦自治之後，我們會對大陸的敗德者講

寬恕和講教育。現在還不能，時機未到，條件也不具備。智、仁、勇，三達德，智在仁之前，勇在仁之後，仁居中而不變改。此乃儒門正教。

自由為本，平等為輔

人類社會的兩大價值觀，是自由與平等，社會制度的差異，也由該社會是推崇自由抑或平等而來。香港秉持英國的保守主義政治，核心價值觀，是自由，而不是平等。但在九十年代之後，自由變成市場的自由，而不是個體的自由、社會組織的自由，於是自由在香港陷落了，變成要求平等的思想肆虐。

自由不可怕，平等才可怕。德國的納粹主義秉持的價值觀是自由，是以國家自由、民族優越性及上天選民論為主的，是法西斯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合，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大和民族優越論），故此除卻納粹黨、除卻軍國主義，民族仍可復興。共產主義高舉的價值觀是平等，以剷平高貴階級的文化為手段，故此共產主義如果徹底推行，那個文化就亡了，顧炎武講的「亡天下」，沒得救。在這方面，中共比俄共推行得徹底得多。

一切高舉普世價值而踐踏本族傳統文化的思想，都有機會發展成為法西斯或成為法西斯的幫兇。保守主義也有一點排外，例如文化保守主義的日本就是排外的社會。但那是基於民族文化保

育，而不願意被外族文化掩蓋。如果大家要想像一下香港城邦自治之後的圖景，不妨看看日本。當然，華夏文化復興會比日本的開放得多。

《中庸》誠明之道

港人誠實面對自己，在真理之中來解放自己，實現自己。這個道理，啟發自捷克的文人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一九三六年至二〇一一年）的活在真理中（*Living in truth*），更來自華夏儒家的《中庸》心學。我可以準確預測事情，撥動香港各方圍繞本土政治本土文化而轉動，而不是圍繞境外政權（中國或美國）來轉動，改變香港政治系統的轉動中心，做到西洋觀念的革命——revolution（改變轉動系統的中心），也由於發揚儒家的誠明之理，做到「至誠如神」。

以下引《禮記·中庸》三章闡明：

第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語譯：由至誠而自然明白善道，這叫做天性。由明白善道而至於誠，這叫做人為的教化。誠則無不明白，無不明白道理也就做到誠了。

第二十二章：「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語譯：唯有至誠的聖人，才能盡自己的本性。能盡自己的本性，就能盡知他人的本性；能盡知他人的本性，就能盡知萬物的本性；能盡知萬物的本性，就可以贊助天地間萬物的化育；能贊助天地間萬物的化育，就可以與天地並立為三了。

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語譯：誠到極點，可以預知未來的事情；國家將要興盛的時候，定有吉祥的徵兆；國家將要滅亡時，定有凶禍的徵兆；顯現在蓍草龜甲的卦象上，表現在人的動作儀態之間。禍福將來臨時，是福可以預先知道，是禍也可以預先知道，所以至誠的人就像神明一樣。

革命，revolution（由動詞revolve轉動而來），是改變轉動系統的中心。民主革命，不是換政權，而是將政治的轉動中心由王室（或軍閥集團）變成族群或國族。我為何要鼓吹族群政治來推動香港民主，就是為了光榮革命。

華夏的自由與平等之論

華夏本有自由、平等之說，源自文王《易經》，孔子《易傳》。《易經》來自天地法則，天之道是乾，「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地之道是坤，「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華夏的自強，是不斷伸張自己的天性，與日月星辰並行，這與西方的自由類似，但確也不同。自強是君子必須做到的，小人卻不必做到的，能做到當然好。氣魄強大、有擔負、有能力的，叫君子；天賦不足的、不思進取的，叫小人，即是格局小的人。君子須自強，小人要安分。華夏在自強方面，在乾道方面，是分辨君子與小人的，不是平等對待的，故此華夏文化不會鼓吹格局小的人民去上進，要他們做大官、做大事業、開大莊園辦大學校，我們要保護小人的生計，令他們可以安守本分就好。故此華夏有坤道，坤道就是厚德載物，對格局小的人，性格偏的人，行為怪的人，君子要厚德，要包容，不要過於計較。

《禮記·中庸》開宗明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就要我們知道天命，知道自己的才性，知道自己是君子還是小人，自己的氣魄有多大，承擔有多大，能力有多大，就按照自己的品性而行，做自己該做的事，不要勉強自己，期間必須領受師長的教育。故此華夏特別尊師，這是其他文明所無。不論是格局大的君子，還是格局小的小人，都必須接受父母與師長之教，不可亂呼自由啊、人權啊、多元化啊，而胡鬧撒野，自暴自棄。此乃華夏之道，也是華夏之教。

傳承本土文化， 扶助民間社會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重建香港的世族與士族
香港如何替換功能？
殖民政府撤出，
麥理浩總督的歸化工程：
公共房屋及公費教育

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方法
區隔香港的民間社會
低下層安居樂業的秘密：

帝國的統治術：分而治之，
培養本土歸屬感
香港用社會建構，
中國用民族建國

香港自成天下，與民國無親。在文化上，我是貶斥民國的。民國主張的五族共和、中國民族一統，也是一樣的禍國殃民。廢棄夏曆、簡體字、國語運動、新生活運動源自民國，中共是變本加厲，推到極點，依次變成春節、規範漢字、普通話滅方言、文化大革命。民國禁止粵語電影，令粵語電影搬來香港製作。故此毋須港人高舉民國，民國破壞華夏文化的行為，一樣要貶斥。此乃金剛心，遇佛殺佛，否則香港死無葬身之地。

陳雲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面書留言

(一) 帝國的統治術： 分而治之，培養本土歸屬感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別，是帝國與民族共和國的分別。帝國不一定是採取帝制之國，帝國是指以複合而不是以國族統制的方式統治的地方，而且着重地方分權和容許地方處於例外狀態，兼且向外擴張勢力和締結關係。英國是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s），美國是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王朝時代的中國則是天下。大英帝國在一八四二年接管香港，用的是帝國的統治方法，尊重地方傳統和名流世家，分而治之，處處謹慎而漸進，這種複合的統治方法，令香港人可以自強不息也包容異端，鍛煉向外拓展國際關係和商業關係的能力，最終在香港建立金融中心。只有帝國，才可以擁有金融中心，英國、美國都是帝國，香港長期是英帝國屬下的城邦。中共要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痴心妄想，先用現代的方式恢復中國的帝國格局（華夏邦聯），之後才可以有活力來建立金融中心。

中國在一九一一年採用的統治方法，是歐陸的單一體制的民族共和國，即是國族的統治，將種族、歷史和宗教迥異的民族強

一：這裏是指向外擴張勢力和締結關係。

行稱為「中華民族」，歐洲的民族國家，是混合種族和文化，互相區隔，輔以地方分權而成，例如採取聯邦制度（如瑞士和荷蘭）。中國本來就是幾千年的帝國，而不是國族式的共和國，故此不論民國政府還是中共政府，都迫不及待要將中華帝國的色彩剷除——消滅漢音漢字、消滅士族、地方世族、地主莊園、僧道教團、地方語言及風俗等，中國沒了帝國特色，中國的文化就淪亡了。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摧毀傳統文化，情況如歐洲人進駐北美洲，就要屠殺和驅逐印第安土著一樣，建立新國家一樣。中國的災難，始於一九一一年。本書第一章之前講過了，民國政府遷移台灣之後，國家統制受到地方勢力的阻撓，台灣依照省籍而南北區隔，講國語的與講閩南話、客家話的漢人族群區隔，令民國的法西斯性格得以緩解。故此，是台灣救了中華民國。然而，台灣的歷史追溯和共同文化認同依然不穩定，五千年華夏文化固然少人認同，閩南人在台灣的地方歷史也難有穩定的參考。

我批判中華民國的錯誤建國方略（將華夏帝國的天下改為歐洲民族國家的狹隘國家），質疑五四時代的錯誤革新（貶斥華夏傳統而令國人至今仍是無主孤魂，寄魂於歐美）。然而，我敬重民國，敬重孫中山，敬重懷抱民國理想與忠誠的人。因為民國是失敗的英雄，曾經努力思考、勇敢行事而最終失敗了。敬重失敗英雄，是做人的美德。司馬遷寫《史記》，就將失敗英雄項羽，放在成功的流氓劉邦之上。至於中共，我鄙視它的一切。因為中共毫不思考，只是一群盜匪（所謂共匪），中共盜竊蘇聯的支持

盜竊中國的人力物力。中共是意外成功的一群盜匪。然而，無恥者無敵，他們是文明世界可怕的敵人。這也是我珍惜台灣的原因。台灣是失敗的民國在台灣的重建。中華民國的成功建立，在台灣不在大陸。民國的憲政、民主及民生建設，都在台灣實踐成功了。中共的成功，在於其無恥。這是魔界的修為。我叫大陸做地獄鬼國，是對魔界的尊稱。世上稱得上做鬼國的地方，只有中國大陸一個。

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

如何建立民族國家（nation building）？參考歐洲的民族國家建立過程，必須由帝國轉化過來，或由眾多城邦及諸侯國合併：

一、奠定文化傳承：認定一個共同的、悠久的文化傳統，如歐洲的希臘羅馬傳統及拉丁文獻。

二、建立國族神話：宣揚本民族的神話傳說，如北歐諸國的神話和傳說。

三、行政區隔：區隔各個族群、傳統經濟區域（如農業區、商港）及語言區或方言區，容許地方自治或聯邦自治。

四、憲政法治：訂立憲法，實踐憲政民主及法治，各依照其傳統，用成文法或普通法。

一般而言，一至四是順序而行，或者全部同時推行，但不可倒轉次序。在中國，全部做錯了，不單止次序錯亂，而且荒廢一二及三，只是偏重於四，然而中國大陸地區的憲政，從譚嗣同為君主立憲到宋教仁為共和立憲而殉難，至今一百年過去，憲政也不能成事。中國的淪亡，是由於五四時代的文人亂來，曲解歐洲的民族建國經驗。中國在五四時代鼓吹批判儒家及懷疑歷史觀，否定華夏的信仰和道德，懷疑三皇五帝的神話傳說歷史，然後否定儒家的三墳五典及祭禮，貶斥為迷信，並且貶低孔子為一個哲學家而不是至聖先師。行政上，實行中央集權，並且推行國語、普通話來消滅其他語言／方言。至於憲政民主，更加延擱多年。

城邦論用的是帝國史觀，與民初的共和國史觀不同。用帝國史觀，則民初的軍閥割據、聯省自治與租界林立，反而是恢復華夏帝國的好開始。

(二)

香港用社會建構， 中國用民族建國

香港和中國的不同，在於前者是帝國，後者是一個假扮的民族國家。香港在一百五十五年來，做的是社會建構（social engineering）^二，中國自一九一一年至今，做的是民族國家建立（nation building），這就決定了香港與中國乃至台灣的不同命運。

香港由於之前是華夏帝國的領地，故此從來沒有民族的問題，也不應該處理民族問題。華夏是以文明教養（仁義與五倫之教）和歷史歸屬（三皇五帝）來判定其民族性的，以三墳五典、四書五經、正體漢字、古雅中文、天地祭禮和漢音漢服來奠定，這是好穩定的民族性，英國在一八四二年從滿清王朝手上接過香港之後，邊界是開放的，英國從未將香港人歸化英國。英國在香港做的，只是用教育來鞏固這些華夏民族性^三，然後做社會建構（法治、工商業、公屋安置、公費教育、公共服務等）。對於王朝，

二 另譯社會工程，帶有貶義，尤其在社會學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之下。

三 六十年代的小學書，仍有教授華夏神話，如伏羲畫八卦、黃帝發明指南車、炎黃大戰、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之類的傳說。

領土和子民都是不要緊的，要緊的是帝國的文明能否普及。清王室丢失香港，英國王室丢失愛爾蘭、蘇格蘭，王室都是處之泰然的，沒有民族國家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焦慮。英國的保守主義政術，類似王朝中國的復古更化、託古改制，故此很容易在香港推行。以前的香港政府，是亞洲最現代的政府，卻用古文，官署的招牌用隸書（如廉政公署的招牌）。

滿洲帝國並無經歷君主立憲、傳統帝國走向現代帝國的過渡，中國在一九一一年之後，特別是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接管大陸之後，意圖在滿洲帝國的領土，以中央集權及國家統制的形式來建立一個民族國家，是膽大妄為。

英國在十五世紀經歷諸侯內戰（一六四二年至一六五一年），內戰的結果是由專制王權（absolute monarchy）轉到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君主立憲保留君主世襲制度，通過立憲，王室與人民立約，限制君主權力，實現共和理想，即是共和是國家由人民共有，執政者必須顧全國家整體和長遠利益，不可將政權公器私用（例如制定法律令敵對黨派不能參選之類），但不採人民普選元首的共和政體。國家元首是一位君主（皇帝、國王、大公、教主等）。君主是終身制的國家元首，王位世襲繼承，地位高於其他人民，享有特權（例如免罪權、赦免權、共有財產如森林的擁有權等）。共和體制（共和國）的元首是國民一員，有若干特權，但可以被定罪及入獄。英國是世上

最早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也可以說是世上最早行憲的國家。

一二一五年，英國國王約翰被迫簽署《自由大憲章》，規定貴族和教會的權力不受國王侵犯，限制國王的徵稅權力，以及保障民眾的自由權和財產權等一些內容。一六八八年，貴族以武力脅迫國王詹姆斯二世，定立國家議會，史稱「光榮革命」，英國議會於一六八九通過《權利法案》，規定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頒佈法律或終止法律的實施，不得徵收和支配賦稅，在和平時期不得招募和維持常備軍；臣民有向國王請願的權利；應定期召開議會，議員由人民自由選舉產生，議員在議會自由發言的權利，國王不得干涉；不得另設宗教法院或特別法院，不得濫用殘酷刑罰，不得在判決前沒收涉案人的財產等等。這樣就確立了議會至上，法院獨立，臣民的權利和自由不被侵犯等權力分立的原則，建立了君主立憲制的政體。

英國的帝國制度，說明帝制是漸進的（*incremental*），而且複合的（*composite*）的制度，容許多種制度複合，也容許國內的民族複合。權力的制衡，靠的是傳統的集團——貴族、宗教、學院、法官、行會、村社、士紳等，而不是靠一紙合約——憲法、法律、約章等，然後各自解散組織，服從合約。帝國可以擴張（例如殖民地時代的東印度公司）、結盟（英聯邦、歐盟）、分裂（南愛爾蘭分裂而獨立、蘇格蘭的分離運動），各自的組成單位，消亡之後，可以重新生長。

法國則推翻帝制，過往一切，一筆勾銷，直接建立單一體制的民族共和國，民選元首的制度被拿破崙騎劫，重新訂立（復辟）君主制，至今仍在受國家體制不適應之苦。中國建立民國制度之後，袁世凱也曾稱帝復辟。這些都是共和國制度的脆弱之處。後來歐洲吸收教訓，傳統的帝制國家一般轉向君主立憲或聯邦共和國。即使是瑞典、荷蘭、日本、不丹、汶萊這些版圖小的王國，本來容易適應體制改革，也甘願君主立憲，保留帝制。由此可見，以當年中國版圖之大、民族之複雜、制度之多元（藩屬、朝貢之類），廢除帝制建立共和國，是何其魯莽。

故此，民國政府或共產黨政府，都要假造一個中華民族，然後闡釋或構作其民族性，民國政府在大陸的統治由於早夭，民族國家之建立，由共產黨主導，共產黨用國家哲學（馬列主義）、新的士黨（共產黨）、新的國家語言文字——簡體字（「規範漢字」）和「現代漢語」來建構民族國家，然而這是失敗的，因為那個民族是虛構的，不是基於歷史傳承的。在民國國民稱呼自己做「中國人」的時候，香港的華人和海外華僑，依然稱自己做「唐人」。

大陸那個中國是假造的。統治中國六十多年來，中共的行為仍是一個革命政權的模樣，所謂革命政權，其實就是叛逆政權，時刻覺察自己不是正朔和正統的臨時政府。如果中共不悔改，中國會民窮財盡，土崩瓦解。而香港仍然是一個國際大城邦。我們要

對香港有信心，對自己有信心。終有一天，中國會由香港接管。目前中國大陸的人，無分階級，或貧或富，都時刻想着要來香港，接受香港帝國的各種庇護。

誰是香港人和誰是中國人，是好玄妙的問題。問「誰是香港人」，會越來越多人納入香港人的範圍，越來越多人可以在香港享受香港公民權、福利之類。問「誰是中國人」，答案會越來越窄，會越來越少人是中國人，可以享受公民權和福利。這是一個好有趣的現象，但意義非同小可！因為香港是帝國，中國是民族國家。帝國是向外擴張的，民族國家是向內收窄的。歷史有它的詭秘過程。香港目前好似任人欺負，但最後，香港會吞併中國。

熟悉中外歷史，就知道香港安和樂利，而中國風雨飄搖。目前中共在香港要做的，就是民族建國，要香港的學生讀愛國教育、升旗禮之類，然而這是可笑的。用社會建構和民族建國來看，就知道香港一直在做現代化，一直在進步，在做精細管理的事情，而中國則一直在進一步退兩步，在虛構自己的民族國家，在退步、在毀滅自己：從文化、水土、道德，中國都在毀滅自己。

帝國不需要國民教育，新興的民族共和國才需要國民教育，甚至加上政治教育。九七之前，香港做的，是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毋須國民教育。中共在大陸做的，五十年代是政治鬥爭，消滅華夏帝國的傳統文化、士族和民間社會組織，六十年代開始做

的，是政治教育（馬列主義史觀）和國民教育（愛國教育），然而一切都是假作，因為那個民族共和國是假的，故此今日的中國並非中國。而香港，則遺留華夏帝國的本質。帝國是甚麼，帝國是用傳統文化和典章制度來感化人的，帝國有向外傳播和擴張的能力，也會庇護其他地方走難來的、不幸的同族人。故此，香港在九七之前會接受大陸難民，而台灣的民國政府不會這樣大方。香港的文化傳播大陸，制度轉移到大陸，但大陸的文化和制度，卻不能轉移到香港。

真假帝國合流，就是天朝大國

目前的中共是依賴財勢和人口的假帝國，香港是依賴文化和制度優勢的真帝國。兩個帝國合流，就是華夏天下。目前，中共與香港的關係，是寄生的關係（parasitism），中共用權勢寄生於香港，中共派殖民蠶食香港，然而他們的人和錢會流到香港，只要香港莊敬自強，以華夏正統自居，以現代化導師自居，在香港普選和政治本土化之後，香港取得大陸殖民地而壯大權勢之後，這些來自中共的殖民，就會落地生根，成為香港與中共打交道的買辦和中介。

這個轉勢，就是香港與中共採取共生（symbiosis）關係。目前是中港區隔，香港莊敬自強，香港城邦自治，將來是中港融合，華夏邦聯。香港要走這條路，才是康莊大道。

英國在香港推行粵語和華夏古老文化，暗中取得正統，然後加速香港現代化，令香港變成國際城邦、金融中心。香港是城邦，中共是大國，牌局就是這樣玩下去。但中間有個轉勢，就是美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為甚麼美國會唆使香港的民主派和左膠，鼓吹中港融合，協助中共殖民香港，使大陸的人才、資金都流入香港，逼爆香港？答案就是，中共目前吞併香港的一切舉動，將來會被美國接收，一旦中國陷入戰亂，美國會利用香港的政治制度和金融力量，劫持或勾結中國在香港的精英，吞併中國。而期間中國由於用高地價政策、金融掠奪、殖民人口替換等方式令香港文化破敗，中國也無從取得香港的高階文化。這是歷史的不幸，期間香港本土人會吃盡苦頭，而不一定得到益處。我們香港人是否繼續做英國／美國殖民地的買辦，取得蠅頭小利，還是嘗試做主人，收回主導權，或部分的主導權，從中得到我們香港人應得的利益？《香港城邦論》就是嘗試介入中美之間的大國政治，恢復華夏在歷史過程上的主導權。

華夏在滿洲王朝滅亡之後，一直是蘇聯或美國的次殖民地，喪失主導權。香港城邦論、華夏邦聯論，恐怕是歷史給華夏最後的一、唯一一次的機會。過了今次，華夏永不超生，萬劫不復。故此，我常說要玄天上帝降臨，華夏列祖列宗庇佑，諸天神佛護佑，就是看見這個香港脆弱的轉圜（turning hub）。這個脆弱的轉圜掌握不到，香港和華夏就完蛋，亡天下了。

(三) 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方法

設立香港主場，需要香港主體、香港史觀和香港方法。本土歷史及本土知識，是香港自治自立的基礎。請各位從今日起，好好保存有歷史價值的香港舊事物，記錄舊掌故，珍惜老前輩的說話，傳承香港的故事。香港有一百七十多年的現代歷史傳承，而且是華夏古老文化與英國現代文化的結合，我們自身就可以提供參考。普世價值、西洋學問，都要用香港本土知識來衡量和調節，才可以在香港有實踐的意義。

英國在香港實施的統治思想，可以歸納為共識政治、威權政治、行政吸納政治等，但是實際的統治思想，有下列五點：

一、文化保守主義：堅持傳統文化的優越地位（華夏傳統或西洋傳統都可），尊重聖賢教誨，建構及守護文化主流，反抗低下文化及俗流入侵主流。

二、尊重傳統智慧，質疑官僚規劃：尊重家庭及傳統結社及傳統風俗習慣、傳統智慧的理性，質疑官僚假借科學專業之名的社會規劃。四然而，到了八十年代，開始明顯的社會規劃，但都做得謹慎。

三、尊重自由選擇及傳統秩序：保守主義的核心是自由，自由選擇，但必須保障自由的基礎，就是產權、傳統組織及既定秩序。尊重自由，但也不容許破壞傳統秩序，例如近年來港產子而獲得居留權的雙非人的福利，符合法律，但不符合傳統秩序（任何地方都不容毫無審批而入籍）。大陸走私客來港購物帶回大陸，是破壞中港之間的關稅協定，故此也是破壞香港的自由市場秩序，不容姑息。

四、法律規劃與生活秩序的平衡：英國在香港實施普通法，普通法的精神是以法理達致公義，着重法官根據法理、道義情景及英聯邦國家的判例而裁斷，平衡了法理及道義傳統，並可以根據當地情況，與時俱進、因地制宜而用審慎的判案來創制法律，故此可以兼顧法理規範及本土生活秩序，使得執法的時候顧及行政需要，然而又不是徇私枉法。例如往日英治政府姑息小販在不妨礙

四、這是官僚理性主義，是那種置風俗人情於不顧的思考方式。做科學工作要冷靜分析，不可以受感性影響，然而官僚使用科學於生活，必須顧及生活習慣，因為這不全屬於科學的範圍，有些是宗教或信仰的範圍。很多人自居為科學家，但不理解科學。因為理解科學，需要的不是科學，而是哲學。關於官僚理性主義於香港在九七之後的惡劣使用，見《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二〇一一年，頁二三六至二三七。

公眾的地方擺賣^五，姑息店舖在不礙事的地方擴充店面，容許街坊在樓梯口放坐椅聊天，容許在屋邨空曠地方曬晾衣物，就是平衡。如今的土共政權嚴密執法去衝擊市民固有的生活傳統秩序，就是放棄了法理傳統。

五、謹慎改變傳統秩序：如要改變傳統秩序（例如近年大量納入新移民或開拓新領土），必須以漸進及修正的方式進行，不以科學理性研究而來的革命綱領進行（如認為新移民有助人口更新而魯莽地大量輸入）。

這種右派政治，關鍵詞是傳統（tradition）。見諸表面，英治政府用傳統正體字（traditional Chinese）、廣東話、公文古雅，官署的中文招牌甚至用隸書（例如廉政公署）。

中英政道之融合

香港過去的統治政治思想，其根源來自西方的學問，抑或是華夏的學問？這其實是政治的常理。英國的保守主義政治，與《書經》、《易傳》、《史記·平準書及貨殖列傳》、《貴粟疏》、《鹽鐵論》、《貞觀政要》等治國之書，說的頗有共通之處，如果你不講明來源，這些保守主義政治，你也許以為是明清的朝廷大臣的治國方略，宋代蘇東坡反對王安石的變法，用的也是這些道理。

英國的治國方法，一部分取材自華夏。英國的文官制度，其實是從華夏的科舉取士、翰林養士、輪番調任的方法來的。故此，好多我們以為是英國的東西，其實是混雜中國的。好似英國奶茶來自中國（在茶中加糖或奶酪，是唐宋的胡族飲茶法），輸入香港之後，又變成港式奶茶。故此，港式奶茶是香港文化的象徵物。當然，英國的政治思想比起華夏的，有一處是高明的，就是堅持人有選擇的自由，這個來自希臘哲學的自由與個性，是令到保守主義不會停滯和倒退的良藥。

英國人於香港人，是師道的關係，不是君與親的關係。華夏才是香港人的君與親。這個一搞錯了，香港人就認賊作父，變成遊魂野鬼，左膠口中說的「世界公民」。明朝開始，民間供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天地是養育人類的，君親是養育我們的，師是教導我們的。這五個，有次序，天地為大，君親為次，師更次。這個牌位，是尊敬師道，由孔子以來的師道。然而，師道並不大於君（天下國體）與親（父母親戚）。我如此強調華夏，就是不想香港人變成遊魂野鬼，任人欺負。誰會拋棄君親，隨着師父走，這是遊方賣藝人啊。以前的民間，師父收徒弟，必須問他們是否孝順，背棄父母離家出走的，一般不收。

五 特別是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之後。

保守主義的最大假設，是社會有一群世家、士族，成為衡量傳統與革新的參考團體，類似核證圈（validation circle）。九七之後，香港的世族不再任事。這是香港的隱憂。

七大統治策略

在實際統治上，英國在香港採取的是帝國的統治方法，可以用七大策略來總結：

- 一、自由貿易與公平競爭：香港是英國用割讓和租借方式取得的通商口岸，由於長期佔領，將之發展成為城邦的規模。英國在香港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初期的統治用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以法洽保護產權安全及交易公平，以英國的現代制度扶助資本形成（銀行、保險、證券交易所等等），並盡量做到市場自由及公平競爭（有戰略意義的公共資源及貿易除外，例如公營食水，限制發電商及禁止戰略物品的貿易）。早期政府徵稅低，也不提供甚麼福利，任何人都可以在香港積存財富及經營企業。這打破了中國王朝始農抑商的政策，也令賤民（水上蜑家人、樂戶）、被剝削權利的人（如逃犯、妓女、妾侍）及流亡資本家（避難者、夾帶私逃者^六）可以在香港經商及投資，發家致富。香港成為華人社會之中，最徹底現代化之地。

二、香港自主，香港優先：香港是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是一個貿易港口，也是一個傳播大英帝國影響力的城邦。統治香港的是一群游離於英國境外的商業公司、買辦集團和海外殖民官，這群人由於自身榮譽及利益，形成了香港的政治自主的網絡，有時甚至不惜違抗宗主國的意旨。

三、尊重傳統，漸進改良：英治政府尊重香港的華人遺民傳統，維護買辦世家之利益，施政因勢利導，漸進改良。因應時勢，歷任總督各有建樹，如金文泰保存香港的華夏帝國文化，楊慕琦奠定香港的民主議事之風，麥理浩奠定香港的城邦社會歸屬感，彭定康培養香港的民主鬥爭氣魄。

四、區隔族群及國共政治群體：各安其位：英治時代，英美裔、歐亞混血商賈、南亞裔富商和高等華人是香港上流社會；一般華人、南亞裔等是香港的中下層。共產黨群體限制於土瓜灣、北角等。國民黨僑社在粉嶺（廣東番禺人）和調景嶺。其餘香港漁民、潮州人等都有聚居之所，如潮州人在九龍城。

五、官民互信與官民角力：互信形成香港族群，角力形成民間社會。英殖政府以貴族精神派發福利，也形成香港族群認同。

六：例如捲帶官府庫銀來香港定居的民國軍閥及其家屬。

六、「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前殖民地財政司夏鼎基（任期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一年）在一九八〇年提出政府「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的經濟政策，取代戰後至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放任政策（laissez-faire policy）。即應不干預時便不干預，應干預時便干預，官僚行政務實處事，權宜定策，不受任何主義或意識形態的束縛，也不追隨一套明顯的理性規劃體系（如福利社會）。⁷ 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是相信市場力量最終會提供最佳的解決辦法，但在市場壟斷、增長過速、為了公眾利益以及市場力量無法自行調整的四種情況下，政府要考慮干預，但「在所有情形下，決策都是以積極態度和三思而後行作出的，而且在作出決策前，必定會將直接的利益和代價，與建議的干預性行動可能會產生的中期影響相衡量。」⁸ 這不是自成體系的經濟思想或者公共財政學，而是在自由經濟下的有關公共財政的優良政風的一套綜合指引（a summary guideline of good practices in public finance in a liberal economy）。

七、令華人安居樂業，提供上進途徑，但不威逼庶民上進。英治政府的做法，類似儒家分清君子（受過教養的人）及小人（普通人），期許於君子，卻不寄望小人上進。

名實相符的漸進式改革

於歷史而言，香港與中原之關係，始於秦漢，大盛於宋，而改變於清。於政治而言，香港與中原之關係，錯綜於朝廷特許經濟（曬鹽、採珠）、軍事（海岸防禦）與對外交流（航運港口）。英國佔領香港之後，香港由有貿易據點變成歐洲式的城邦。香港在二次大戰之前，主流社會活躍的都是西洋人、中東人、印度人、南洋華人與歐亞混血兒（Eurasians）。至於新界鄉民和離島漁民，是華夏遺民，也與中原不同。混雜而開放，保守與前衛，是香港城邦的文化格局。香港是唯一有機會進行全面現代化的華人地方，也是英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優良匹配之地。

過去的香港政府，有漸進式處事的方法（*incremental approach*）。推行行政，政府先推出行政指引（*guidelines*），實施之後，官民互相適應，修正之後形成政策。當然，這些「民」，不是所有香港市民，而且政府的諮詢對象，包括由基層政務官接觸的利益相關者，諮詢委員會包攬的專業人士，以及行政局的士紳和世家。

七：此乃借用香港經濟學家陳坤耀的詮釋，見張炳良〈反思香港發展模式〉，《明報》論壇版，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八：香港《信報財經新聞》，一九八一年年三月號，頁八十一至八十五。

波柏（Karl Popper）的零碎式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觀念，符合保守主義的行政改革。他認為民主社會的改革，是小規模的、零碎式的社會工程，在修修補補、零敲碎打之中前進，但不民主的社會，往往採用烏托邦式的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以為可以靠理性規劃而掌握走向璀璨未來的鑰匙，於是大張旗鼓、大刀闊斧。他認為那些整體式、系統性的改革是不符合人類的知識增長規律，因為知識增長難以掌握，事情的效果利弊無常，只能靠嘗試與修正，緩慢前進，才是穩妥的做法。

架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並非改進管治、發揮效率之靈丹妙藥，世上頗多失敗的民主政體（failed democracies）最終倒向集權，就是沒有看透體制改革必須要有先設條件之配合。改革必須名實相符，以實為先，過程是一「實」至，然後「名」歸，不可本末倒置，以虛名帶領改革。英國並無成文的民主憲法，但其民主憲政卻勝於頗多有民主立憲之國，是因為英國早有憲政之實。威瑪共和國、孫中山時期的中華民國等都有頗佳之紙上憲法，憲政實踐卻是一敗塗地，是因為毫無實績可循，徒具一紙虛名。

以舊時中國的朝廷政治術語來說，開明、尚智的管治風格（政風）、經驗豐富而知曉節度的前朝舊臣（良臣），是體制改革成功之必須。例如要成立一個新部門、新架構來處理新政，必須用舊的部門扶植一個事實上（*de facto*）已經具備獨立運行特質的機構，用外延生長（*outgrowth*）的辦法，培育之後，瓜熟蒂落，成立新的部門或架構。常見的方法，是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諮詢新政，之後用該委員會，或調整該委員會來成立一個收到法例管制的法定組織，代理政府的新事務。

例如筆者熟悉的文化政策，就經歷十多年的實踐，才奠定執行指引，但仍不是文化政策。^九一九七七年，政府內部研究之後，確認官方發展藝術的責任，限於為「統籌者及催化者、所需基本設施的供應者及推動者，並於有需要時提供財政或其他資助，以培養藝術新秀或發展新的藝術形式」^十，市政局承擔主要的公共文化服務，而政府亦首次承認了其類似「反應式」的藝術政策（*reactive policies*），即是政府設立一些被動式的、回應市場需求的機制，當藝術界有明顯要求時，才給予援助或諮詢，支援（主要是撥款）以短期為主，雙方無強迫性的義務。^{十一}在此，政府對於藝術資助，採取委託公共組

^九 詳見拙著《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香港：花千樹，二〇〇八年。

^十 當年是內部決議，在一九九三年始公佈。見香港政府文康廣播科，《藝術政策檢討報告》，一九九三年，1-4段。

^{十一} 這也是英國本土的文化藝術行政的作風，見費約翰（John Pick），《藝術與公共政策》（中譯本），台北，一九九五年，頁一〇二。

織（地方議會）執行，假手於人而政府依照法令隔空視察的間接管理方法，在英國的藝術行政傳統，稱之為「臂距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既可減低意識形態風險，也利用了執行機構的靈活性。

(四) 區隔香港的民間社會

統治有兩大元素：人口與地理。香港殖民地採取帝國的社會建構，政府將一大群地域文化和政治立場不同的群體按照他們團聚的區域來分隔，政府不施予政治教育，不強求統一意志，不刻意將不同族群的人混和而構造出一個香港族群，寧可他們起初以歐美人、南亞人、廣東人、福建人、上海人之類的鄉族身份，在區域上分隔而住。這與民國政府或中共政府的族群混同而試圖造出國族（所謂中華民族）的策略，大大不同。^{十二}即使某方言族群聚居之地遷拆，例如潮州人的寮屋區遷拆，在政府資助的廉租屋安置的時候，也盡量令他們聚居一起，繼續其鄉族情懷及風俗活動。

警官及其他官員（民政官等）的協調，令他們和平共處，避免劇烈的利益衝突。他們各自發展之後，最終達致最佳的自身利益，然後願意與其他群體支持這個殖民地制度。平日他們可以臭罵政府，但到了危難關頭，總不願意破壞這個庇護他們的社會。這是殖民地政府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的安民之政。過了六十年代，尤其是經歷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政府才改變這個消極統治的策略。

佛寺過不了維多利亞港

香港、九龍和新界的宗教建築物差異，可以看到英國統治香港的文化區隔方法。中環是沒有佛寺或道觀的。政府總部和總督府比鄰是英國聖公會的聖約翰座堂，中環周圍也有大小的基督教堂。佛寺要去到銅鑼灣、跑馬地才有，文武廟只是地方庶民宗教。九龍有一些小型的佛寺道觀（志蓮靜苑是九七之後的事），最多也是最大的佛寺道觀群落，在新界，例如青山、荃灣、沙田和大嶼山，大嶼山的最多。這就是殖民地時期的宗教差異格局。

十二

民國政府在大陸執政時間和區域不足，難以證明。然而中共的上山下鄉、漢胡混居、消滅鄉社這些文化清洗的劣政，弊端無法彌補。

英國人並不干涉華人信仰，只是用分區規劃來處理好區隔，故此相安無事。但差序的格局，是顯而易見的。英國人以宗教用地批租的方法，將華人宗教排擠到九龍和新界^{十三}，最多的佛寺在大嶼山^{十四}。以此格局觀之，新界人最有華夏傳統，九龍次之，香港則很多離地中產。中環的人，維多利亞城（Victoria City）居住的人，為甚麼會離地，脫離華夏文化，就是這種政治地理的影響。然則，香港九龍新界合併起來，卻成了一個小小天下。

錫克廟、猶太教堂、祆教（拜火教）廟，乃至清真寺等，都可以興建於港島或九龍的市中心或邊陲，如港島南區春坎角的東正教會堂，原因是這些西亞及南亞人之類，如印度人（錫克人及伊斯蘭）和猶太人^{十五}是殖民政府的早期合作伙伴，故此這些外國宗教建築與耶穌教堂同在。八十年代之後，港府從事本地化政策，也準備主權移交，也就容許華人宗教在維多利亞海港以外的市區興建佛寺和道廟。

中共的紅，民國的黑

華人幫會、暴力團和中共法西斯政府的外延組織，英國殖民政府必須關注。二次大戰後，英治政府在香港實施典型族群區隔，例如將兩岸中國政權歸屬迥異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人，劃分如下：

國民黨團：調景嶺、九龍城、粉嶺、深水埗及石硶尾廉租屋邨一帶

中共黨團：土瓜灣、北角等地

國民黨在香港的體系光鮮一點，有民間書院、報社、銀行、影業公司、武館、國術總會、書店等。有抬面的士紳，也有抬底的幫會。國民黨在廣州有十四大的情報集團，後來改為幫會，大陸赤化之後來港，與其他親近國民黨的情報組織（如前身為「義安公司」的新義安）及古老的洪門香港支部中和堂衍生之和字頭的幫會，成為地下幫會。殖民政府用先籠絡、後肅清的方法來應付，然而始終留有一條生路。

殖民政府處置華夏民間社會、國民黨系的幫會與中共系統，採取不同態度：

一、華人傳統的民間社會：寬容及轉化。祠堂、宗親會、同鄉會、善社（慈善團體）、廟堂、醮會、行會等。源遠流長的華人傳統民間社會適合英國的帝國文化，組織穩定而行為可靠，有助殖民地的地方自治及風教，減低統治成本。殖民政府將之鞏固，及使

十三· 何東家族有夫人信佛，佛寺正覺蓮社，在銅鑼灣。
十四· 離島當然也有耶穌教的修道院，如大嶼山稔樹灣的聖母神樂院。
十五· 港督彌敦是猶太人，早期來港經營中華電力的嘉道理家族，也是猶太人。

之現代化，例如將宗社、祠堂及善社、廟堂註冊成為有限公司，用公司法律及理事會（董事局）方式監管。如五六十年代宗親會在香港提供若干小學教育、職業培養（如中醫學習班）、娛樂及救濟等工作。

二、國民黨系的民間社會：提防及籠絡。幫會、親近國民黨的華人傳統民間社會，講江湖道義和輩份尊卑，做事也懂得分寸，殖民政府初期不理會華人社會，採用各不侵犯的原則，派警官或情報官聯絡，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之後改變策略。七十年代之後，香港進入全面管治時期，開始從市面上肅清幫會，從地面導入地下秩序。

三、中共在香港的黨委系統：監視及孤立。法西斯黨團脫離傳統，行為來自命令，難以預測，而且冷血無情，故此殖民政府採取嚴厲的監控手段對付，但由於必須維繫與中共的鄰居關係，很多方面也留有生路。殖民政府採取的是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的方
法，令土共系統成為靠大陸輸血生存的寄生體。自主性不足，威脅不了殖民政府，土共人員也在主流社會備受鄙視。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市政衛生局徙置事務委員會舉行內部會議，規定不得在徙置區的樓宇牆壁張貼旗幟或裝飾物，但容忍懸掛旗幟。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洪門弟子慶祝國慶，於李鄭屋徙置區大樓張貼國旗，低級官員將之取走，引來十四K及和安樂人

馬混入群眾，在深水埗、荃灣一帶暴動，放火打人，並且趁機會在土共的工會搗亂，甚至強姦工會女工，混亂一連三日，史稱「雙十暴動」。港府鎮壓之後，警隊成立「反黑組」專門對付，並推廣「黑社會」的辨義名稱，代替三合會或幫會的平義詞。^{十六}港府與遷台的民國政府同屬於冷戰時期的自由陣營，彼此有聯繫，也透過美國為中介人，調停港台關係。即使鎮壓了雙十暴動，對國民黨系的幫會，仍然網開一面。

中共在香港不能有正式黨支部，只是用港澳工作委員會的方式指揮地下黨及組織工會。工會用工人俱樂部、工會會所、工人診所、購物合作社之類的方式聚集工人及青年追隨者。另有中共資本的企業，開辦學校、報社、銀行、國貨公司、文化藝術團體、書店、電影院、電影公司等。港府嚴加限制，並且限於在土瓜灣、北角一帶，令該兩處地方成為土共之經濟活動區。大陸爆發文革期間，一九六七年土共策動工人暴亂，殖民政府用軍警鎮壓，事後政府改變治港方針，實施整套歸化政策，給予各種公共服務，將共黨系統排擠到邊緣社群，土共的人員受到政治排擠，不能入公務員隊伍工作及參與諮詢團體服務，剝削他們在主流社會的經驗，這令到土共體系在九七之後上台，暴露稚嫩和魯莽的醜態。

十六

詳見筆者論文〈香港幫會與華人民間文化〉，載《我思故我在》，香港：花千樹，二〇〇五年，頁三十一至五十一。

民間社會之散落與重建

九七之後，國民黨的資助淡出，親台的經濟及文化團體凋零，有些撤出香港，有些授命於國民黨的大陸政策，與中共採取曖昧的親和關係。

九十年代之後，政府公共服務膨脹，並且多方補貼民間社會，令國民黨及共產黨資助的學校及類福利組織失去吸引力。地產霸權亦令空間昂貴而貧乏，傳統民間活動也受到政府推行的政策而改動，例如傳統弘揚國粹的武館變成多元智能另類學習經驗。

殖民政府應對戰後逃港避難的大陸難民，有世代差別：

一、籠絡第一代：在經濟方面，給予就業及創業機會。文化方面，遷就其故土文化風俗，容許族群聚居於某區域，區隔對待。民間社會與政府各不相干。

二、教化第二代：居港大陸難民的第二代，用房屋及教育政策改造之。房屋給予第一代的溫飽與感恩，並給予第二代城市居住的經驗及歸屬感，教育給予第二代本土情懷。

(五) 低下層安居樂業的秘密： 累進發展及二元經濟

香港開埠初年，以自由放任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為本。二次大戰之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間，香港接收一百五十萬名大陸難民。^{十七}香港頓然變得擠逼，雖然戰前已有英商和華商（多數源自南洋和上海）建立可觀的工商業基礎，可以提供就業機會和個人發展，但大批逃港難民衍生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問題，迫在眉睫。一九四九年，大陸由中共統治之後，香港成為東西方冷戰的戰場，一九五〇年羅湖邊境關口禁止兩地人口自由進出。對於香港，封關這是個大難題。直至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大陸，兩地雖然假扮開關，但封關的問題依然纏繞特區政府：窮人、不滿香港的人，不可以送去大陸。

大陸赤化之前，華界的人口自由往返香港，對香港有以下好處：

- 一、將不能營生的低下層華人人口輸送到大陸；

^{十七} 《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第一章，引言。香港總督呈殖民地部大臣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此報告書全文上載維基文庫。

二、低下層華人人口有大陸的宗族或鄉社照顧，香港可以維持低水平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卻可以用英國統治的環境，吸納有利香港的人才來港。

三、香港人才往大陸的政府服務，毋須特別批准，可以伸展英國在中國大陸的影響力，例如伍廷芳、周壽臣等華人在清廷或民國政府做事。

四、毋須擔心香港培養本土意識，避免香港發展出族群政治實體，英國大可延續帝國式的統治。

關口封閉之後，本地華人人口正式成為香港人。殖民政府必須改變重商主義，採取措施照顧低下層的民生和福利，並且提供必須的公共服務，也要準備香港人有本土歸屬感。在統治哲學上，港府要由重商主義轉向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採取混合的社會政策，經濟上採取累積發展及二元經濟的方式，保障低下層的民生。

累進發展與二元經濟

戰後時代的香港，不是一統（united）的香港，而是複合（composite）的香港。經濟上有重商主義傾向，卻保存中小企業

的生存空間；社會政策在醫療、教育及公屋方面，儘管政府不予以明言，但已有福利主義的初階，培養了初步的歸屬感和命運共同體。

香港在戰後至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其多元化比起今日還要高，對外關係有廣州澳門、歐美、日本和南洋，經濟有健全的漁農業、工業和商業、金融等構成的三層結構，工人朝氣勃勃，形成本地文化的消費群體。作坊式的企業主積累了知識和本領。踏入九十年代，殖民地政府無心戀棧，放任工業北移，連帶服務工業的服務行業也逐步轉移到大陸，香港的產業多元化被挖了牆根。

累進發展

農業、漁業、石礦業（quarrying）是初級產業，輕工業、航運、修船、轉口等是第二產業，旅遊、商業服務、金融等是第三產業。加上慈善團體的社會企業，形成香港當年累進（cumulative）發展而成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這些都不是天賜香港的，是政府與民間合力經營得來的。當年的經濟，是包容的（inclusion），互相補足的，累進的，不是排斥的（exclusion），彼此隔絕的，遞減的。技術可以革新，但經濟模式和生活方式，必須是累進的。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全盛時期的輕工業（成衣、手套、塑膠花、藤籃、五金製品、鐘錶

配件等），也是分為大廠及山寨廠（家庭式工廠）與家庭外發工，利益可以層層下達，由工廠大廈、屋邨至山邊木屋及鄉村茅舍^{十八}，都分享到香港工業化的利益。

漁農業給予香港人自然感應和文化根基，令民生安穩，民心純樸，工業給予香港人企業管理和工作倫理，商業和金融保護香港人辛苦賺得的資金。香港有傳統的鄉村和漁村，新加坡沒有，深圳也沒有，故此香港是成功的現代化，新加坡和深圳是假扮的現代化，兩者之間，只有程度的差別。

英國是工業革命和金融資本主義的祖宗，很早就掌握透徹，在香港實踐得輕鬆自然，以至不着痕跡，令香港的人不易領會其神粹。保護一個國際都會、金融中心，必須要有強大的誠信（trust）和悠久的道統（orthodox tradition）。即使中國制度與香港相若，兩地人員可以互用，但如果香港需要自立城邦，也必須建立國際都會（cosmopolitan）與在地社群（local community）的二元文化及二元經濟體系^{十九}，用本地社群做經濟緩衝和文化防衛，否則大都會難以保持權威秩序，也容易被單一的外國強權滲入（外國勢力多元滲入而互相制衡是大都會容許的）。

香港要建立本土的在地社群經濟，有更迫切的原因。香港的邊界是類同國與國的邊界，兩地人員來往需要檢驗旅行證件，港人北遷大陸，也並無國民待遇。香港由於腹地不足，底層人口、

不適應大都會高增值經濟的低下層，並不能安頓在城外的鄉郊甚至外省，故此必須在本地設立二元經濟。^{二十一}二元經濟模型，也稱作「兩部門模型」（dual sector model），是美國經濟學家路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一九五四年發表的《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的發展經濟學模型，給予發展中國家參考。他認為經濟有兩個元，使用可再生資本（reproducible capital）的現代經濟或資本家部門（the capitalist sector）及使用不可再生資本的維持生計部門（the subsistence sector）。資本家部門是使用現代金融資本（銀行貸款、股市融資等）的有效率生產，例如工業、礦業、種植園，維持生計部門是那些使用微薄資金、個人積蓄的本土傳統經濟活動，即是利潤不高、效率也不高的傳統小本經營，例如農業和工藝。這兩個部分可以互相支援和補足。沒資金的小市民，可以在維持生計的傳統小本經營，獲得謀生及進展途徑，並且締結人情網絡，支援身心健康及得到群體照應，可以終身停留在社區經濟，看着一個小店、耕着幾畝田，有心的便等待機會上進。

十六

六十年代，筆者居於八鄉山村，村民依然可以到鄉村的山寨工廠領取外發的塑膠花及藤籃來做，幫補家計。

十九

這裏參考H-PC Kevin的文章，《經濟經濟，經濟不濟》。載《城邦論壇》網站，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網站：<http://www.hkpolis.com>

二十

香港浸會大學前經濟學教授曾澍基於一九九七年在報章提出的本土經濟理論，認為香港與紐約、倫敦等國際都會不同，必須發展二元經濟。筆者有所參考，但並不依循他那套純經濟學理。

由於香港在戰前已具備相當發達的工商業基礎，而城邦的地
理格局令城鄉交流和商業交易便利，況且香港鄰近大陸，可以在
九七之前為香港提供廉價的青年勞動力，香港的工業發展以低技
術的輕工業為主，容易起用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故此香港在九七
之前的二元經濟有本土的特色。

戰後，香港的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
自己處理，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
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生活費用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
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生活費低廉而生計受到保障的後援
基地。這些地區，都受到低廉租值及限制地產發展的保護，傳統
農業（例如種菜）更受到免交賦稅的保護。這些地區有四類：

一、公共屋邨及公屋商場區：租值低廉，而且在九七前幾乎是長期
享有，方便貧民及小商人規劃生活。

二、工廠大廈區及工業邨：租值低廉的工業區，而且有工人飯堂等
減低貧民生活開支。

三、灰色的租值補貼區：街頭的大牌檔，官方默許的地攤和流動
小販等。

四、鄉郊區（包括漁村水域）：九七之前，政府限制農地及郊野公園周邊地區發展，令該等地區維護鄉村生活，也令低薪的工人、退休者和城市退居者有個半農半工的迴旋空間，從事自給自足的後園農耕或者小規模的菜園、花圃、果園和畜牧與養殖。為香港提供三成的本土食物（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也保育了鄉郊水土，令水源安全，並使到都市人有郊遊的休閒生活。

此外，政府公營部門為低薪公務員提倡的穩固就業，包括穩定薪金、終身聘用及退休長俸，甚至退休之後給予大牌檔經營，這種福利就業，也是保障底層民生的方法。

二元經濟是香港特有的統治技術，也是香港殖民政府不為人知的政治學。第一元的經濟，容許工商自由營業，這是香港自由經濟顯見的表面（manifest side），也就是對外宣傳的一面。第二元的經濟，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經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是用隱蔽的放權讓利方式，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香港自由經濟的隱藏一面（latent side），不向外聲張的一面。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在香港的巧妙混雜。

香港可用的土地有限，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巧妙進行而不影響自由市場名聲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租補貼，

或刻意不依循市場競爭的方式來徵收租值，並且用規劃地域發展的公權力，保護某些行業的經營和貧民的生計。以隱性地價補貼充當間接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殖民政府施政之核心策略。隱性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白手興家的中小企業主及貧民的後代成為中產階級。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蹟和國際口碑。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以福利性質的地租補貼，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安定民心，使貧民生計安穩，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用公費教育系統和各種英國專業公會考試，快速壯大香港的中產階級，締造橢核型的中產社會（中產數量多，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戰後的短短三十年之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²¹至於公屋培養的鄰舍感情和區議會活動的初期民主，也是社會工程的部分效果。

舊日市政局的掃街工、毒老鼠組，漁農處的種樹工，水務處的水塘工，郵政署的郵差、政府官署的庶務員和文員（包括打字員）之類，工資微薄但工作安穩，上級少有考核，上班完成工作之後便可間中回家做事。退休之後有長俸。貧民只要有戶主或主婦是低級公務員，食「皇家飯」，幫事頭婆（英女王）打工，那一家就有機會成為小康之家，周邊的親戚和鄰居也會認識公共事務而奉公守法，歸心於殖民政府。這是六七十年代政府擴大招募底層公務員的苦衷。一方面是殖民者惠及華人的利益均霑思想，另一方面是擴大由政府主導的香港難民社會的社會網絡建設。這可以說是香港的社會工程奇蹟。

至於大牌檔之類，以前是給予退休公務員維生之用（檔裏掛一個大牌照），是變相的退休福利補助，是故大牌檔牌照是跟人的，只能與配偶共用，但不能世襲承繼、轉讓或拍賣。

二十一 · 此節有部分內容取自《香港城邦論》第七章第八節「安樂的底層民生」，但有所闡發。

離地的大生意與在地的小生意：維護均勢，保護弱勢

做生意賺的是錢，包括現金交易的錢，也包括可以模糊地在將來兌現成金錢的人情網絡和政治影響力。香港過去有第一元的都會經濟，也有第二元的本土經濟。本土經濟裏面，例如傳統士多（neighborhood store），賺的不只是錢，也包括金錢也買不到的無形價值（intangible values），例如長期的社會網絡和人情照顧。這是仍未兌現為金錢的潛在價值，而且阻擋外資進入，並且不會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甚至經濟景氣的衝擊，故此有助鞏固國本。

傳統的商人建立社會網絡以賺取長久金錢，新派的商人破壞社會網絡以套取短期利益。香港的連鎖超市和便利店就是，它們利潤不高，甚至有虧損，但他們不只是在做現金交易的生意。他們不惜以本傷人，以賺頭蝕尾的方式搶佔市場。社會網絡被他們瓦解了，他們便有辦法套牢你，獲得長遠收益，例如成為壟斷的供應者。至於龐大的現金流、顧客積分卡的交易資料，可以協助他們做顧客分析，甚至做其他產品推廣。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的惠康和百佳不斷削減競爭，以貨源的優勢和減價戰術打垮傳統的辦館，到了寡頭壟斷完成之後，價格普遍貴於街坊小舖。最佳的經濟狀態，是傳統生意與新式生意混雜的型態，好像香港的八十年代，或現在的台灣。

九七之後，政府毀滅二元經濟格局

天下齊一，暴政之始。九七之後，香港邁向高度齊一化，以前的多元、累進及混合的格局消失了。這是暴政的先兆，是地產財閥和執政官僚與境外政權代理政黨（土共和民主派）的聯合暴政。以前香港有二元經濟，有公屋商場及工廠大廈，現在統統齊一，公屋私有化，重門深鎖，公屋商場領匯化，變成商業市場，工廠大廈放寬用途，容許地產炒作。以前香港有分流教育，有工業學校，現在統統齊一，人人要被逼讀大學。齊一的意思，不是機會平等，而是如果你不跟隨，就無路可走。如果你跟隨，就只有受挫折和奴役，如果你是缺乏競爭條件的低下層，就不能在齊一的標準下得勝。那些普世、平等、大愛，總是暴政的先聲。無一例外。

九七之後，港共發動「大都會計劃」，前財政司梁錦松曾說要建設「曼哈頓^{Manhattan}」；第二位特首曾蔭權說要將吸納大陸新富移民，將香港人口提升到一千萬；前任政務司唐英年說要深港同城化，將香港納入珠三角的「一小時生活圈」，要窮人北遷大陸。曾蔭權借禽流感，禁止新界養殖家禽（禁雞令），斬斷農業的植物與禽畜的循環，破壞農莊生態，並放寬農業用地的限制，使地產商圈起農地，囤積居奇。地產財閥用地產買賣取得現金之後，

可以大肆兼併，用入股、開分支等財技，將香港中小企為主的社區經濟消滅，甚至直接用商場加租或不租出的方法，趕絕小本經營者，令小市民失去獨立營生的環境，必須幫大集團打工。

由於香港與大陸有無法彌合的制度決裂和民情差異，這些高舉香港的大都會經濟的建議，無疑可以取得北京中央和香港財閥的歡心，卻是將香港的本土社區經濟和香港底層民生，送入地獄火海。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有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本土經濟是保護本地利益的重大措施，香港殖民政府在保護香港的糧食和食水供應方面，艱苦經營，現在卻放棄了。

(六) 麥理浩總督的歸化工程： 公共房屋及公費教育

福利形成族群。麥理浩（一九一七年至二〇〇〇年）是資深外交官及殖民官，於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二年間，出任香港總督，任期達十年半，是香港史上在位最長的港督。麥理浩用社會工程來

將暴動後的香港人締結成為命運與共的族群，當中，公共服務和公費教育是主題，福利救濟與娛樂消閒是副題。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是麥理浩施政的關鍵詞。市民覺得自己有權享用公共醫療、房屋和教育，就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這是締結香港族群的關鍵一步。政府派福利，照顧老弱，扶助婦女生育兒女，就是族群建立的過程。香港族群已經在八十年代成了雛形。

一九七二年，港府公佈《社會福利白皮書》，推出公共援助的福利制度。其後，家父幫助村中的孤苦老弱，寫信叫元朗的福利署官員上鄉村探訪，派福利救濟，那一刻，就是村社的人自覺成為香港族群的一刻。那時候，孤寡老人每月得到四百多元救濟金，在錦田郵政局領取，她們第一句話就是感謝香港政府。有些則感謝英女皇，皇恩浩蕩，有滿洲遺民的氣象。

享用福利，形成族群觀念

現在大陸人來香港取福利，抵觸了香港族群利益。然而，究竟是香港族群破綻，還是香港族群擴大，這還是看我們。不要再問香港人是否一個族群。由大家抗拒大陸人來香港取福利的一刻開始，我們已經顯示了族群意識。享用福利只限於族群成員，而族群就是命運共同體。示範一下原始的哲學問答，大家可以看到，懂得問題，就可以獲得知識，或者考核知識是否可靠。且看下面的公共政策的模擬對答，就知道為何福利與族群有關：

問：為何我們可以享有福利？

答：因為我們有貢獻，又有交稅。

問：但我們好多人一開始就失業，身體缺陷，好多人成世人都無交稅。我們一樣給他們福利照顧的。

答：他們有供樓，也有交租，最窮的人也有買東西，算是間接交了稅。他們也有親戚交了稅。

問：好多人一出世就是孤兒，而且是由於身體缺陷而被遺棄的，好多人世代貧窮，兩代人都拿救濟。

答：因為他們是我們社會的人嘛。

問：為什麼是我們社會的人，我們就有責任在艱難的時候給予照顧？

答：因為我們不會計較他們，因為是自己人。他們始終有一日會照顧我們，我們也有一日要受到他們的照顧。即使他們一出生就是有缺陷，不久就在醫院病逝，我們也不計較，因為我們當作是意外或不幸，而這些意外或不幸，說不定會降臨我們自己的身上。

問：然則，大家不計較，大家都為對方着想，大家都想到對方的命運如何，會經歷對方的命運，那麼，大家就是屬於某種好似親屬團體的成員了？

答：是吧。

問：然而，我們無必要照顧太疏遠的親屬的。那麼我們之間，是屬於甚麼團體呢？

答：有點像國家、民族或族群的團體吧。

問：彼此為對方設想，我也會經歷對方的命運，這個東西，可以命名為「命運共同體」吧？

答：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命名。
二十二

自由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兩者。香港的消極自由（不使用社會資源的自由），外人可以享用，也歡迎享用，例如大陸志士和反共學者在香港報紙發表演言論、出版著作等，但積極自由，使用社會資源的自由，一般不可使用。個別的政治庇護可以給予外地人，港府也一直在給予，但幾十萬以上的中國殖民，不能給予。

二十一
這種探求知識、排除謬誤的方法就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擅長的辯證法。是自由人的教育方法，也是城邦公民必需的教育。

安內攘外：麥理浩的統治術

麥理浩來港出任總督，是任期最長、影響最深的總督。他有兩大任務：

一、整頓六七暴動之後的香港創傷。一九六七年的工人暴動，由土共組織，但確是有 many 勞動工人和熱血青年參與，勇於犧牲。這些難民數量龐大，雖然在此謀生，但對香港缺乏歸屬感，他們容忍但不認同殖民政府統治，為了洩憤而破壞公共秩序，資本家也沒有歸屬感，殘酷壓榨工人。主導的整個七十年代就是歸化的過程。當中的重要措施是地區規劃和人口安置。前者是在新界設立衛星城市，後者是大量興建公共屋邨，令市民安居樂業。

二、預備九七大關的中英主權爭議和交接談判。麥理浩必須加快香港的制度建設和經濟轉型，將香港建設成為金融中心，並且在公務員系統和民間權貴系統佈置親英的人脈，將來制衡中共、箝制中共，守護香港文明並延續西方借助香港來套取利益並干預中國。當中的措施，是提升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和品質，並鼓勵產業升級及多元化發展。

港督麥理浩黃金十年管治當中，興建大量房屋，造福後世，到現在為止，仍令人津津樂道，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宣讀的首份《施政報告》當中，即提出規模宏大的十年建屋計劃，目標希望

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二年的十年時間內，從賣地等收益投入八十億港元，為一百八十萬名香港市民提供居所。為了推行計劃，麥理浩在一九七三年將原有的屋宇建設委員會改組成房屋委員會，另外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的房屋科改組為房屋署，兩者專門負責規劃和推行公營房屋計劃，以及着手興建簡稱「公屋」的公共屋邨，而原有的廉租屋邨和政府廉租屋則被歸類為「甲類屋邨」，徙置屋邨被歸類為「乙類屋邨」，一律統稱公共屋邨，歸由房委會和房屋署管理。為配合公營房屋的興建，他在同年成立新界拓展署，負責在新界興建新市鎮以容納更多人口，這可以疏散港九市區的人口，並且建設新市鎮，成為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齊全的衛星城市（satellite towns），荃灣、沙田和屯門是當年三大衛星市鎮。

公屋是社區，一套社會工程的系統

「有得住明華大廈^{二十三}，好過中馬標」，二〇一二年夏天，我訪問筲箕灣的老街坊，他們如是憶舊，其他地區的老居民，提起第一次有廉租屋，也是說好過中馬標、好過中「小搖彩」^{二十四}。馬標是馬票的俗讀，標是英文bill的音譯。所謂馬標，是香港賽

二十三：一九六四年，房屋協會在柴灣道口的綠寶村興建明華大廈，是為筲箕灣首座平民大廈。

二十四：賽馬賭博的一種多場組合，派彩豐厚。

馬會公開發售的大獎，跑馬之後，中獎者有幾十萬元（當年的巨款），可以一夜致富。六十年代有得住廉租屋的貧民，感覺就是中了馬標。自此，颱風來時，不必心驚膽跳，甚至有閒情觀賞風雨，慶幸自己脫離山邊木屋仔的險境。[二十五](#) 放工到街邊檔口買廉價的魚、肉、菜、果，用鹹水草和報紙包紮，出糧之後到燒臘檔斬料加饅，一包燒肉掏出下[二十六](#)，帶回家中給妻兒，是工人的無上幸福。得聞三五知己放工之後在屋邨大牌檔宵夜，更是當年貧民的幸福生活。電視台的《歡樂滿東華》、賑災等籌款節目，畫面閃過某某屋邨居民捐款等名字，也會令公屋居民有同聲同氣的溫暖的認同感。[二十七](#) 在樓下一齊食魚蛋、腸粉、也有鄰居的溫馨。

一九六四年落成的彩虹邨，與一個小市鎮無異，邨內除了郵政局、商店、三間學校及停車場外，更有道路連接觀塘道、龍翔道及彩虹道。公屋是一個自足的社區（Community），不是一群建築物。香港的公屋，是一套社會工程的系統，並不是安居那麼簡單。它包括以下功能：

一、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公屋群落是一整套生活安排，公共交通、工廠區、商場、街市、小販區、小公園、廟宇、教堂、祭壇、運動場、社區中心、圖書館、醫院、學校、補習社、託兒所、警署、郵局、官署、議員辦事處、福利團體辦事處等。由於公屋多數是開山而建，後山一般還有樹林河流等自然環境，使貧民可以適應，建立香港的現代生活形態，令難民迅速安

定下來。至今公屋的社區功能仍在。早期的公屋大廈名字，有寓意吉祥的，有以花木命名的，最昭明的是李鄭屋邨的大廈名字，都是些廉潔、道德、孝廉、禮讓，竟然有儒門教化的心思。

二、取得賣地收入，彌補建設費用：廉租屋（公屋）的土地都是清拆寮屋或填海而來，由於公屋往往與商場、私人屋苑混合，在經濟上政府有賣地收益，加快現代城市規劃，並以公屋輔助工業區成長。

三、提供廉價勞動力：廉租屋圍繞工廠區興建，工人可以就近上班，節省車費及時間，屋租補貼可令工資維持較低及穩定水平。

四、振興社區經濟：工人依靠微薄薪金而就近在屋邨食店、街市或大牌檔消費，價格低廉而人情味豐富，帶動市面興旺及締結社區感情。

五、締造街坊感情：公屋住戶好多是同一個寮屋區的清拆戶，彼此認識，甚至來自同一個廣東或福建的村落，這可以減少鄰里摩擦

蔡利民，《踏着回憶走過來——從明華大廈開始》，香港：進一步，二〇〇九年，頁四十六。

掏，音fāng，搖盪也。

蔡利民，《踏着回憶走過來——從明華大廈開始》，香港：進一步，二〇〇九年，頁四十八至四十九。

或族群風俗的對立，方便屋邨管理。故此，即使政府在五十年代後期推行以廣東話為香港的華語交流語，早期的公屋卻是難得的方言族群保存地。[二十九](#)上樓之後，舊時屋邨有很多公共空間可用（洗滌處、康樂室、乘涼小亭、球場等），也是無電梯的，經常在樓梯走廊見面。

六、製造幸福感：受災人士或寮屋居民要先在環境極其惡劣的安置區居住數月（無明文期限），始可編排上樓。安置區如酷刑阻嚇，令部分人知難而退，不貪圖公屋，亦可令甫即上樓之居民，恍如地獄超升至仙境，對公屋的新環境，產生遽然改善的心理效果（surprise effect）。

七、促進鄰舍關係及公共使用：香港公屋採用的是法國建築師勒哥布西亞（Le Corbusier）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的現代高密度都市規劃，方便而簡約。八十年代之前的香港公屋，都以便利鄰舍活動為主，走廊貫通，採光充足，空氣對流，而且有頗多不設特定用途的公共地方，任由街坊自由按照習慣而使用，形成生活空間（living space）。

八、杜絕黑幫及共產黨勢力結集：據加拿大人類學家司馬雅倫（Alan Smart）的考證，木屋火災有時是居民放火，博取公屋安置，有時恐怕是政府有意促成，以便鏟除非法寮屋以及政治社團勢力。筲箕灣兩次大火（一九七六年愛秩序灣大火、一九八三年聖十字徑村大火），都是促成該區大型公屋興建的原因。當時共

產中國經常給予香港災民米糧救濟，殖民政府深恐中共勢力滲透社區，為了穩定管治，惟有興建公屋，徙置災民。^{二十九}同理，政府在筲箕灣推行的「漁業發展貸款基金」，也是防範鮮魚欄的勢力坐大。

九、幫助居民建立互動的官民關係：公屋大廈是政府的屋邨辦事處管理的，也有學校、民政處、街坊福利會、郵局、警察局、消防局、圖書室、衛生署健康院或賽馬會公立診所、福利署等，居民在日常生活可以接觸公職人員，也會團結一致向公職人員討公道或寬容^{三十}，例如街坊要求有曬衣服的地方、燒香火衣紙的地方，街坊快餐店扯一塊遮擋陽光的帆布，有時居民會互相包庇，有時又會向管理處投訴那些惡霸鄰居，這就締造了早期香港的健康官民關係，協助香港社會走向現代化。

十、提供上進門路：公屋鄰近有整套教育，由幼稚園、小學到中學，兒童可以就近上學，不必搭車，回家食午飯，節省時間和金錢開支，有助貧民子弟上進。

二十八、參閱陳雲〈牛頭角風土記〉，《難忘香港食與色——城鄉風俗雜憶》，香港：花千樹，二〇〇九年。頁七至二十。此文章考證了牛頭角下邨（已清拆）的潮汕族群成分。

二十九、見其專著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三十、蔡利民，〈踏着回憶走過來——從明華大廈開始〉，香港：進一步，二〇〇九年，頁五十六至五十七。

英國政府靠建立公營服務系統（public sector）來支援公共社會（public life）及公民道德（civic spirit），這是加速的社區營造（hastened community building）。當然，早熟的現代化成果，會令香港人高傲起來，破壞香港人的自治能力，一旦殖民政府撤出，香港便呈現主場真空、無人做主話事的無助感。

九年免費教育與工科教育

公屋影響難民的第一代，令他們安居樂業，要影響難民的第二代，必須要有鑄造成新公民精神的公費教育，令他們的子女在香港出人頭地。麥理浩的教育功績，是推行免費的強迫教育與高中及大學的精英主義，採取分流教育（dual system）的方式，篩選人才進入文法中學與工業學院，在大學階段則進入一般大學及理工學院。

華人尊師重道，耕讀傳家，然而這只是限於上層階級，低下層的華人並無能力供養子女進入現代的學校受教育。在工業和服務業起飛時期，兒童輕易找到職業，故此，政府必須推行免費而強制的基礎教育。一九七〇年十月，港督戴麟趾於《施政報告》宣佈翌年起實施強迫小學義務教育。麥理浩重視教育，在上任港督前不久，港府才於一九七一年開始實行六年強迫小學義務教育，並制定《入學令》，不送子女上學的小學學生家長，處以刑罰。麥理浩任內致力將強迫免費教育推廣至初中，以配合香港整體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準，達致九年免費教育。

一九七三年，港府教育委員會發表報告《教育委員會對香港未來十年內中等教育擴展計劃報告書》，目標在一九八一年給予百分之八十的青少年獲得資助的初中學位，但麥理浩認為步伐過慢，於是在立法局成立專責小組展開研究，促成港府在一九七四年十月發表《香港未來十年之中學教育》白皮書，當中訂下目標在一九七九年推行九年強迫免費教育。一九七七年十月，麥理浩向立法局宣讀任內第六份的《施政報告》當中，決定提早一年，即是在一九七八年新學年施行九年強迫免費教育。此後，香港所有適齡兒童都要強制接受教育至初中三年級的程度。為配合學童增加和新市鎮的發展，麥理浩大力興建中小學，以容納更多適齡學童。

麥理浩重視工業和理工教育，以配合香港的工業發展，他先後在一九七五年創立葵涌工業學院和觀塘工業學院、一九七七年創立黃克競工業學院，復在一九七九年創立李惠利工業學院，培訓工科學生。

期間，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也相繼在一九七六年八月及十月成立。此外，麥理浩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將香港工業專門學院改組為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同時承認其專上學院地位，並在紅磡撥地興建新校址。麥理浩同年還把負責大學撥款事宜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改組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

會，使理工學院納入資助。除了香港理工學院外，香港樹仁學院（香港樹仁大學前身）及嶺南學院（香港嶺南大學前身）也分別於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八年獲港府認可成為專上學院。[三十一](#)

教育改革的失敗

黃茅白葦，是連片生長的黃茅草或白蘆葦，齊一卻單調。蘇軾曾以此評王安石。東坡先生《答張文潛（張耒）縣丞書》云：「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斥」是遍佈之意，如充斥。東坡抨擊王安石意圖以其新法及新學一統天下，但是美好的土地，滋養萬物的能力是相同的，滋養的物種卻不盡相同。只有荒蕪及鹽鹹之地，才會滋生同一的植物，一眼望去，都是黃色的茅根草和白色的蘆葦花，這就是王氏要天下齊一的效果了。

差異的觀念，令我們有個體自由。優劣的觀念，令我們有上升的志氣。教育普及之後，面對的是平庸化、齊一化的危險。這是將個性磨平，將個體的生存空間搗毀。十二年免費教育實施，但嚴格篩選學生的精英教育沒落了，教育當局在中學強調愉快學習、終生學習、體驗學習、「校園、通識教育、三三四學制等，但偏偏無實現小班教學，頗多中學仍是三四十人一班。大學則是

教育偽產業化（開辦好像是牟利的社區學院及碩士課程）、偽國際化（狂收大陸學生）。中小學則是教席短期合約化、短職化，教師尊嚴低落。

香港在九七後的教育改革，勢將毀滅香港的未來。殖民地在九十年代之前的教育是精英教育（用升中試和中學會考篩選人才）、分流教育（文法學校／工業學校；中文學校／英文學校）。基礎教育是均衡的傳統科目，文史、數理、社會。目前中學用的是單元式的綜合教學，通識科取代了傳統分科（歷史、地理、經濟），學生基礎的系統知識不強，而且用愉快學習、生活體驗等方式來傳授，這拆解了香港公民的共同知識基礎，且令到中學生自高自大，認為可以自行體驗生活而取得知識，而不是系統地讀書和記憶資料。

這種情況當然不獨限於香港。在全世界，「學習過程」（process）壓倒了「學習內容」（contents）、「議題為本」（issue-based）取代了「知識為本」（knowledge-based）。學生的基本知識薄弱，要進一步了解這個世界，向壓迫者抗爭，便難上加難。^{三十一}為甚麼會搞到這樣？因為香港的官方教育用了左翼的

^{三十一} 采自維基百科「香港教育史」的詞條。筆者並非教育史專家，此處簡述，不多談。

^{三十二} 李偉才，〈後現代助紂為虐〉，《主場新聞》，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教學理論，這些學生，在大學讀文史和社會科學，再遇到左翼的人文科學者，就成了終日講後現代、解構的一群邪教分子。他們沉迷於一套含混的術語，脫離社會現實，無法與人辯論。當然，如果他們學到專業技術，仍可以打份安穩工的，但要反抗，就難了。因為對抗資本主義剝削的學問，不是後現代理論，而是現代知識；對抗共產黨的文化洗腦，不是用後現代，而是用傳統知識，因為共產黨那套，是現代法西斯的專政知識。香港抗爭三十年，至今仍被中共及財閥勞役，是因為走錯了路，正如中國走錯了路，青年信了社會主義，在四十年代支持共產黨思想。

九七之後的香港教育改革，刻意或無意之中，犯了以下錯誤，將來必須撥亂反正：

- 一、 地區派位限制：採取就近上學的原則，但也限制其他偏遠地區的學子去名校就讀。
- 二、 直資學校：有些名校採取政府直接資助方式，形同私立學校。
- 三、 取消升級公開試的甄選：令學生直接讀到中六，良莠不齊，大學收生變得難以識別人才。
- 四、 取消文法中學與理工教育分流：不能適應考試或規矩學習的學生被逼枯坐課室，浪費人才。

五、錯誤的教學方法：例如不授予系統知識，而用所謂體驗或發現教學法，無視於香港的混亂環境。

六、失敗的語文教學：用教外語的方法教中文，採取語法教學和拼音朗誦，卻用教母語的方法教英文，放棄語法教學及語音學教學。用語文表達的工具方式教學，放棄文學及文化教育。語文教學一旦失敗，閱讀能力、交流能力、表達能力都垮掉。

(七) 殖民政府撤出， 香港如何替換功能？

好多大陸人會這樣質問香港人：「為甚麼英國人統治香港的時候，香港人不爭取民主，九七之後，回歸祖國了，就天天鬧民主？」同理，為甚麼英國人統治香港的時候，街頭示威好少，九七之後，香港卻變成「示威之都」，示威情願之事，無日無之？年青一代香港人懷緬英國殖民統治，但年老一代香港人卻討厭「鬼頭」上司，老是記住被西人踢屁股的日子。有些人說英國為香港帶來禮樂文明與現代化，有些人說英國人視華人為二等公民，呼呼喝喝，動不動將示威者打到頭破血流。看官，殖民統治

的方式與時俱進，大抵是不斷推進香港自治及政治本土化。年青一代的殖民歲月參照期，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而年老的一代的參照期，卻是五六十年代，感受自然不同。

更有人說，英國人給香港繁榮和民主，是另有所圖，想借香港控制中國，不懷好意。香港最深刻的行政改革和城市建設，城邦格局的大成，來自麥理浩總督統治的七八十年代，而麥督銳意經營香港的政治動力，來自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威脅，麥督必須將香港加碼建設，快速從工業城市飛躍到現代化金融中心和商務中心，令中共的現代化要依賴香港而投鼠忌器，為香港主權之易手，討到好的條件。同理，彭定康總督在九十年代推行政治問責制及議會民主，也是要應付中共在八九年六四慘案之後的香港情勢，要用民主來拒共。這些都是毋庸隱藏的政治動機，然則這些統治效果是對香港有利的，也對華夏有利，年月消逝，今日我們看的是功效，不是動機，這是《孟子·滕文公下》有關「食志」（獎賞用心）與「食功」（獎賞功效）之辯。三十三

兩任總督在香港留下的功績，其誘因都是以香港的制度來制衡中共、箝制中共，守護香港文明並延續西方借助香港來套取利益並干預中國。麥督奪取的是中英談判之前的香港優勢，彭督奪取的是中英達成主權移交之後的香港優勢。麥督的貢獻是經濟上的、制度上的，彭督的貢獻是政治上的、民心上的。前者，中共樂觀其成。後者，中共恨之入骨。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飛躍發展

李彭廣的《管治香港——解密檔案的啟示》（二〇一一年）^{三十四}研究了英國解密的檔案，研究了麥督治港時期的政治底細。他縱覽殖民地的機密行政檔案——如諭令、備忘、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和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CCO）的通信等，有助理解香港戰後的行政決策及過程。

麥督是外交官，他來香港擔任總督之前，草擬了治港大綱，列好重大改革，過程艱難險阻，驚心動魄。戰後，英國為統治各殖民地，奠定了本土研究基礎和培養了行政人員，然而要將香港的發展大幅度推進，必須要有積極進取的公共財政、幹練的政治顧問和具備政治技巧的政務官。前者要提拔新的財政司，後兩者要從外交系統請求調配官員輔助。即使是香港本土或其他英國海外殖民地培養的人員，也是政治視野貧乏，行政知識不堪當時使用。即是說，支援麥督統治的高級公務員團隊，是特別強化的治理團隊（an specially enhanced team），連傳統的、尚算行之有效的殖民地官員系統，也是不敷使用。

三十一
「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曰：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

三十二
該書在梁振英出任特首，開始中國式殖民統治之際出版。

香港在九七之後，撤走了這批強化人員，留下本地華人官員精英，面對中共也急流勇退，有些盡了人情，任期過了九七，待香港平安過渡，也辭官他去，特區政府有如何可以管治已經飛躍發展的香港呢？

英國支援系統抽空，特區政府癱瘓

統治必須要有輔助決策的知識和內外情報。英國非常重視行政判斷的科學基礎和情報支援。一九五一年，殖民地部的通信指出：「知識是任何穩當發展的唯一堅實基礎。」英國的殖民地研究，由英國本土的大學、海外殖民地官員及特約研究員共同組成，編制及經費龐大。舉例，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十年間，研究經費預算是一千三百萬英鎊，實際開支為一千零三十六萬英鎊。^{三十五}由於香港是戰略性的殖民地，頗多經費投到香港研究。保守估計，香港研究大概可以分到每年六十幾萬英鎊的經費，就是一千萬港幣（以一英鎊兌十六元港幣計算）。以當年的購買力計算，當年一萬元港幣，可以買到九龍一座大廈。這是多麼驚人的經費投入！我在政府總部工作的時候（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七年），中央政策組的香港研究經費，一年還不到一千萬港幣。六十年前，英國殖民地部已經為香港研究投入每年一千萬港幣。

令香港癱瘓的，是由於英國的制度支援抽空了，截斷了殖民地系統及英聯邦國家的研究支援和人才供應。這些空洞，是中國無法替香港填補的。要補救，只能由港府自己做。以我的行政經驗，最少要包括下列項目：

- 一、設立檔案法，規劃及保存行政檔案，使官員及民眾可以追溯決策及行政過程。
- 二、公務員外派英聯邦實習，延續英治制度的生命力。
- 三、恢復港府中英並用的傳統，並嚴格管制中英文的公共文書，援引英國和台灣的公共文書做研究基礎，使定義清晰，可以追究責任，並使官方語文典雅莊重，令人肅然起敬。
- 四、鼓勵港僑回流香港政府服務，延續香港的世代文化傳承及引入外地經驗。
- 五、鼓勵大學從事本土研究，並設立官方的行政學院，訓練官員，在過渡時期委託本地或外地的研究機構，研究香港政治。

六、鼓勵大學開設政治實務訓練課程。

七、重建市議會及地方行政系統，鍛煉政務官的政治技巧及靈活處理地域及社區差異。

八、訂立政黨法，扶植本地政黨成長。

(八)

重建香港的 世族與士族

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人民做主。做過行政的人，懂得實務的人，管過家的人，才可理解民主的全局事實。歐美和日本的民主過渡，由悠久的君主制度過渡而來，世家大族與精神貴族得以一脈相承^{三十六}，中國在民初的民主過渡，只能局部接收滿清時期的世族和士族。中共更是剷除世族與士族，由零開始。故此，中共的民主過渡，沒有指望，台灣和香港的，還可以補救。

香港的民主化是必需的，但它的缺失也必須補救。民主是由下而上的民意授權統治，但民主有一個不大方便告訴人的秘密：它

的統治階層，總體而言是由上而下的道德與能力典範。採用君主立憲的地方，如英治時代的香港，帝制維繫了香港的權貴階級、上流社會的道德承擔和共同長遠福祉的關懷，然而，香港交到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共和國手上，受到一黨專政體制的干預，本身不民主的香港，政治制度的缺失頗大。即使將來香港民主化了，也要面對沒有君主立憲的共和民主體制的問題。

彌補民主政治的缺失

民主的缺失，有兩個：

一、民意的利益是短期的，不是長期的。

二、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或lobbyists）競逐的利益是局部的，不是整體的。

承擔整體的利益和具備長遠的視野，共和民主政體需要政黨和內閣，它們分別由世族和士族提供：

三十六· Rothschild Family與Rockefeller Family，是美國甚至歐洲主要的世家大族，其淵源可追溯到非常遙遠的古代（埃及第一位法老或更早），他們的對政治及經濟的影響力，並不是單單財閥左右政府那麼簡單。

一、世族：世家大族。他們經歷朝代變化，知道歷史興衰，無懼於掌權一時之元首，而且他們有長遠的執政部署或干政慾望，他們可以給予政黨長久的支持，提供資金和人員，形成可靠的大政黨，不會出賣本土利益。

二、士族：知識分子團體，所謂知識貴族，他們組成輿論監督和學術研究，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弟子出仕於政府當部長、高官，形成執政內閣的官員。

香港在九七之後，世族和士族，都潰散了。沒有世族和士族，政黨出的，頂多就是優秀的技術官僚，好像台灣的馬英九那種人。至於陳水扁那種，更不堪設想。

香港要重振世族和士族，要做兩件事：

一、產業轉型：利用內陸的新領地，大量供應土地，紓緩高地價政策，將壟斷房地產得來的利潤，投資到實業之上，令資產階級在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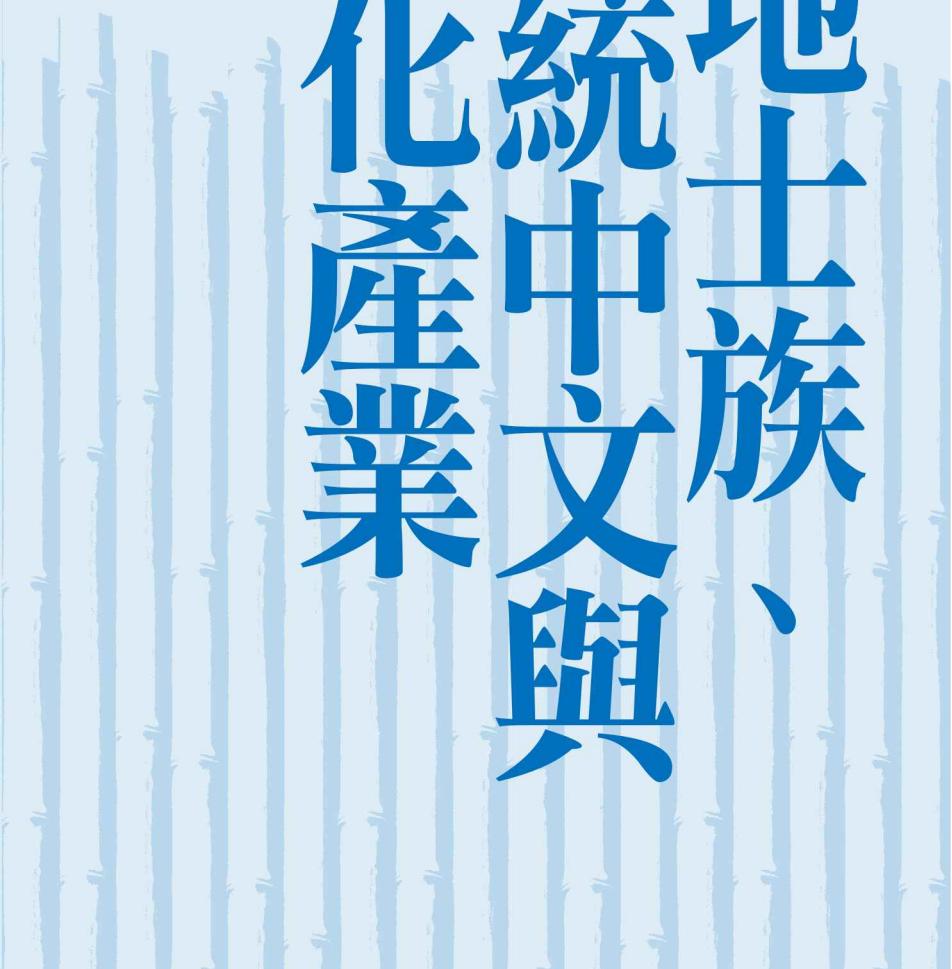
二、整頓教育和研究體系：特別是高等教育和研究所。鼓勵本土問題研究，多設立民辦的研究所和基金會、智庫，鼓勵民間演講和辯論。

香港首富李嘉誠一生的遺憾，就是他沒有從政，這是他接受南方報業集團訪問時講的。**三十七**一個正常的地方，最高級的人才是去了哪個行業的呢？告訴你，是從政。古今中外，最上乘人才的事業，是從政。希臘羅馬的教育，是為了培養政治人才，參與城邦或帝國的管治。古代中國的教育，最高的目標，是考科舉出仕，以天下為己任。

為什麼呢？因為政治是訂立你的公共生活秩序及保護你的私人生活空間，一個地方政治昏沉，誰都會當災受苦。以前香港由於受到殖民地統治，香港人不能從政，但從政的英國殖民官，多數是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的一等畢業生，在殖民地部接受訓練，給予優厚的待遇及榮譽來香港出仕。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講明，政治之所以重要，比自己的莊園更重要，是由於在自己的莊園，你訂立甚麼規條，都只是影響莊園的家人和僱工，那些規條也不一定制裁到自己。從政者訂立的規條，卻會制裁到自己和自己的後代。故此，要有第一流的人才，進入從政的圈子。

三十七：「記者問到，他已八十五歲，回首過去，覺得自己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李嘉誠自言無論如何努力，仍發現沒有一個人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可能會考慮參政。」（李嘉誠：不評價自己人生有遺憾），《南方都市報》，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殖民地土族、 傳統中文與 文化產業



- (五) (四) (三) (二) (一)
- 殖民地士族與金文泰總督的反五四運動及古文教育
 - 粵語的優勢與第二波中文運動
 - 香港的文化格局與王道天下
 - 香港流行文化之興衰及教訓
 - 復興香港文化產業，提升庶民品味

聖誕節，緬懷我讀英國文學的日子。「離地中產」這個詞，我英譯為absentee middle-class或absentee bourgeoisie。意念來自當年英格蘭地主持有愛爾蘭土地，卻住在英格蘭的現象。地在愛爾蘭，心在英格蘭，所謂absentee landlords，爾後，愛爾蘭用宗教信仰、文化復興及武力手段，尋求自治或獨立。當中，詩人葉慈（W.B. Yeats）做的，就是恢復愛爾蘭古老風俗及基督信仰，發起基爾特文化復興運動（Celtic Revival），並且提倡重建貴族（aristocracy）。我現在為香港做的事情，譴責離地中產、復興華夏、提倡中文運動，都有歷史軌跡可循。這就是讀書的功用。讀書不是用來開讀書會、張揚學問，而是變化氣質，身體力行。

陳雲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面書留言

(一) 殖民地士族與金文泰總督的 反五四運動及古文教育

語言與文字，乃立國之本。改變了語言和文字，就改變了國族。明代燕王朱棣奪位成為明成祖之後，為了圈禁士族，將京城從金陵（南京）遷到北京，令漢語士族被胡語庶民包圍，定下今日中國的國語無法着落的困局。明太祖朱元璋本來有恢復漢唐的兩京之心。洪武元年，下詔以汴梁為北京，以金陵為南京，倣仿周、唐的兩京格局，經濟南北共榮，語音南（江淮官話）、北（中州官話）兼顧，可惜北方凋敝，百廢待舉，明朝國力有限，此舉作罷，明太祖只能以金陵為京城。

滿洲統治中原，只是禮儀上使用滿文，卻未嘗改動漢文漢字。民國初年，胡適、陳獨秀等人提倡白話文運動，改換語文，是國體變革之開始，儘管當時提倡的白話文只是用在文學創作之上，文書公函、著書立說仍以淺白文言為主。中共統治大陸，創立普通話^二及簡體字，消滅地方傳統語言，甚至有意推動中文拉

二 金、元兩朝的大都，明太祖改名北平。
民國的國語並未受到系統性的規範。更且，中華民國也是新中國，只是沒有中共那麼徹底洋化、蠻夷化。只有香港才是保存全體的華夏。

丁化，將中文改為拼音語言，才是根本變革。中共建立的是一個新中國，一個新的國族（nation）。這樣中國就與香港和台灣都分開了，再無統一為單一國族的文化基礎。因為，中國自己獨立了，從傳統分割開來，與台灣和香港的文化迥異，自己成為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那個新中國的國史也由一九四九年開始。一個寫簡體字、講普通話、濫用拉丁拼音^三，風俗殊異而自我孤立的新興民族，憑甚麼來與香港人、台灣人講血濃於水呢？漢字自漢朝以來，無統治者夠膽做系統性質的改變，因為一旦系統性地改變漢字，就不是華夏（日本、越南曾經系統性地改變漢字，但程度也不如中共的嚴重）。說那些寫簡體字的、用現代漢語規範語法的，不是漢人，並不為過。

當華夏變成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英國的高明之處，是維繫舊華夏王朝的文化，頂住了國語（北方）、白話文的壓力，用廣東話做香港的中文交流語，而且堅持正體中文和古雅公文。多得英國總督的英明果斷，本地遺民的艱苦經營，令香港立於隱然的華夏文化領導地位。

官學生計劃：殖民地複製的中國士族

為了維護這個華夏王朝傳統，英國以基督倫理及現代行政，在香港複製了中國的士族，培養一批學習儒家古文經典，講漢音雅言，交流中西文化的香港統治階層。香港歷任總督的生平，初期

有軍官、外交家、文官，後來的多數是士官（scholar-official），經考試選拔，大學畢業而學有專長，有經院教育及博物知識，並且有海外歷練，獲得地方行政經驗及上司提攜、點撥，在香港任職之後，返回英國，告老歸園，偶然也有出任公務，但絕少沾手商業。港督的學養、性情與還官之後的田園生活，一如唐宋明清的士官，原因是英國在十九世紀建立文官制度，參考中國的科舉及官制。英文翻譯中文的「士」，就是scholar-official。例如金文泰（Cecil Clementti）、尤德^四、衛奕信等精通漢文漢學的香港總督，假如滿清君主立憲成功，即使到中國的州郡出任總督，亦是勝任有餘，華人也不會反對，好似滿洲時期任命英國駐廣州領事館的官員赫德做海關總長一樣。殖民官的漢文譯名，也如王朝中國。早期總督如德輔、彌敦，有滿洲王公之名；後期的戴麟趾、金文泰，則如漢人士族；警務處長薛畿輔^五（Charles Sutcliffe，一九一六年至二〇〇五年九月）、財政司夏鼎基（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華民政務司麥道軒（John Crichton McDouall）、何禮文（Sir David Ronald Holmes）等，俱是名副

三· 例如北京西站在一〇一四年的英語標誌，竟然改為Beijingxi Railway Station，取代原先的Beijing West Station，將中文的「西」字變成無法譯的專有名詞。

四· 尤德管治香港不久就中道離世。他自奉節儉，克己有禮。網友告知，一位替他打工的工人說，尤德把所有最好的悉數給予港人，自己一粒米也不浪費，數日前的冷飯，他很有禮貌告訴工人炒給他吃。當年他離世，香港很多人為他流淚，簽名悼念，捐款成立慈善基金。

五·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間，擔任香港警務處長。醉於一九七三年負責調查總警司葛柏的食污案，促成廉政公署成立，令薛留名港史。然而，他對待華人示威者，甚為狠辣。

其實，譯名如漢人進士。此外，從一八四二年至一九九七年，始自維多利亞女皇，歷經愛德華七世、佐治五世、愛德華八世、佐治六世，最後是伊利沙伯二世^六，都可稱為仁德之明君，相對於大陸的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溥儀，民國的袁世凱、張勳、蔣介石、汪精衛，共產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此等君王或軍閥，或是昏庸或是殘暴，香港確可以召喚多一些舊王朝的文化記憶。

英國掌管海外殖民地的Colonial Office，港府初期譯為「藩政院」，名如清初皇太極設立的理藩院，戰後才逐漸改稱為「殖民地部」。英治時代，香港的憲制地位及三權分立制度，由《英皇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及《皇室訓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規定。終審法院在英國，稱為樞密院（Privy Council）。這些中文譯名，都有王朝中國之風。香港中文翻譯governor為總督，即沿用清朝官制，總督管轄兩三個省，例如兩廣總督管廣東廣西，兩江總督管江蘇、安徽、江西，直隸總督管京城。總督之下，每省設巡撫一人，如省長，其下有布政使及按察使，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法。九七之前的布政司（chief secretary）^七、首席按察司（chief justice即大法官）就是這樣來的^八，其餘財政司、銓敘司、教育司等，管領財政、官員升遷、教育等。「司」是主管的官名，源於《周禮》，司徒管土地及徒役、司馬管兵馬、司農管農政、司寇管刑法等。今日的政務

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之類，就是用了共黨的中文，將民國時期軍法統治的軍長、司長轉到文治，可謂斯文掃地。

英國在香港實施的官學生訓練，乃至官制之中文命名採用滿清名詞，是將華夏王朝制度和名目返傳中土，特別是中國廢除帝制，建立共和國之後，在香港的王朝風範，更如殘陽餘暉，孤照華夏。英國的文官制度（Her Majesty's Civil Service），實則是模仿中國的，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四處擴張，亟須公務員治理，原有的取代以前的買官制度或榮譽職位，不敷應用，功效亦不佳。⁺一八〇六年（清朝嘉慶十一年），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九在倫敦設立東印度公司學院（East India Company College），訓練文官，採取的方法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及論功行賞。⁺一八五四年，羅富國及狄懷仁向國會提交報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模仿中國的制度，設立日常庶務的吏及政策制定的官，以考試、實習、輪替及考核升遷的方法，選賢與能，

六 此處之帝王列表，採自陶傑，〈拼爺〉，《蘋果日報》，二〇一二年八月廿二日。

七 一九七六年之前，稱為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

八 布政使及按察使，清朝簡稱藩臬。

九 統治印度及從事貿易的商人與權貴階級集團，於一六〇〇年取得英王伊麗莎白的特許令（Royal Charter）而成立，擁有私人軍隊，儼然英國的海外藩主。一七八四年解散，它員及軍隊國有化。

十 *Chinese Idea in the West. Prepared by Professor Derk Bodde for the Committee on Asiatic Studies in American Education - University of Columbia, 2005.*

服務政府。一八五五年，委任銓敘司執行此報告，後世依循。當然，中國的文官制度去了英國，由於有君主立憲制度、民選國會、法治及現代科學，效果比中國本土的好。

金文泰總督復興古文教育

香港歷任總督之中，影響最大的有四個：金文泰、楊慕琦、麥理浩、彭定康。楊慕琦啟動香港民主，雖然中道調遷，也在後來促成了政局民主化。麥理浩用公共服務、福利及經濟轉型奠定香港的本土歸屬感，並創立廉政公署，整飭吏治。彭定康提倡政治問責，還政於民。然而，論及文化的百世影響，金文泰的功勞最大。金文泰在香港發起反五四運動，在香港提倡古文與國學，影響深遠，是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逆流。

金文泰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出任香港總督，他是士官正途出身。一八九九年參與英國政府殖民地部的「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亦稱「（殖民地）官學生計劃（Colonial Cadetship Scheme）」。此計劃是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九七年）於一八六一年倡議創立。理雅各是蘇格蘭人，一八七六年出任牛津大學第一任中文講座教授。他在出任牛津大學首任中文教授的就職演講中說：「牛津大學不應只為培養居於大學象牙塔的學者而設，年輕學子應通過學習中國語文及文化知識，參與大英帝國遠東事務。」理雅

各在居港三十年間（一八四三年至一八七三年），用英文翻譯《四書》及《五經》，並邀得大學士王韜襄助^{十一}，乃香港國學研究上之創舉。

理雅各提出的計劃，得到羅便臣總督（Sir Hercules Robinson）青睞。羅便臣在一八五九年到香港擔任第五任總督，時年三十五歲，是香港歷來最年輕的總督，也是第一位文人總督（前四任總督都是武官）。羅便臣鑑於香港吏治不清而且高官貪瀆，又不通曉中文及熟悉華人風俗，於是採納理雅各的建議，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在定例局（後來的立法會）通過「官學生計劃」，並在同月致函英國殖民地部大臣紐卡素（5th Duke of Newcastle）備案。

每年用公開考試方式，從精英大學畢業生之中，優先挑選認識中文或具備語言學習能力的二十歲以下青年人，首屆名額三名，此後每屆兩名，各人給予一百英鎊路費，由居英國的友人擔保，前往殖民地實習，年薪二百英鎊，學習中文的師資、書籍及宿舍由公帑支付，首兩年專注學習中文，每半年考試一次，不及格者遣回英國，官學生或其擔保人必須向政府交還路費。兩年期

^{十一} 王韜曾經旅行歐洲，於一八七四年在香港創立漢文《循環日報》，是首家華人獨資的中文報紙，他發表時事評論，介紹西洋實業，鼓吹中國變法圖強。

滿後，考試及格，聘任為傳譯官，年薪升至四百英鎊，保送政府部門任職。學習中文的兩年時間，會派送到廣州，跟隨當地的舊學之士，用廣州話學中文。兩年之後表現及格，年薪遞升至五百英鎊，並優先考慮聘任為常任公務員。當年華裔工人在香港的薪金只有十五英鎊，故此官學生的待遇可謂優渥。^{十二}當年的英國殖民地高官，是用粵語學中文及國學的，這是香港殖民地的中文教學，貫徹用粵語、古文及漢楷的原因。

殖民地官學生計劃是一個取代滿清大臣（Manchurian mandarins）的香港士族訓練計劃。官學生的英文是cadet，源自法文，意思是初級公務員、見習公務員。官學生所學何事？根據考試題目重構教材，理雅各的教學選材分為兩類：第一是宗教類，以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為主。第二是中國經書，以四書如《論語》、《孟子》為主。此外還有《三字經》。^{十三}這方面有一點華夏士大夫的教養。古人讀五經、四書，加一點唐宋詩文，談文論學有經典做根底。《五經》是堯舜禹三代、周朝與春秋的學問，讀《詩經》懂得周朝風俗，讀《書經》知道上古帝皇與賢臣德行，讀《易經》識得天心與權變，《禮》、《春秋》，外加《左傳》，認識周朝諸國並立的天下，應對秦朝之後的中央集權國家，便是綽綽有餘。即是說，即是秦代之後，王朝奉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士大夫的道德觀念和哲學體系仍是周朝的，這樣就可以用先秦的三代，來衡量秦漢之後的世界。

殖民地的官學生綜合基督教及儒家經典，這是以古典知識培養經國人才的常軌，而且在香港的官學生訓練，更是中西合璧的士族訓練。官學生的漢文水平與漢學知識只須達至基本要求，視乎個人志趣，有些只是一般（如葛量洪總督），有些則如翰林學士（如金文泰總督）。基督教信仰和神學知識，除了聯繫留港的歐美族群之外，也可以與香港的新興中產階級打交道，這些高等華人，很多因為家庭曾在上海租界居住、香港教會學校教育、自己出國留學等的原因而信奉基督教，他們備受宗族排擠而在教會生活和婚嫁^{十四}，自成一國，成為香港的中產階級和新興士族，英國殖民官可以與這些華人基督教士族籠絡。

官學生在英國並非出身貴介，歷年來只有一人是伊頓（Eton）及哈羅（Harrow）公學畢業^{十五}，其餘都是公立學校甚至鄉野學校的高級中產子弟，憑考試成績升上精英大學畢業而獲得取錄。他們的父親多數是律師、藥劑師，最多的是神職人員，極少是商人或店主。香港的殖民地官學生，頗多選自牧師家庭，看來是牧師的兒子受到嚴格品德教養，而且受到會眾及鄉黨的監督，不能丟失家聲。

十二・ 參閱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香港：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頁九十六至一〇一。

十三・ 劉紹銘：《國粹・軟刀子・雜說》，《蘋果日報》，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十四・ 除非這些基督徒來自整個村落（例如信奉基督教的客家村落）或族群（如離島的漁村）都改信基督教，教會才可以結合宗族社會。
十五・ 這些貴族學校，教的是古典教育、體育鍛煉及野外求生，也並非真的奢華。

這些官學生自視甚高，卻非權貴階級。他們喜歡社交式的體育，例如郊野遠足、游泳、馬球、網球、橋牌，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新界之後，新界的郊野便成為英國駐港高官的遠足鍛煉之地。^{十六}

此計劃於一八六二年四月與香港刊憲執行，首屆官學生有三名，史美（Cecil Clement Smith）、杜老誌（Malcolm Struan Tonnochy）及田尼（Walter Meredith Deane）。史美來自劍橋大學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來港兩年後，考試及格，在一八六四年擔任撫華道（Registrar General^{十七}、總登記官、後來的華民政務司），一八七八年調遷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麻六甲及檳榔嶼）輔政司、總督。杜老誌及田尼來自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杜老誌官至域多利監獄典獄長，田尼官至警察總長。為使香港的華人了解政府事務及香港法律，羅便臣總督在一八六二年三月一日出版首份中文憲報，名為《香港輶門報》。

此計劃延續到一九四一年，因日本侵華、香港戰亂而結束，期間總共招募了八十五名官學生，培養的傑出統治人才，除卻上述首屆的三人之外，還包括庫務司李思達、輔政司及拓展新界司史超域（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助理輔政司及溥儀皇帝私人教師莊士頓（Sir Reginald Johnston），以及三位總督：梅含理（Sir Francis May）、金文泰及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戰後，官學生的制度以公務員見習生（cadet officer）的形式恢復，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政司黎

敦義（Denis Bray，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五〇五年），就是此間的佼佼者。黎敦義在香港出生，父親是循理會牧師，是華英中學校長，黎敦義跟隨父親在廣東佛山讀書，後來赴英深造，一九五〇年取得劍橋大學經濟學碩士，回港在港府漁農處做見習生。

中國動盪，金文泰安頓香港

中國陷於內戰及分裂，香港怎麼辦？金文泰總督畢業於牛津大學（Balliol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是當年英國的遠東問題專家，他精通漢學，曾在中國境內旅行，由新疆至廣州。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在皇家帝國學會（Royal Empire Society）演講《論香港之未來》（The Future of Hong Kong），回顧他任內的經歷，並且勸告英國要放棄對中國統一政府之虛幻，要務實處理香港問題。演講摘要：

一、一九一一年之後的中國，處於內戰分裂狀態，認為中國仍有一個統一政府，是幻覺。外交政策不可基於幻覺。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逝世之後，中國陷於分裂，當時英國竟然認為北京的北洋政府

十六· Kwasi Kwarteng, *Ghosts of Empire -- Britain's Legaci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Bloomsbury, 2011, pp. 335-337.

十七· 負責登記華人人口，招呼各地保長（中國頭目），清潔環境（潔淨頭目），防疫，負責訊問妓女及出售淫書（「賣豬仔」），查明是否自願等等雜務，俗稱Protector of Chinese，撫華道。

仍可以號令中國，是幻覺而已。孫中山退守廣東，通過香港向英國求助，而英國為了不開罪北洋政府而拒絕了孫中山。孫中山轉向蘇聯求助，定下「聯俄容共」之策，令俄國有機可乘，介入中國，而且排斥英國利益。英國在此犯了重大錯誤。

二、其後發生的省港大罷工，是蘇聯的共產黨策略，用以破壞香港與廣州的貿易聯繫，實際是對香港的貿易禁運制裁，令英國損失數以百萬元的利益。

三、香港要加強與廣東聯繫，但由於香港是自由貿易，不徵收關稅，大陸省市對於香港與大陸的走私漏稅問題，必會趁機制裁。

四、英國必須謀求永久割讓新界，使到英國在中國永遠保留貿易基地。

省港大罷工在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在香港和廣州爆發，連續十六個月，事件因上海工人領袖被殺而起，激起華人示威，英國軍警先後在上海租界及廣州鎮壓示威華人，俄國資助的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發起反對外資的罷工，香港工會號召工人響應罷工，三萬名香港工人及市民往廣州聲援。廣州封鎖香港貨物（包括糧食）進出內陸，封鎖海運，令香港工業蕭條，出入口貨值在一年之內減少一半，經濟元氣大傷，市面接近癱瘓。香港捲入大陸政治，得到的是無妄之災。^{十九}香港民眾如果捲入大陸政治，受到政治擺佈，後果不堪想像。

廣東禁運一役，在香港臉上打了一拳，但金文泰居於弱勢，他做的不是要報復，而且要籠絡。War at hand, but business as usual. 當前是打仗，但生意照做，認着銅板做事。**十九**這是英國一貫的海外政策。金文泰定下的政策，就是中港文化區隔，聯繫廣東、籠絡廣東而區隔外省。省港大罷工之後，他於一九二七年訪問廣州，與李濟深政府交往，李氏於翌年訪港。鑑於中華的共和國（中華民國）興起，金文泰發起古文教育，與民國的白話文運動，各自隔離。如此，香港乃有反五四運動，也是反民國的精神，那就是金文泰總督的古文運動。滿清覆亡，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一年建立以後，許多滿清遺者，為表忠貞，寧願南下香港，隱居於英國殖民地，或教學或閒居，成為遺民。金文泰請前清遺老執掌漢文中學及香港大學中文系，香港和大陸文化自此分道揚鑣，香港仍為華夏帝國格局，中國大陸則走向民族共和國。

金文泰通曉中文，國語及粵語流利，編譯招子庸的《粵謳》**二十**，以《廣東情歌》之名（Cantonese Love Songs, 1904）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在香港報紙登載的演講稿，當年曾被中國大陸的學者誤會為滿清大人之作。金文泰於一九二五年出任港督之後，

我童年的歌謠，有記載此事：轆轤鳩鳩，行路上廣州，游水看雨樓。

十九 銅板是錢幣的意思。

二十 粵謳，又稱越謳、解心，流行於清嘉慶末年，是廣東民間說唱，由名士招子庸編著《粵謳》一書後開始廣泛流傳。文字長短句結合，有故事情節，有韻律，但不拘形式。

次年（一九二六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金文泰中學前身）。中國大陸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改革教育，一九一七年之中小學課程廢除「讀經」一科，然而香港政府的漢文中學仍堅持開設「經學」，並聘用滿清遺老岑光樾為教習。[二十一](#)

一九二七年。金文泰於香港大學創立以教授經典國學為本的中文學院，以書塾的形式教授經典，並獲富商鄧志昂和馮平山捐款建院和中文圖書館等。香港大學創校以來，沿用英式學制，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不提倡華夏傳統文化，並無設立中文系。金文泰與香港的前清遺老一見如故，向港大建議成立中文系。他認為前清翰林經歷公認的科舉考試，最夠資格執教，一九二六年，港大設立經學課程，由辛亥革命後避居香港的晚清翰林賴際熙（金文泰之中文教師）、區大典、區大原、溫肅等六七名遺老，教授四書五經。幾經周折，中文學部（School of Chinese）於一九二七年成立，抵抗五四新文學家的批評，教授古文經典、經史子集。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時人依照清朝稱呼總督而叫香港總督做「制軍」。「金制軍」在督轄茶會中以廣東話發表談話，應合周爵紳（周壽臣）和賴太史（賴際熙）有關「維護國粹」的言論，說明在香港大學成立「華文學系」之必要。金制軍用粵語演講，列出三個理由：一是在香港的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二是「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三是「就係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二十二](#) 清初的幾個皇帝，幾乎是儒學

專家，而且通曉西學，是最有文教的王室。金文泰成立中文系演講詞的三點，以及其演說之文雅與視野擴大，猶如精通中學與西學的華人學士。

任教的前清翰林早於一九二三年創辦學海書樓公開講學。在金文泰的支持下，國學得以在大學及民間流行，南來的文士與作家有講學之地。港大中文系及學海書樓的弟子，頗多成為大學的中文系教授及中文教師。香港的公共中文以古文為本，公共中文語言以廣東話為唯一的中文語言，例如香港電台中文台在戰後改為全用廣東話廣播，香港保存漢音漢字漢文，都應感激金文泰。金督就任總督期間，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魯迅獲邀來港演說，見香港猶如停留在清朝，白話文運動功效不彰，甚為不悅，他的講題是「老調子已經唱完」，認為國學與古文教育是老調子、是封建殘餘，應該落場。一九三五年一月，胡適參訪香港大學，抨擊中文教學之落伍，中文系落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之手，適逢港大當局有意聘請胡適主持中文教學的改革，胡適便向港大校方推薦了許地山。許地山將中文系的經學課程取消，改為現代的中國研究，文史哲不分家。

二十一·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六年。二五四及二六六頁。

二十二·

金文泰全文演講，可參閱魯迅《而已集·略談香港》。

香港是帝國格局，中國是共和國格局

香港的歷史，是另外一套的進路，不是民國的進路（*republican approach*），而是帝國的進路（*imperial approach*）。英國曾經反省過法國大革命的禍害，故此中國爆發法國式的大革命，香港總督特別提防。英國人不會像當年那些中國士人般的無知，選擇性地閱讀歐洲歷史。華夏如要復興，必須撥亂反正，跟香港走，不跟民國的一套。這是我寫香港城邦論、華夏邦聯論的立論。

殖民政府多數是消解當地文化歷史，為何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扶植華夏正統，公費學校歷史教學用的是歐洲史觀，卻不排斥香港學校及民間傳承華夏文化與歷史？殖民政府用政府文言公文、香港電台、大會堂高座中國經典講座之類，培養正統華夏文化，有四大功用：

一、華夏歷史長久，士庶的習氣無法清除，也不宜清除，此舉令英國殖民政府可以輕易代入中國王朝的權威地位，領導香港的士紳。

二、與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共和國府在台灣的新中國文化區隔起來，阻擋國共兩黨在香港的政治宣傳和滲透。

三、令殖民政府取得本地華夏士紳及世家之支持，包括新界士紳及宗族。

四、平衡歐美諸國在香港的地位。有了華夏傳統文化為緩衝，歐美社群及各派教會可以在香港各地生根宣道，而不會與英國文化相對抗。

最精微（refined）的，是下列兩種原因：

一、儒家的華夷之別、夷夏互通之論，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以文化教養為本的帝國天下之論，既不威脅英國統治，也符合英國的帝國思想。

二、華夏文化是下降到民間社會的，不單止上流社會如此。要清洗華夏文化，必須進行社會之全體摧毀及改造（好似中共做到那套！），這不是殖民政府可以承擔得來的管治成本，更不是英國要佔領香港的原意（英國以階級區隔方式統治香港，無意將香港全體華人「皇民化」）。

當年的金文泰總督，大概就是基於上述原因，主張區隔大陸，在香港大學建立中文學院。我現在做的城邦論、邦聯論，是順勢的政治技術，延續殖民時代某些統治策略，轉為華人手上。這叫做解殖歸華。

(二)

粵語的優勢與 第二波中文運動

香港殖民地的官學生不循北方官話（北京話）學中文，卻一貫用廣州話學中文，雖然是香港靠近廣東、英商在廣州有貿易商行之故，但也是由於粵語本身的優勢。

一、漢唐古音：粵語源自中原由秦漢至宋朝遷徙到嶺南的遺民，即使混合當地南粵語言及語音變遷，依然是漢語之中保存最多中古漢語成分的語言。粵語的語音雖然傳自南北朝時代的北朝音，但現今的粵語當然不是古代的唐話，只是粵語的語音變遷多數屬於中古漢語系統之內的系統變遷（*systematic shift*），故此依然平仄分明，語調鏗鏘，讀詩詞與古文，都得其音義合一之美。詩詞固不必論，即使《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存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前句的「衣」與「陽」，後句的「世」與「侯」，其音調升降之落差，粵語遠比普通話為大。明朝歸有光《項脊軒志》一句尋常的「多可喜，亦多可悲」。「喜」之升調與「悲」之降調，也是粵語比普通話遠為明顯。粵語保存漢唐的入聲（*p*、*t*、*k*結尾）與合口音（*m*結尾）。保存古老語彙、古文語法及先秦至漢唐期間創造的成語。例如出自先秦《禮記》的成語「特立獨行」，用粵語讀，音義俱在。

二、音義合一：悲戚孤絕之詞，棘手之物等，保持入聲，如「抑鬱」（yik₁ wat₁）、「哭泣」（huk₁ yup₁）、「獨特」（duk₁ tak₁）、「荆棘」、「寂寞」、「急速」之類，用普通話讀之，竟變成輕鬆愉快、拖沓蹉跎之音。唐朝杜甫的《哀江頭》詩二十三、宋朝岳飛的《滿江紅》詞二十四、李清照《聲聲慢》詞二十五，多用入聲結尾，粵語讀，可得其真。閉合之詞，如「合」、「含」、「飲」，保存合口音。這些語義閉合的詞，用普通話來讀，恰好相反，變成敞開之詞。粵語讀「啜飲」（juet₃ yum₂）、「含蓄」（hum₄ cuk₁）、「升降」、「浮沉」、「上下」等詞，大略保持聲音與事物的對照（當然也有例外）。粵語讀「上下」，是一上一下，普通話讀「上下」，「下」的降調明顯不足。

三、音素豐富：聲母及韻母較多，令同音字較少出現，可以沿用古漢語的單詞結構，不必被逼轉用複詞，保存漢字的本義。如「抑制」／「醫治」、「震驚」／「鎮靜」、「撥火」／「馭火」、「阻燃」／「助燃」、等詞，就由於普通話捨棄入聲和丟普通話讀「上下」，「下」的降調明顯不足。

其詩曰：「少陵野老呑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侍君側……」「哭」、「曲」、「綠」、「色」、「側」，都是入聲。

其詞曰：「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歇」、「烈」、「切」，都是入聲。

其詞曰：「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覓」、「戚」、「息」、「急」、「識」、「積」，都是入聲。

失部分聲母、韻母和聲調，變得這些意思相反的字詞難以分辨，在口語交談的時候難有精細之談。即使數目字，粵語讀「一」至「十」，也由於韻母及聲母豐富，令各個數字分明，普通話難分的「四」、「十」（*si*、*shi*），粵語分得清清楚楚（*sei3*、*sap6*）。另外，粵語之豐富語素，亦方便音譯外語及學習外語。例如英國的「Gatwick飛機場」，粵語譯為「吉域」，音義俱全，普通話語素貧乏，被逼譯為「蓋特威克」。

四、**轉音辨義**：粵語一般用第二聲的音轉，來傳達單詞或轉變意思。例如「碗碟」的「碟」（*dip6*），單詞讀第二聲（*dip2*），不易與其他同音字（「疊」、「牒」……）混淆。「地下」的「下」（*ha6*），讀第六聲的時候是地面之下、地庫。「下」讀第二聲，「地下」（*ha2*）就是地面。

五、**言文分離**：粵語與文言文接近，與白話文有距離。白話文源自北方官話，由於北方有匈奴、蒙古及滿洲族人混雜，阿爾泰語的口語習慣混入漢語，令北方白話漸漸成為胡漢混雜語。阿爾泰語系（*Altaic family*）的元素侵入，令「甚麼」、「那些」、「哪裏」、「是……的」之類的阿爾泰語系元素成為北方白話系統的虛詞。廣東人寫古文得心應手，寫白話格外小心，多加琢磨，從文學閱讀取得文章句法，不敢「我手寫我口」。故此粵人寫的白話文，一般較雅，有明清或民初白話的格局。

六、語氣詞豐富：可以承載豐富的城市人感情與語氣，例如七十年代催人行快些：「行快𠎤啦喂」。例如談論某地幾遠，語氣詞改換及組合，語意就改變，可以連上三個語氣詞，可謂無微不至：「差幾遠吖？差幾遠嘅（ga3）。差幾遠喎。好遠嗰喎！成日講，你好收聲嗰咯噃！喂，係你講開我先至講者（je1），我晨早想收聲嗰咯噃！」

漢語的音義合一，在粵語保存，在普通話丟失。這是保育粵語，用粵語學中文的最大理由。以下略作論述。

漢音唐話，文化集成

民國初年，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甚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甚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甚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二十六](#)

二十六 · 陳存仁《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北宋捨棄燕雲十六州之後，北京（幽州）已是胡人天下。北宋結盟女真攻打契丹，收回燕雲十六州，但女真狡猾，又將漢民北移，北宋收回空城，及後，女真之人南下，駐留幽州。明初，駐守幽州之燕王奪位，是為明成祖，為免王位不穩，便將朝廷自南京遷都北京之時，北京只有女真之人，學習漢文漢語，結結巴巴，便混入阿爾泰語系的發音、詞彙和語法，講一套混合語。女真者，後金也，滿洲也。是故，北京話乃胡化之漢語、胡漢混雜語。所謂胡語，就是阿爾泰語系（Altaic family），與漢語從屬的漢藏語系（Sino-Tibetan family）不同。

胡漢語言混雜，歷時長久。漢末，南匈奴歸附漢朝，與漢人混居和通婚，令漢語混雜，宋元之後，中土受到蒙古人和滿洲人統治，阿爾泰語的口語習慣混入漢語，令北方話漸漸成為胡漢混雜語。例如宋元之後的漢語動詞語綴的「讓」字，來自蒙古語的「er」的語綴。蒙古語的名詞變格附加成分「er」，一般稱為工具格或用格的部分。「er」與「讓」字兩者讀音相近，名詞後綴前移，就變成北方口語的「讓」的用法。^{二十七}

普通話來自明清之交的北京官話，乃女真人及後期的滿洲人學習南京官話之後，簡化語音及增加外族語音而成。簡化語音方面，北京官話丟失了四聲之中的入聲（p、t、k結尾的音）和合口音（曰音），讀舊時文章詩詞，不止味道全失，且是不得要領。增加語音方面，則是引入明顯的翹舌音（即是zh、ch和sh的開

首輔音聲母），有助分辨某些發音類同的字，例如此（*ci*）和遲（*chi*）。總體而言，丢失的聲母和韻母太多，引入的聲母太少，在中文的辨義和音義關聯方面，得不償失。例如引入翹舌音的聲母，北京官話分辨了「此」和「遲」，但廣東話仍是可以用音韻將兩者分辨出來的。只是簡化語音之後，方便外省人和外族人學習，加上官方強力推行，北京官話乃成為中國的交流語。

漢末、晉末、宋末、明末，漢人因為胡人入侵漢土而南遷，避居閩粵，故此閩粵之漢語保有古風。粵語口語絕少來自胡語的語綴（讓、着、甚麼之類），但近年因為普通話南下，學校和官府放任北方口語入文，香港的大官人、文人和那些惺惺作態、用粵語講北方官話的人，講出「讓區議會發揮功能」之類的話來，報紙也不慎登出古文與胡語混雜的文章標題，例如「豈可讓區議會淪陷？」（《明報》，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六日）。既用文言，就不要混雜胡語了。改成「豈可坐視區議會淪陷」或「豈容區議會淪陷」，豈不更好？

廣東的漢人語言之中，粵語係唐話，音調為北朝音（南北朝之北朝）。閩南語，號稱「河洛漢音」，為晉音方言，南朝音。客家話是宋音方言，較後出，音調亦較為簡略，只有六個音調。

二十七 · 據台灣語言學家張華克在《漢語的地位》一文的考證（見《中國邊政》第一五三期，二〇〇一年九月。網上可讀。）

粵語在流傳期間，在宋朝之後增加開首的鼻音（如「我」^{n5go5}的音）、第十聲（高平聲），乃至在近代增加眾多的變調及語助詞。例如有了現代樓房之後，樓（lou4）下與落樓（lou2）、地下（ha2地面、街鋪）及地下（ha5地下室、地庫）的音變。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二十九}，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起義。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二十九}、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語音豐富，文詞簡淨

文書方面，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三十}）。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房子」，粵語口

語只說「眼」、「杯」、「馬」、「石」、「屋」，文書也寫「杯」、「眼」、「馬」、「石」、「屋」，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若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唐話的「衫」也不能寫，要寫「穿衣服」。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甬」，今日也可以入文。

二十八

最早是在秦朝兵馬南下百越地區之時，惟秦朝短促，故此文以漢唐為本。今之壯、僮、僚族等語言，乃至越南、泰國等語，仍有與粵語近似之名詞。

二十九

原本是九個調（九聲），但陰平分裂為二，故此粵語有十聲。粵語之陰平聲，分高降與低降兩種。以前學者認為後者是本調，前者是變調，因此合為一調。但香港的粵語分調頗清楚，故此我以前的語言學老師張日昇教授認為應該是兩個調才對。「箋注」的「箋」（高平）和「煎魚」的「煎」（高降），是不同的調。「方糖」的「方」和「荒唐」的「荒」，是不同的調。例如罵人：「真係荒唐嘅啲！」「荒」字便很高音。「烏頭」、「烏鴉」的「烏」，和怪罪人家「烏龍」的「烏」，也是前者低音，後者高音的。兩者的差別，有時是語氣的差別，「烏鴉」是尋常名稱，罵人「烏龍」，便會提高聲調。這代城市人講求甚麼，不會語調高昂，講話沒火氣，聲調便平板，於是高的聲調消失。

三十

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悉隨尊便」、「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承載古語，雅過普通話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是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三十}。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出來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粵語與漢音相近，傳承古老詞彙，例如成語。成語是由四個漢字組成一個典故，因此很少同義複詞，必須字字的意義獨立，而且個個發音清楚，四字音韻舒暢，才可以組成理路清晰及琅琅上口的成語。例如完璧歸趙、合浦珠還之類，就個個字都是獨立有義的，斷不會浪費文字，「完整」、「歸還」之類的同義複詞，是不會收入成語的。成語的上下對仗是有的，例如「灰飛煙滅」、「水深火熱」、「驚濤駭浪」、「天崩地裂」之類，但都是單字組合，少有複詞組合（「天地崩裂」就不是成語）。故此成語多數是在漢字的讀音和辨義系統仍是豐富精確的年代創造。一旦漢語系統簡化了，弄得同音字太多，例如到了漢音脫落的清朝，獨創的成語便少了（多數是原有成語的變形）。由於成語多數形成於秦漢、唐宋之際，四個字是配合當時的語音而編排的，後世的字音改變了（例如混雜滿洲音的北方官話），讀起來便顯得不順。

粵語由於傳承漢音，故仍可與古成語對應，香港人講成語依然語調鏗鏘，例如用粵語讀：「未雨綢繆」（《詩經》）、「有備無患」（《左傳》）、「擇善固執」（《禮記·中庸》）、「完璧歸趙」（《史記》）、「曲突徙薪」（《五代史平話》）與「防患

三十 · 若用古文，是「微抗爭，何來變？」「微是非、無之意，多用於反問。如「微斯人，吾誰與歸？」改為「不爭，何以變之」也可。當然，杜甫的四言雙句，是《詩經》民謡格式，一目了然，便利呼喊。

未然」（《三俠五義》）之類，琅琅上口，用普通話讀，則詰屈聱牙。看官，試用粵語先讀成於宋朝的「防患未然」（fong⁴ waan⁶ mei⁶ jin⁴），再用普通話讀一次（fanag huān wèi rān），便知道舌頭全不好受，寧可說「在災害發生之前加以防備」了。至於成於漢朝的「擇善固執」，粵語誦讀如流，普通話則有口難言——「擇」（zé）與「則」（zé）同音，「固執」（gu zhí）與「孤寂」（gu jí）之類音近也。這些成語自口中流失了，歷史與品德也隨之消逝。

香港舊時的通用中文

粵語有助學好古文，然而粵語也有助學好白話文。白話文是現代的中文書面語。書面語的意思，是從書本來的，從文學典範來的語文，不是從口頭來的語文。故此，學普通話無助於寫好中文。

香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報紙雜誌的中文，台灣文人都讚賞的。台灣出版家詹宏志在一篇評論「香港書展」的文章裏說（我看「香港書展」，《明報》，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他以前小學國文老師叫他們讀《讀者文摘》，因為文字清通，多看有助作文。後來他學會一種「讀者文摘體」，考試、作文比賽無往不利，投稿參加《國語日報》徵文比賽取得冠軍。他長大之後發現，「讀者文摘體」來自香港，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不是台式的中文，不是大陸的中文，也不是香港那種「三及第」的混雜中文（混合古文、白話和粵語）。

直到八十年代，他對文字有了感覺，聽到散文家思果的演講，才意識到這是一群居住在香港的文字菁英（林太乙、思果等一流的散文家），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創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字——不要有粗話、不要有俗話、不要有地方性，要使得這種中文到處可通，「裏面的白話文是沒有土地的白話文，獨特的飄在空中的語言，這個語言也影響過兩岸三地，它是一群菁英在香港的手工業工廠裏製造出來的，一流的散文家，但現在中文版的《讀者文摘》沒有這個力量。」

香港的公文，因為金文泰總督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提倡的古文教育，遵循王朝風格，區隔香港的文風和思潮，不受到大陸的民國共和革命影響。這是來過香港的大陸人或台灣人都感受到的，例如「行人止步」、「非請勿進，面斥不雅」之類的告示，大陸作家阿城就以為他回到清朝去了。然而香港通行的白話文為何能夠保存一種清通而不染土氣的風格呢？下面是我的推論：

一、當時香港南下難民眾多，報紙雜誌的編輯、作者和讀者，來自大江南北，報紙雜誌的銷路更遠至南洋和美加的僑社，不期然會趨向一種大家可以妥協和理解的通用中文白話。小說的單行本可以有土話，但報紙雜誌是綜合刊物，必須照顧眾多讀者的語文習慣，總不能南腔北調擠在一起。

二、南來香港的文人，以江南和廣東、福建一帶居多，來自京、津之地的少，江浙、閩粵的本地語言與白話文有所距離，故此作家寫作的時候，反而會根據明清的白話傳統，而不會直接採用五四時期的北京白話風格。這就是詹宏志所講的，香港的白話文，「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它的來歷不是當時的、本地的，而是歷史的、華夏的，它來自白話文學的歷史基礎。這才是真正的一「書面語」，根據書本的語言。再者，香港本土的「三及第」文字，已經滿足了香港本土市場需要，南來文人只能另闢蹊徑，寫另一種白話體。

三、白話的創新載體是小說，然而當時香港讀者以城市工人為主，接受能力不高，市場的小說是通俗的武俠小說與愛情小說，照顧男女的讀者需要，大城市寫實的程度不高。武俠小說要用明清的淺白文言，愛情小說要用五四時代甚至晚清的言情小說語言，故此也無法支援香港白話的創新。然而，南北混同之下，也創造了一種帶有古風的香港白話文出來。

這種華夏社會大家都看得懂、大家都不會覺得厚此薄彼的香港白話文，我稱之為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是香港的獨特文體。

中文運動第二波：反共保華

維護正楷漢字，維護廣東話教學，抗拒共黨中文，寫雅正中文，是香港在九七之後，靜悄悄進行的中文運動。說它靜悄悄，是運動支持者少，聲援者更少。在港府強權高壓之下，在香港家長愚昧追捧普通話教學之下，廣東話教中文的香港優良傳統，漸次消逝。公共空間的正楷漢字傳統，也被政府和商業霸權殘害，有人義正詞嚴地捍衛，然而大多數人冷漠麻痺，更有偽左翼及不學無術之狂妄文人，橫加阻撓，認為香港人應該包容公共空間出現簡體字，包容大陸人的文化習慣云云。

中文運動的第一波，是反英抗殖，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三十一}第二波，是反共保華，捍衛中文正統不受共產中國的蠻語及蠻字侵擾。第一波立竿見影，第二波舉步維艱。香港的中文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開始，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四年成功，香港通過《法定語文條例》（香港法律第五章），訂明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在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之前，殖民政府也未踐踏中文，反而鼓吹國學及古文，以此抗衡大陸

運動由市政局議員黃夢花與青年雜誌聯盟、學聯等推動。一九六八年，第一次中文運動，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該年二月份，政府為公文提供中文翻譯。一九七〇年九月，政府成立「中文委員會」。一九七八年，第二次中文運動，爭取中學用中文教學。然而由於爭取的是中文為香港法定語文及教學語文，故可以合併為中文運動第一波。

地區的國族革命思潮。第二波中文運動，在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開始，民間抗爭零星落索，中共既不恢復正體字，也不保護地方語言，港共勾結財閥，撒手不管。香港本土文化尊嚴維護運動更在一眾左翼、民主黨徒的干擾和攻擊之下，蹣跚而行。

第一波中文運動，可以借助粗糙的民族主義，借助中共及台灣的勢力來打擊殖民政府，容易成功。第二波是香港義人用自己的本土力量，用中華文化正統的理念來抗衡中共政權。打得非常辛苦，但也更為值得。因為這才是中華正統之爭，香港本土之爭。第一波的中文運動，可以說是被洋化中文、普通話蠻語、中共殘體字及大學國際化（校園大陸化的代號！）竊據了功效。故此香港有必要發起第二波的中文運動。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在面書列出英文和簡體字^{三十三}，違反香港語文慣例。揭發當日，我在面書放言，假若餐廳不馬上道歉及換上正體中文，我會向法國駐港總領事、法國文化部、歐盟文化專員及歐洲報紙投訴，控訴法國公司^{三十四}在語言弱勢的香港推行共產帝國的殘體字，毒害處於弱勢但秉持中華正統的香港文化。這在歐洲，是無可饒恕的罪惡。只有香港那些包藏禍心的歹毒文人，才認為商店採用殘體字，也是言論自由，值得香港人包容，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香港人抗拒公共空間的殘體字告示，是香港人因為勢力衰退的自卑感引致本土意識過度膨脹的後果。^{三十四}這些鼓吹言論自由的人，竟然認

為在香港公然展示蠻夷殘體字也有自由。在歐美國家，餐牌及商店告示不展示當地法律規定的語文^{三十五}，是犯法的，這不是表達自由或文化寬容的問題，而是當地人的文化權利必須保護，文化尊嚴必須尊重的問題。

事件之中，也有左翼支持商場霸權也享有所謂言論自由^{三十六}，更有評論員認為在公共場所排擠簡體字是文化霸權。^{三十七}香港很多左翼的文化知識貧乏，不分是非，無視簡體字乃共產帝國文化暴政，居然以為簡體字是大陸人自由選擇採用的文字方式。反簡體字的抗議行動剛在組織，agnès b. 在翌日下午登出道歉聲明，並馬上改換餐牌，可見一地的文字慣例，乃文化傳承及身份認同所在，即使香港並無法律明文規定政府機關（司法、行政及議會）以外的公共語文，但這也是不容碰觸的禁忌。

三十三． 在將軍澳商場PopCorn第一期。〈網民Agnes b. Café歧視港人〉，《星島日報》，二〇一一年四月五日。〈「簡體迫害繁體」疾症

三十四． 參閱曾志豪：〈簡體有罪〉，《am730》，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簡體迫害繁體」疾症

三十五． 以法律明文固定（de jure）或依照慣例規定（de facto）。舉例，法國、德國這是歐陸法系的國家，用法律規定；英國、美國這些普通法系的國家，或香港這些普通法系的地區，用慣例規定。

三十六． 梁啟智：〈繁放兩邊自由放中間〉，《明報（星期日副刊）》，二〇一二年四月八日。

三十七． 「就因為這些商舖照顧的顧客，是香港某一批人士痛恨的大陸人嗎？就因為這批人認為簡體字是劣質文化，所以不容許這些符號出現在香港嗎？若是如此，這不是赤裸的文化霸權嗎？誰又有權定義甚麼是劣質文化？香港人絕對有權也應當堅持以繁體字作為香港的官方語言，但我們無權禁止社會人士，使用簡體字。」曾志豪：〈簡體迫害繁體〉妄想症（下），《爽報》，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簡體字（香港近年稱為「殘體字」）損害漢字造字原理、毀壞漢字的義理傳承，語言學界已有公論，我也撰文論之甚詳，毋須重覆。簡體字乃共產帝國霸權強行用法令推行之無理文字系統。中共推行簡體字，破壞漢字傳承，毀爛文化道德，乃千古之大罪。中共國是異國，大陸人是蠻夷，華夏正統在香港。中共在一九四九年開始，在大陸排擠正體漢字、古老語音和古雅中文，毀滅儒道佛的傳統信仰，用簡體字、普通話、現代漢語、現代漢語語法和馬列主義國家哲學，創造了一個新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那個民族國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

為甚麼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原因是我們仍有華夏遺民的文化，我們講粵語漢音，寫正體中文，用古文成語，生活上有自然流露的儒道佛文化風俗。香港的華夏是真的，北面的中國沒有華夏文化，北面那個中國是共產黨假造出來的。語文乃國之大事，香港為了撥亂反正，必須推動第二波中文運動，內容大略如下：

一、規定公共場合採用正體中文。官署門牌須以正體楷書或隸書印刷或書寫。

二、堅持粵語教中文，學校加強古文教育，抵制中共之「現代漢語」，提倡自然流暢、傳承文獻之通用中文。

三、公共語文須典雅端正。

四、公事中文及司法中文，須另立政法學院或政府中文事務部研究，以學理及法理規範之。

(三) 香港的文化格局與王道天下

香港步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戰後驚魂甫定，社會發奮圖強。中環的公共建築之中，有高等法院大樓、香港會與大會堂。高等法院和舊香港會是古典的，大會堂是現代的。古典的是希臘羅馬的古典，現代的是德國包豪斯（Bauhaus）的現代，兩者並列，互相呼應。雖然佈局很細（small in magnitude），但其風格之認真與細緻（true in authenticity），無愧於世界。當年的香港是這樣經營的。懂得美學的政府，才有統治的資格。學習政治，首先要學習美術（fine arts）。美術講究的是傳統、均衡、階級品味、大膽突破、和諧並存、留有餘地，這都是政治家必須懂得的。

一個地方的文化風格，在其世家、士族與民間，上傳下達，互相輝映。香港的世家原本是逃避本國的歐亞混血兒、西亞人、南亞人及華人，在香港尋求發展而遇到英國的庇護，雖有遺民的奇癖與鬱結，日久也可自立門戶。統治香港之士族來自英國殖民地，但香港文人雅士也感染風氣，刻苦自勵，略有所成，形成香港的新儒學、現代主義文學、新水墨、新國樂等。香港民間並無王權或共和政府之干擾，卻得到現代商業制度支援，殖民政府也鼓勵文娛消費，使華人寄情於聲色犬馬，不作高深思考，故令香港的流行文化、娛樂產品殊為發達，比起台灣，香港得流行文化及大眾娛樂之先機，直至九七年，香港的電影、電視劇和部分流行曲，都領先華人世界。

文化可以分為上層的精神文化、中層的精緻藝術和下層的日用藝術，香港的文化，從上、中、下三路而言，有如下風格：

一、精神文化：思想精純而信仰則中西合璧。華夏思想有新儒學，西洋則略有本土基督教神學，寬容而多元化，然而殖民地時代仰賴殖民官員在法理及社會事務上調和與折衷，此等寬容與包涵乃成為今日之普世主義，為禍香港。

二、精緻文化：建樹不少，但缺乏系統支援，後繼無人。嶺南畫派、新水墨、饒宗頤、琴棋書畫、現代藝術有火花，港式中文清通，兼領南北，但傑出之人才不繼，趨於平庸，難以光照長久。

三、日用藝術與流行文化：一度大放異彩，港式餐飲、時裝、家居、影視、粵曲、流行曲、武俠小說、粵文粵語製作昌盛，但人才凋零，精緻素養不足，九七之後無法抗拒北方惡劣影響。

一言以蔽之，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識不足，可以在殖民地時期聚合資源而絕處逢生，殖民地政府解散之後，卻難以自強不息，自然無大氣與視野，缺乏理論整理及歷史傳承。

香港人的民性，難以講清楚，但總也有些風格可尋：

一、思想守舊，順從法律，有私人道德底線，卻無公家道德底線，有正義感但畏縮於行動，每每以道德或文明的理由而不採取行動對抗不公義之事，有仁而無智、也無勇。

二、尊崇片面真理的專業能力，缺乏綜合理性，即是人文科學需要的智力判斷。在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之下，效率奇高，然而英國撤出，香港就陷入反智社會。

三、好舌辯，但邏輯能力和言語描述能力不足。

四、創意在抄襲或融會之下可以爆發，但持久力不足，抽象觀念的能力、述說故事的能力尤其薄弱。香港的喜劇製作見刻薄不見仁愛，悲劇見悲戚而不見關懷。

五、百多年來，香港有一點看家本領，但港人文化自卑，常自甘墮落，崇洋媚外，教子女講好英文、普通話，卻不教子女講好廣東話，寫好漢字。

嶺南不是江南，歸結香港文化，有其硬朗和深沉之美，只是欠缺一點闊大、一點明智，更不應在嚴峻局勢下學台灣日本之甜膩小巧。沉溺台、日之風，就不識大體，不成大器。香港要化固有之硬朗為明朗，化已有的深沉為深厚，令香港文化超越飛機場的效率與茶餐廳的活潑，升堂入室，煉成大器，與鄰邦平起平坐。

李小龍的精神

李小龍是香港的文化象徵，他綜合了上層文化的哲理、中層文化的武藝表演及下層文化的電影娛樂。七十年代，香港工業初興，擴展空間龐大，小本經營蓬勃，謀生門路豐富，社會新舊並存，華洋雜處，國共並立，殖民政府在六七年暴動之後驚魂甫定，謹慎前進，步步為營。李小龍的年代，是香港現代化過程中最剛健的時期。

李小龍是美籍華人，於香港成長，學武博取各家，革新詠春拳，融合北派的腿擊法，兼取跆拳道、巴西柔術和泰拳，以現代力學、運動醫學和營養學輔助練功，用英文傳播中國功夫和道家哲學，收門徒不分國界，在香港出生，在美國鍛煉，復在香港揚揚

名世界，死後歸葬美國。在武者的胸懷裏，有國家，更有天下，李小龍的唐人血統是國家，而武術家的世界就是其天下。在那個年代的電影，依然稱中國為唐山，中國人為唐人，開的是唐餐館，住在唐人街。一個「唐」字，就見天下之寬，沒有兩岸與國共之分，也沒有港英、美國與南洋諸國之分。

王道的天下，霸道的國家

清初，明朝遺民顧炎武的《日知錄》，其中「正始」一條，闡述了「國家」與「天下」的分別：國家是政權建立的領域，國亡了，保衛的責任在君臣和貴族（「肉食者謀之」）；天下則是共同文化價值流佈的區域，文化價值受到侵害，每一個人（「匹夫」）都有責任去捍衛。這是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香港人上街的動力所在。香港除了有一面紅旗之外，還有一個天下。即使滿清入主中原，顧炎武依然認為，「保天下」為先，「保國」還在其次；國家安全不是天經地義，「天下安全」才是天經地義。

以平天下為志的政治，謂之王道，例如周武王的「王天下」。以掃平諸侯，國家一統為志的政治，謂之霸道，例如秦始皇的霸六國。《論語·堯曰》講述周武王的王道，說武王恢復被滅亡的國家，封黃帝之後於薊、堯之後於祝、舜之後於陳、禹之後於杞，又提拔隱逸的賢人，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武王滅殷（商朝）之後，為示不絕殷的祭祀，於是封武庚於殷，以安撫殷的遺民。秦始皇的做法相反，他滅了六國之後，毀其宗廟，誅其後裔，並焚燒史書，禁止傳授六國的國史。所謂王道，就是樹立自己的文明，但是包容歷史的遺留物，亦包容異己，有了歷史和異己做坐標，就知道自己是否有進步，人民也可自由選擇是否跟隨自己，萬一自己走錯了路，人民也有個退處，不會釀成大錯。所謂霸道，就是以自己的文明為宗，貶抑前朝，滅絕異己，不容別人比較。

我在德國哥廷根大學讀民俗學，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的民俗建國運動（Nation building through folklore studies）與五四時代的民謠收集與民俗學研究，當時的文人在民間文化裏面找尋國族的底氣，類似 *mythos*（神話）的東西，來建構中國現代民族，這是德國和北歐國家走的民族建國之路。一九一八年，顧頡剛、容庚、周作人等學者，在北京大學登報紙向民間徵集歌謠，師生從北京放假回鄉的時候，從事歲時風俗和民間傳說研究，認為可以收集到一些地道的中國東西，可以用來建構中國民族的東西（當然他們出自純學術的興趣，也有文學的興趣）。收集和研究的結果，發現孟姜女故事來自《左傳》，很多歌謠來自《詩經》、漢樂府詩的俗化、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諺諧或猥亵版本。研究的結果令他們驚訝起來，原來中國的民間文化是這樣子的，是周王朝、漢王朝文化的俗化本。當然，另外也有一些泛東亞的民間故事（如老虎外婆故事、灰姑娘故事）。

華夏本來就是以雅文化流播而成的天下，而不是一個以土俗文化（vernacular culture）提升為民族精神的國家。華夏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華夏是帝國。後來，日本侵略中國，中國的民俗學研究中斷了。另一邊，共產黨偽造民間文化，改編秧歌舞、陝北民歌（變成《東方紅》）、白毛仙子（《白毛女》革命芭蕾舞的原型）等民間文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間風俗，唱紅歌、跳紅舞、演紅劇，試圖創造一個新中國，一個假造的中國。

香港的王道天下

在八十年代之前，我說香港是華夏正統，無人質疑。在今日，好多人質疑，也有人不明所以。在英國決定移交香港給中共之後，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至今，發生好多事情，令香港好多人變得懷疑華夏文化這回事。有人認為可以擁抱普世文明、個人自由就可以，有人認為香港是廣東邊陲，歷代受到朝廷壓迫，毋須自居華夏，自討苦吃，故此香港要應該尋找的，是百越古族的根源。這兩個觀點，分而論之：

一、認為擁抱普世文明、個人自由就夠，那種是民主派的離地中產論，是親美的論點，是美國殖民主義。香港人走這條路，是成為等待美加收留的孤魂野鬼。

(四)

香港流行文化之 興衰及教訓

三十八

二、認為香港不應招惹華夏中原的，是台獨派的蠻族論。廣東的根源一部分在百越，然而漢化之後，是華夏一支，並保存漢唐古風，百越根源變成文化殘餘，在部分風俗及語言之內。華夏是以血統論，而是以教化及修養論的，即使廣東有百越混雜，也是華夏，北方胡化、蠻夷化之後，香港就是華夏正統。這不是甚麼負累。以華夏正統而言，天下不是國家，香港毋須同大陸統一為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城邦自治，與大陸結成邦聯。這就避免了孫中山的單一民族的建國災難，將廣東陪葬到中華民國裏面去。

往日香港的文化發展是循高雅向下輸送、向下降低的方法，形成香港蓬勃的流行文化及中產社會。今後一段時間，要反其道而行之，用民間文化向上尋求、向上提升的方法，重新鞏固高雅文化及建立知識貴族，即是現代士族階層。

雅是雅，俗是俗，精緻文化與普及文化，在近代社會各有等級依歸，本無交會。高下文化在香港的交會，是因緣際會，時代錯亂，以致龍飛鳳舞，勝景紛陳，可惜因緣一去，妙境不再。

現代中國，雅俗分隔

天下為公。天下有德者居之，不論血脈；隋唐開科取士之後，官位亦不限門閥，是故雅俗之區隔，不如古時歐洲之大。草莽封侯，布衣卿相，貧富階級自由流動，文化品味更是雅俗共賞。雅如孔子，輯民謠為《詩經》，多識鳥獸蟲魚之名；儒如紀昀（曉嵐），寫《閱微草堂筆記》，不避博物搜奇之癖。周天子巡狩天下，命「大師」收集當地民歌以觀民風之厚薄；漢有樂府收集民謠供宮中雅唱；慈禧太后宣詔四大徽班進京，提挈地方戲為大雅京劇。然而近代中國被迫現代化，產業分工，城鄉分野，階級分歧，大眾傳播媒介之興起，引致雅俗品味之區隔，惟初始時期仍有雅緻與通俗之匯流，過後則分道揚鑣矣。此中西異同，不可並論，研究香港普及文化者，不可不察也。

落難他鄉，混跡江湖

香港上世紀近三十年之通俗文運，自五十年代始，至九十年代止，往後創作人才離港他去，或辭世訣別，一一凋謝之後，即難以繼續。

三十八· 本節改寫自《金風玉露——雅俗交會與香港普及文化之興起》，《信報》文化版，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〇〇五年一月六日，收入《五星級香港——文化狂熱與民俗心靈》，香港：花千樹，二〇〇五年，頁二十三至三十六。

遙想當年，赤帝揚鞭，中原蒙難，士子文人南遷避秦，卻被阻隔於殖民政府而不能出仕，不得已販文謀生，落草下海，將心意流注於通俗文藝，俗民亦因工業初興，囊有餘錢，消費遊樂，加上新興媒體如報紙、電台、免費廣播電視、電影、流行歌壇與唱片初登市場，亟待填充內容，第一代之文化企業家（如報人、製片人）又多是文人出身，惺惺相惜，相濡以沫，不如今日之汲汲牟利，鄙薄文人，觀眾仰望明星，仍未變成今日講究所謂消費者權利、酷愛打聽藝人醜聞之「刁民」。廣告客戶選擇不多，仍未以大老闆之威勢指點創作。受美國、台灣資助之媒體（如美國新聞處資助之媒體及香港之國民黨報），亦開放言路，於是落難香港之文人，如魚得水，可以在通俗創作之中，面向大眾，寄舊中國之感情，開新时代之氣魄。於是文人之舊學新思，可以在新市場、新媒體自由發表，而香港環境法治，創作又獲得穩定酬勞，文心大悅，是故通俗文運，波瀾壯闊焉。

今日中原平靜，雅士安居，不復南來，即使南來，第二代之共產文人亦無復當年民初文人之勇猛多姿。香港之土產文人，又多被制度磨蝕，棱角無存，無力貢獻，報章與各種聲光媒體繁衍不盡，民眾目不暇給，後工業時代香港工人生活又不再穩定，職位來去匆匆，朝不保夕，鄰里親族亦不多聚首，無暇談論俗文俗曲、電視電影，各人化為原子化（atomized）之個體，各自區隔之「分眾」興起，「大眾」瀕臨消亡，香港又豈再有大眾娛樂、普及文化？

所羅門王曰：「日光之下，無新事焉。」（《傳道書》第一章）
證諸中國元明清三朝之通俗文學作者，如關漢卿、湯顯祖、金聖嘆、
馮夢龍、施耐庵、蘭陵笑笑生、蒲松齡之類，皆為遭逢亂世之處士
(不仕之書生)，又或仕途不得意，而混跡江湖，與村夫野老、市井
優伶之流為伍，於是寄託孤憤幽情於詞曲小說。有幸當時江南富庶，
文教普及，刻書賣文大盛，歌台舞榭林立，商販小民讀書識字，於是
書肆歌榭，門庭若市。此等通俗文學家，其創作一般不出二途，一
為變舊文為新書，化舊聞為新事（如馮夢龍改寫《左傳》史事為小說
說）；一為賦俗文以雅意，化腐朽為神奇（如金聖嘆之點評《水滸
傳》），皆卓然有所成就。歐洲俗文學之興起亦然。浪漫主義時期民
謠與俗譚之興盛，農民節日衣裝與家具之艷麗，據德國民俗學家漢
斯·老曼（Hans Naumann，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五一年）考證，此乃
前朝貴族文士風物，流落鄉野所傳，農民代代模仿創作，日後竟誤認
「民間事物」，以為勞動人民善於創造。老曼稱此跨越階級、隔世遺
傳之現象，為「下降之文化財」^{三十九}（gesunkenes Kulturgut）。

酒與瓶：普及文化之三期發展

東西陣營冷戰時期，香港乃華人世界唯一自由城市，港英的
自由港政策和盡量不干預的文化政策，發揮了網羅人才的「文化

^{三十九} 見其Grundzüge der deutschen Volkskunde 《德國民俗學概要》，一九二二年萊比錫出版，第
五頁。

避難所」的作用，大陸、南洋甚至台灣各地不堪政治迫害、排華政策或經濟蕭條影響的華裔文化人，都可以來香港避難和謀生，由國學大師（如錢穆）到諧劇演員（如梁醒波）都有，令香港的人才庫存一時間豐富起來。中西哲學新思潮、西洋文學與藝術衝擊，並透過人才與意念與發表媒體的交流，逐步擴散到普及文化領域之內，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普及文化，既有形式，亦有內涵。這段時期，從新儒學到普及文化，香港都有傳世之作，尤其是普及文化，可謂得風氣之先，一時領導華人世界。

此三十年，可以粗分為五六十年代之「新瓶舊酒」期，七十年代之「新瓶新酒」期，八十年代之後的「新瓶假酒」期。新瓶舊酒，是以新的大眾媒體負載舊時文人情懷。新瓶新酒，是七十年代，作品的本地情懷成熟，在大眾媒體出現。新瓶假酒，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大眾媒體進入文化工業制度生產時代，遇上消費大盛、九七危機、劫掠式牟利以便移民、明星身價暴漲、黑社會介入、翻版流行等矛盾因素糾纏，產業制度非但不能提升到企業化水平，反而呈現劣質化、江湖化，自我複製，唯利是圖，互相踐踏，同室操戈，是為「新瓶假酒」期。

新瓶舊酒，大行其道

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普及文化，是自由文人遇上了新興大眾媒體，載體無疑轉變了，但由於戰後民眾飢渴娛樂，只消將舊日精

緻文化內容稍為淺白化，即可採用。諸如夜總會之國語流行曲歌星，不論來自上海者或來自台灣，都是民初文人舊情，傷春悲秋，歡場男女，靡靡之音，如《綠島小夜曲》、《不了情》、《今天不回家》、《路邊的夜花不要採》之類。當時的報紙連載小說，基本與書本小說無異。專欄文章亦如書籍小品文。漫畫之《封神榜》、《水滸傳》，或錢塘江的民間傳奇漫畫，用的是傳統繡像小說的筆法，略作散漫而已。《財叔》的抗日故事，傳遞的是民初中國的感情；王澤的《老夫子》，人物衣裝新舊夾雜，但傳遞的也是舊時的道德倫理和美學品味，偶有都市打工仔的狂放不羈與妙想天開。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大眾報紙連載，文字較淺白，情節也不如現實小說複雜。電台之廣播劇，來自經典西洋小說或戲劇者，如學校之課外讀本（《基度山恩仇記》之類），又如話劇之舞台錄音。李我、蕭湘之電台講古（當年謂之「天空小說」），也如舊時說書，加入現代電台話劇技巧（一人扮演多種角色）及都市生活情節；宋郁文、何雅如在廣播電台之正音辨字、講論《三國》，用語之古雅，如課堂講授。粵語小調亦如昔日省城茶樓所唱，只是改為空中廣播而已。電視、電影也多搬演古典文學和五四新文學作品，如將《三言二拍》的民間傳奇改編電視劇，改編巴金、魯迅小說為電影等。南來文人李翰祥之黃梅調戲（如《江山美人》）與《倩女幽魂》等奇譚，是舊曲與舊事之新演。省城武生關德興的《黃飛鴻》電影系列，亦是民初省城風致，舊日豪俠的門派恩怨（嶺南派與外江佬之爭）與家國情懷（抗清、抗日），缺少香港的時代痕跡，武藝雖然逼真，硬橋

硬馬，開一代風氣，但亦是因循舊派架式，無衝頭實戰風格。雅緻如唐滌生之粵劇編曲，足以提挈粵曲藝術，但傳遞的也是忠孝節義、兒女私情，並無新意，然而觀眾比戲棚時代擴闊了，搬上電影之後，更是普及大眾。當然，一般的粵劇戲班仍然在戲棚演戲，或者進駐新興的遊樂場——如荔園，在新場所演出舊戲碼。此等物事，多可當作「下降之文化財」視之。然而，正因為其內容與情懷之舊，可以跨越政治與地域，遠銷台灣、南洋，以至海外華埠。

此階段之雅緻文化與普及文化之相遇，來自難民社會之階級混和與消費媒體之初興，雅緻文化下降民間，稍作遷就，但並無產生新的庶民精神與時代氣息，本地文化認同亦不足，所謂「新瓶舊酒」是也。即使是社會現實，創作人的生活接觸也很有限，除了追求自由戀愛的工廠妹和貧民區板間房的互助生活是香港寫實之外，上流社會都是想像的，從舊記憶改裝或者從書本電影改編的。如電影中的富人家，都有一個敗家子或恨嫁的女兒，大廳都是一條迴旋樓梯，男主人西裝筆挺，從樓梯從容走下，向客人宣佈「小女今日訂婚」或「沒事發生，請繼續跳舞」之類的套式話。這些富人排場都是民初上海的餘緒，多於香港本土風物。然而，戰後初嘗和平的民眾飢渴娛樂，文化商品市場方興未艾，物质生活仍然貧乏的市民亦熱愛以明星來投射生活想像，於是普及文化形勢大好。

此中，中共資助的電影公司和南來文人，也因對抗國府在香港之國語片和其他國語流行文化的宣傳，也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在香港推廣粵語電影製作，推出支援本土粵語文化和社會現實主義的作品。中資電影公司的社會現實主義粵語片和吳楚帆飾演低下層小市民的經典粵語對白——「食碗面，反碗底」、「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出於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成了香港庶民的心聲，撐起了一個時代的香港底層文化精神。[四十](#)

踏入七十年代，不論是少年時期從大陸來港或本地難民第二代亦進入青年期，香港土生一代進入青年時期，本地創作人和受眾都已成型。特別是本地創作人已接受相當程度的現代教育，如在香港大學畢業的許冠傑和黃霑、遊學歸來的徐克、許鞍華等人，具備同化和改造外來普及文化（如流行音樂和電影）的能力，而當時的外國普及文化，亦進入大盛時期，可為本地創作提供源源不絕的示範作用和抄襲藍本。本地的普及文化中介人社群（cultural intermediaries）亦已成型，電影雜誌、報紙電視影評、電台DJ、流行文化雜誌等蓬勃發展，品評創作，影響本地受眾欣賞選擇，鼓動潮流。當時工商業興旺，全民就業，年青的工人階級消費力旺盛，社會自信心大長，這些都是本地粵語創作的普及文化「成行成市」、蔚為大觀的根基。

[四十](#) 參閱拙文「中聯影業的寫實主義與官方編造的『香港精神』」，載《我為人人——中聯的時代印記》，香港電影資料館，二〇一一年，頁一五六至一六三。

此時普及文化的生產人才、銷售媒體、企業家、消費者、評論人的網絡已經配置妥當，列陣以待（alignment），回應消費市場。例如無綫電視劇，有邵逸夫的投資、金庸原著、蕭笙編劇、顧家輝作曲、黃霑填詞、羅文主唱、鄭少秋主演及TVB雜誌推銷，煙酒廣告充斥，堪稱「一條龍」生產。電視台的救災義演和周年慈善籌款（如《歡樂滿東華》），更將普及文化表演與民間疾苦緊密連接。

此時普及文化亦頗有時代精神，如黃霑《問我》（「講一聲，我係我」）、《明星》（「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會想起我」）之個人主義；李小龍功夫片雖有時是民初背景（如《精武門》），但有強烈的自我意識，武藝更是新派香港街頭實戰技擊。《猛龍過江》之中，苗可秀帶李小龍參觀羅馬古蹟，李小龍自豪地說：「咁嘅爛屋，九龍城大把！」許冠傑的《鐵塔凌雲》，首次唱出香港人以香港為故鄉的還鄉情懷。然而，新事物只是以添加的形式出現，舊日文人情懷依然健在，大眾仍舊接受，可謂新舊夾雜。如流行當時的許冠傑歌曲，人生如夢、世事如棋、認命不爭的勸世歌，恍如隔世；《半斤八兩》、《賣身契》之類的諷世電影和主題曲，意識可謂陳腐如昔；《莫大毛》、《尖沙嘴Suzie》，也不出嶺南舊式鬼馬。黃霑歌詞意境新鮮但也為武俠劇寫下「萬水千山縱橫」、「飲下霜杯雪盞」之舊詞。

電影方面，南來文人李翰祥的風月片（《金瓶梅》系列）、騙術片、宮闈片，繼續以詩酒情懷，鉤沉舊事，但寫實風格和個人史觀愈見強烈。成龍《警察故事》系列，正式以警察身份肯定港英的法治秩序，歌頌現代香港的專業操守。徐克的《倩女幽魂》系列（改編自《聊齋誌異》之「聶小倩」，李翰祥一九五九年曾搬上螢幕），有現代人之善惡疑惑與愛情浪漫。吳宇森的《英雄本色》系列，承繼龍剛的社會寫實主義（一九六七年龍剛《英雄本色》），有香港當年英雄落難的寫照。

失運一條蟲

八十年代後期，本地廠商北上投資之後，香港經濟向商業服務和金融轉型，地產投機帶動的泡沫經濟產生強大的財富增值效應，連帶工人薪水拾級而上，民眾消費力空前強勁，中國內地市場又忽然擴大，使到香港流行文化產品大發利市。本來這是香港流行文化進一步企業化的時機，將融資、僱傭、訓練、製作服務、市場拓展等制度化，向規模經濟進發，然而九七危機正式呈現，尤其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移民之風大盛，社會彌漫短期劫掠式、恐慌式的牟利方式，部分創作人不思進取，抄襲成風。闡出成績的作品馬上趕拍系列「添食」，一蟹不如一蟹，耗盡創作人的創意，也淘盡消費者的慾望，這些類型製作和系列產品更令明星的身價炒貴而暴漲，令製作人籌措的資金無法令整個製作隊伍得益，難以提升企業化的水平。娛樂事業牟利容易，甚至一度

引致黑社會介入電影行業。產業制度非但不能提升到國際級的企業化水平，反而呈現劣質化、江湖化，自我複製，唯利是圖，一些從業人員互相踐踏，自爆內幕，互揭瘡疤，為娛樂雜誌提供醜聞，令往日的明星風采盡失，是為「新瓶假酒」期。

其他媒體亦進入初步的文化工業制度生產時代，例如文人報紙被商人收購，改為商人辦報、集團式經營。大眾已經成型，被精密的市場知識和廣告客戶盤算和操弄，以便牟財。國際大勢方面，外國的流行文化也衰落，明星風範日少。

人才網絡方面，八十年代中期之後，藝術資助發達，高等院校擴張，港英政府開始大手筆資助精緻文化和擴張高等院校，企圖供養某些精緻藝術人員和文人雅士，在不當的干預之下，精緻文化人得到官費資助，不必放下身段，與民俗同流，雅與俗重新區隔起來，香港的普及文化企業便失去了往日大量人才創意的交流滋養，出現抄襲和鄙俗之風。八十年代起，香港本地人在公費資助的文化及學術機構建立制度壁壘，文人辦學逐漸轉為工程人員辦學，昔日之文人校長轉為今日之工程師校長，開始用專業資格和效率評估等方法，獎勵平庸的合模者（conformists），妨礙不願意屈從的才學之士（包括外來人）參與。

繼往開來，東山再起

普及文化之衰落，八十年代末期已見，九七之後，香港金融危機，工廠和後勤商業服務進一步北上，全球化的生產模式正式危及本地基層工人的生計，香港經濟轉型困難，民眾失業、低薪就業和就業不穩定之風愈演愈烈。普及文化的風流人物離港或辭世之後，後繼無人。蘇聯集團瓦解之後，冷戰局勢緩和，香港不再是唯一的華人自由城市，流亡人才匯聚之地已成過去。此外，先有CD和VCD等激光灌錄製作技術普及令翻版流行，後有網絡免費轉載或傳送，打擊娛樂事業收入，更擴大了家居娛樂（home entertainment）¹、流動娛樂（mobile entertainment）的選擇，改變了集體在場消費的模式。資訊科技革新支援的媒體——互聯網，令娛樂多元化，選擇也擴大。普及娛樂的模式趨向私人化、不定時化、家居化和隱私化，大眾文化賴以成型的集體定時在場消費的模式（如一同上電影院、出席演唱會、在家或在士多舖、茶餐廳定時追看電視劇集）受到衝擊。

這種集體定時在場消費的模式同時也是普及文化最有效的收費模式，這種模式的消亡，直接影響娛樂事業的資金周轉。民眾方面，共同經驗（shared experience）和共同話題愈來愈少，各人化為原子化之個體，各自區隔之「分眾」興起，動搖了普及文化的根本基。

(五)

復興香港文化產業， 提升庶民品味

「點解香港搞成咁？」為何香港淪落到此？不是因為共產黨暴政，而是因為香港欠缺精神貴族的承擔及指引，中產階級沒了公共道德，卻假扮貴族去紓尊降貴，關懷弱勢大陸人，乃至為一隻受傷的小貓奔走呼告，卻不會捍衛香港本土利益，政黨不承擔香港大局，專門以道德立場欺詐選票，民眾感到迷惘和無助，任由地產財閥瘋狂剝削、大陸人搶奪本土資源。

感性上，香港人要重新用故事、用影像認識香港、懷抱香港，視香港為家園，捍衛我們的生存空間、發展空間。生存空間就是居所、街道、郊野、水土，發展空間就是學位、職位、升遷。為了重振香港精神，我們需要復興文化創意產業和大眾娛樂事業，建立中等文化（middle-brow culture）的承載體及消費群，用民間文化向上尋求、向上提升的方法，鞏固高雅文化及建立知識貴族，將香港社會階層上下貫通。現代社會由於城市化及教育專業化的關係，村社及宗族不能傳遞知識，父輩及上層權貴的知識及文化品味難以下降，故此香港雖然一時文化興盛，但依然落入文化上下脫離的民初中國的局面，終至於分離崩析。民初中國就是落入士人與庶民無關的社會，城鄉差異巨大，令共產中國可以鼓動庶民，批鬥文人及資本家，令舉國陷入野蠻。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興起一句話，例如談及社會正義的時候，我的同學說「你講的東西太深奧，我聽不明白。」這種話，我從未在勞動階層的口中聽過，後來都是在中產階級口中聽來的。這種反智主義，這種冷漠和反智的話語方式，是八十年代興起的，當時的香港經濟起飛而中港貿易開始興旺，好多讀技術的人，拿了個高級文憑便離開工業學校或理工學院，下海經商而僥倖成功，之後目空一切，認為知識無用，讀書無用，不去深刻思考問題。

傳播這種話語方式的，是香港的諧趣電影。當年港人有英國照住，有大量優秀中產，社會有正氣，電影可以踐踏主流，戲謔一番也無妨。但九七後情況改變了。你踐踏主流，主流就會崩塌，香港防衛真空。

亞里士多德曰，事物不能進入感性，則不能進入理性。以香港歷史觀之，香港本土意識之形成，由民眾先行，由大眾傳媒先行，南來之士人反而抱持華夏文化天下思想（反共的文人）或中國一統思想（親共的文化人以及香港的民主派政黨政團）。香港的本土意識，在一九六六年反天星小輪加價抗爭之中形成，於一九六七年土共暴動之後壯大，成為拒中共以自保的意識，香港的電視和電影在建立本土意識、文化品味、大陸人形象方面，居功至偉。香港電台宣教及宣政作用及華夏文化傳播，也令英殖政府的社會建構（social engineering）工作順利完成。
四十一

四十一 參閱筆者撰寫之《一起廣播的日子——香港電台八十年史》，香港：明窗，二〇〇九年。

香港流行文化的聚落與根基

二十世紀中葉至今，產業群集理論成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地理學家討論的焦點。波特（M.E.Porter）的「產業集群」理論如下：產業集群是指在特定領域中，一群在某地域集合，相互關聯的企業或專業的供應者，以及相關的機構（如大學、研究所、大生產商、制定行業標準的機構、行業協會等），由生產者、中介人和消費者通過增值鏈相互聯繫而形成的網絡。在一個地理領域，整個行業的上下游企業都包括在內，這樣便能加快學習和創新的過程，並且締結信用和情誼，降低交易成本，分散風險，取得協同效益（synergy）。

產業需要群集，文化更需要群集。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難民逃難來港，為香港帶來新的文化群集，與戰前的香港形成對比。鄰里群居、文人聚集，加上英國殖民政府和台灣、美國乃至中共勢力的扶持，交雜之間，拼發出香港的文化光芒。這些群集，華人群體之中，可以明顯見到的是：

一、學海書樓及大會堂高座演講廳的一群滿清遺民與親英美中產的中西結合群體。

二、深水埗、石硶尾、鑽石山一帶木屋區聚集的民國文人和他們在深水埗新亞書院、其他私人書院及民辦小學的聚落。

三、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美國新聞處用資金支撐起來的《讀者文摘》、《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及友聯出版社的中西交融的前進文化的群集。

四、中共駐港系統（土共）用工會、國營企業、識字班、勞工子弟學校、愛國學校、影業公司、出版社等支撐起來的一個現實主義批判與粗糙華夏文化與民間俠義道德結合起來的群集。

香港以前威力最大的文化聚落，是九龍塘廣播道的電視台和電台聚落，那是商業與政府的傑作。

廣播道的「五台山」的創意聚落

電視是民眾的文化表達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mass*)，是香港文化的巨大傳播力量。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香港的電視劇集將本地故事、本土觀點用文學手法顯示出來，形成社會議程 (social agenda)，令香港社會有主流共識，也令周邊粵語甚至華語社會（包括華南省份）以香港觀點、香港品味為中心，形成香港文化的軟實力。綜合藝術節目（如《歡樂今宵》、歌唱比賽、中文流行曲大獎等）和電視藝員訓練班，令香港的人才有上升機會，產生本地文化英雄 (local culture hero)，這些通俗的文化英雄，由許冠傑、周潤發到蔡瀾、曾近榮和梁文韜（食家），都是香港文化的代言。人。香港雖然是城邦，但在流行文化，卻是一個向外擴張的帝國。

七十年代的廣播道，是五台山，集合了公營的香港電台、商營的商業電台、無線電視台、麗的電視、佳藝電視，另有教育署的教育電視部，在官商合作之下，用十幾年的時間累積出香港文化的創意區（creative quarters）。在七八十年代，香港電視以香港電台電視部和浸會學院傳理系為科技與創意的孵化器（incubator），佳藝電視與麗的電視是勇闖者（pioneer），無線電視是將創意商業化的鞏固者（consolidator），外加無線老闆邵逸夫另一條電影業的連線，用長尾巴（long tail）的商業市場拓展策略，容納李翰祥、岳楓、胡金銓、張徹、吳思遠等異類風格，血腥、艷情、唯美俱全，令他們得到嘗試，漸次成熟，使香港流行文化出現多元並茂的氣象。好多藝人和影視業人住在廣播道或太子道一帶，窮的臨時演員或後台人員住在附近的公共屋邨及木屋區，形成居住社群，鄰近的鑽石山、大磡村和也是土炮影業製作區。這些文人雅士，廁身與擠逼環境，日夜與鄰居切磋，三山五岳，三教九流都混熟，逼於生活貧困或朋友所請，有多產多做的本領，頗多成為「通天曉」。例如倪匡、李翰祥等，都是這樣鍛煉出來。舉報紙專欄名家石人為例，他可以一日寫十二篇，日產萬字，可謂無所不能，小說、散文、雜文、社論、鹹濕笑話、性知識、拆字解疑、宮闈故事，粵語溯源，樣樣皆通。即使後來從事電視業的吳昊、劉天賜等，都繼承通天曉的本領。

邵氏影業是來自新加坡的華商家庭，在南洋闖市場有本土優勢，當然也遇到地域及方言族群的壁壘障礙，但邵逸夫用收購電影院和遊樂場，並且建立自己的片場制度來源源供應，這些南洋

地域分割的小市場，令到香港電影和電視劇得到鍛煉而成熟，適應各地市場口味。然而在九十年代之後，進入大陸市場，政治障礙大，藝術障礙小，香港電影人只需要向中共跪地，便可享有國營企業壟斷的中國大市場。中國市場，令香港流行文化墮落！

由無綫和亞視在九十年代部署全然搬出廣播道、不在廣播道或市區留有基地開始，中共勾結商人，拆解香港電視業、破壞香港文化傳播的計劃已經開始。

香港的武俠文化產品緣何而來？

香港庶民以前喜歡的武俠電影和電視是怎來的？關德興、李小龍、成龍等等，背後要有無數的功夫演員、武術指導、龍虎武師和一大批學武功的觀眾。五六十年代，舊樓天台有無數民辦的小學，深水埗及鑽石山一帶的山邊木屋區，住了不少逃難香港的中國文人乃至軍長、法官、軍閥幕僚、拳師教頭，在窮苦之中憂國憂民、切磋思想，乃至談文論藝、比劃拳腳。有江湖、有武藝、有俠氣，這就是香港功夫電影的「下盤功夫」。新浪潮電影的徐克等人可以跑得出來，是因為當年我們都熱烈追求新思潮、接受新的藝術實驗，還記得七十年代的求學青年都追讀存在主義的中文入門書籍？昔日，連報紙雜誌都有講哲學思潮的，給市民精神涵養。當年的生活艱苦極了，社會也黑暗，但沒有阻止青年嚮往藝術，追求真理。

這是香港過去輝煌文化的群眾基礎和精神涵養。香港要有流行文化及創意工業，重要的是下盤的文化根基和深層的精神價值，而不是表面的商業花巧。

到了二十一世紀，香港的功夫電影走下坡，流行曲式微，都是下盤不穩之故，現在還有多少人在武館學藝？有多少青年人夠本領做武打明星？有多少人熱愛彈奏樂器、唱歌和作曲？有多少人讀文學書籍，懂得完整地講述事情，探討哲理？社會熱衷買賣，大者做deal，小者炒股，還有多少人肯花時間，老實鑽研一門技藝，從中體會哲理和樂趣？

文化靠的是精神的盈餘與分享，而不是靠精密的商業計算。文化產品和創意美藝，不是賣弄花俏，而是有實在的精神價值。香港過去的武俠片，就有俠義精神和人間正氣，那是大家都不會拿來開玩笑的。正如荷里活的電影，承載的是美國人的人道主義。北歐的設計產品，不是玩簡約主義，而是宣揚歐洲啟蒙時代的階級平等，光明、環保的居住空間與健康愉快的家庭生活。日本在香港的家品店，也是宣揚禪宗的明淨修養，令人體會樸素材料的內在精神，這才叫做文化創意。有藝術外表，更有精神意義。

香港要振興創意工業，先要在文化方面做起，好好繼承我們的文化人物，評論我們的作品，論述我們的歷史文化，保護僅存的城市舊區和自然生態，最重要的是，探討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發

揚人間正氣。適當的自我嘲笑和幽默是可以的，但不可否定自己的意義。香港是一個偉大的城市，有一百七十多年的現代歷史，文化老本多的是，要整理、論述和再創造，要發起青年人去繼承上一代的精神。

一個嘲笑俠義正氣、忽視哲學思考和拒絕討論意義的社會，就難有文化，也產生不了甚麼創意產品來。回想起我和童年玩伴看粵語長片的年代，大家住在元朗，家裏窮極了，前途更是沒有保障，不過，卻逛書局、看雜誌，遊山玩水，長篇大論探討問題。到大家半退休了，都覺得看電影，逛街和徹夜閒聊，是人生最美妙的事情。我在一九八二年讀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美國老師對我們說，他鄰居有個水喉匠，終日勞碌，周末就一群人玩手風琴、唱民歌，他說：「辛勞賺錢，不就是為了這個？」他說的很有道理。

香港文化復興計劃

要促進香港文化保存及發展，將來香港自治之後，可以做以下工作。即使不能獲得港府支援，民間也可以做到若干程度：

- 一、促進文化藝術群集形成。
- 二、寫作歷史細節及記錄人物故事。

三、回到古典文化及深思熟慮。

四、輔助文化融資及提倡捐獻。

文化人之間的群集，是最重要的。旺角的二樓書店區、工廠大廈的左翼青年、民間網台、藝術工作坊及地下音樂，這些都是近年形成的群集，但都被大陸遊客氾濫、大陸游資湧入香港引致的地價高漲而中斷了發展。以工廠大廈為例，九十年代初至今，十幾年之間，藝術工作者艱苦經營，自發在各工業區形成了作坊群落(*workshop clusters*)，例如以視覺藝術為主的火炭、以音樂和電影為主的觀塘、以劇場及表演藝術為主的新蒲崗、集時裝與音樂設備於一身的長沙灣等。創意作坊群落在工廈生存，不只是香港的現象，也是發達城市的普遍現象，有助舊區重生和豐富城市文化生活，更有助創意業界的自治和形成產業同盟，政府有遠見的話，也須考慮以其他方式協助。私人也可出資或捐助發展。

促進及維護創業群落

創意作坊群落不大會在政府委託管理的所謂「創意藝術中心」存活，而在「三不管」的工廠大廈或閒置產業存活，有其獨特的文化生態原因。要形成創意作坊群落，需要人緣的磨合，需要在自治同盟和業務關照的過程之中，逐漸形成信任與互助，這大抵有一群「支柱」(*anchor*)，但周邊的成員隨時加入，隨時退出。

這些非正式的業務關聯和同業聯誼，需要容忍若干混亂與「脫法」行為（我想說的是輕微犯法），以及各種非正式的工作關係和友誼，如漫無目的之觀摩和閒聊，是不可能在官方的正規管理下形成的，這是石破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經營失敗的主因。政府貿貿然以促進創意產業之名來放寬工廈的物業使用權，既不理解創意業界的困難，也不理解創意群落的形成模式，當然，業界的抗議，只吸引零星的報道。創意工業和文化生態等知識，雖然在先進城市是潮流寵兒，但畢竟屬於專門學問，政府部門不願意求取業界意見或缺乏研究支援，便會犯錯，而且錯得離譖。

然而，由於政府不理解創意業界的困難和生態特色，未有詳細考量之下，便以為可以憑放寬工廈用途來促進創意業界的使用。略有經濟學常識或理解業界困境的話，都應知道，目前工廈吸引藝術創意作坊，是由於租金廉宜及環境適合（如樓底高、負重大、貨運方便、遠離民居而寬容噪音等），而租金廉宜是由於租戶必須克服設施老舊、品流複雜、保安不足、犯法風險等。這些不便之處，引致租金低廉，然而要克服這些不便，租戶要付出時間成本的，例如多花心思隱藏裝修、走法律縫隙、互相照應以加強管理或保護安全，必要時要與消防當局等周旋。

由於香港的創意工業和藝術工業市場並不蓬勃，很多藝術家的時間是不能換得金錢的，即是說，他們的時間成本不高，可以花心思克服工廈的惡劣條件和犯法風險，於是可以在「享受」廉租，

而其他大資本的租戶，由於時間成本昂貴，又不能冒犯法的風險大幅裝修或改建工廈的間隔，只能退卻，不能享受廉租了。政府用特惠的方式，不必工廈業主補十足的改變用途地價，只是「按實補價」、「實改實保」，因應改變用途或改建的程度來補地價，而且還容許寬免三年。[四十二](#)所有租戶都可以合法租用了，原先的時間成本可以用金錢來抵償了，大資本便可進駐，時間很多但現金很少的窮租戶便要退出。

由於政府遲遲不宣佈改變用途或重建的政策，工廈業主的產權是受到剝削的，他們只能廉租予小租戶，白白損失了產業收益。政府要放寬工廈用途，甚至鼓勵重建以增加土地供應，都是正路，然而以「促進創意產業」之名推行放寬工廈用途之策，卻是不智。假使政府真的要促進創意作坊在工廈繁榮發展，則租金補貼或其他變相補貼是必須的。然而，政府沒有這樣做，反而用活化工廈為藉口，放寬工廠大廈的用途，令大資本可以進駐，改建大廈牟利，趕絕了藝術家群集。

撰寫本地歷史及採集民間故事

香港社會龍蛇混雜，中西、南北混同，名人軼事甚多，市井小民的事，也呼應大時代的變幻，惟未曾整理，加以改編成為傳奇，成為香港文化產業的敘事藍本。民間組織或政府可考慮聘請

民俗專家及說書人，記錄此等民間故事。另外，宜應為已逝傳奇人物立碑作傳，甚至設立紀念館，吸引技藝類同者慕名而來，以便搜集民間研究成果，革新技藝。

香港多姿多采，文有唐滌生，武有李小龍，大家卻棄之如履，不知道自己走寶。香港已有不少文人及機構，為唐滌生之藝術成就、生平事跡撰寫傳記，逐一爬梳。然而唐氏的文藝匯聚，心路歷程，則因時過境遷，無人問津。除卻戲曲或話劇團體，創作此等劇目表演之外，更應借助港人恢復重視中文之勢，維護廣東話教學，重新塑造唐滌生成為香港文化人物。

武術方面，應設立李小龍紀念館，懷念當代武藝革命家。除了收藏其練功器械、電影道具之外，此紀念館應具備虛擬博物館之功能：結合電腦多媒體技術，給予大眾自由瀏覽與簡易互動之機會。同時，借用場地舉辦世界武術大賽，引入類似的現代搏擊活動，比如巴西柔術，Parkour等等。

其餘香港流行文化人物，如關德興、黃霑、羅文、梅艷芳、張國榮、石堅、劉家良等等，離世未遠，都宜搶救其文化遺物。

四十一

在新安排下，當局容許重建工廈「按實補價」，即業主毋須按樓宇的最佳用途及可建面積補回地價，而是按實際發展密度繳付土地補價。而業主在三年內將工廈改裝為其他用途，更毋須支付豁免費。新措施能否做到「地盡其用」尚是未知之數，但工廈業主可從中獲得龐大利益已是毋庸置疑。

長久以來，香港社會不被當作主體看待，稱之為「移民社會」，導致人心渙散，隨時捨棄而移民海外。是故，必須鼓勵港人理解本土歷史，培養文化主體性。香港地靈人傑、水土秀麗，城市格局密集、社會團體歷史悠久，宜舉辦城市導賞，參觀機構及社團（例如基督教會及佛寺叢林），鼓勵畫家繪畫香港風光。另外，本地格局奇特，由島嶼、農村，以及城市組成。新界鄉郊及離島有不少傳奇，如西貢之鹽場遺跡，離島之防空洞等，可以發掘這些元素，開發創意故事及深度的文化旅遊。

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魚米之鄉，元朗、錦田一帶土地肥沃，大帽山水源充足，河溪清淨，絲苗遠近馳名，以精品米的形式出口美國。過去有元朗絲苗、流浮山生蠣、天水圍烏頭及青山魴鮄，並稱「八鄉四寶」。蔬菜方面，鵝藪白菜（俗寫「學斗白」）、打鼓嶺大頂苦瓜（俗稱「雷公鑿」）和川龍西洋菜亦相當聞名。香港往日農業經驗豐富，宜重新發揚本土農業及農村文化，鼓勵土地集約發展，將鄉郊居民的生活穩定下來，培養耕讀傳家之士紳或波希米亞（Bohemian）藝術家，並以農業公社方式，於暑假或某學期舉辦自然教學，鍛煉青少年耕作技術，重建人與天地萬物的感情關係。政府或民間組織可尋找場所租借工作空間，聚合具有專業知識，卻對城市生活厭倦之人士，提供不同理念的實踐空間。

改革教育，鞏固文藝及科學基礎知識，締造真正中產階級

香港推行文化產業，必須考慮傳統知識、技藝及品味能否傳承。本地常規學制失敗，兒童於公費教育之中，情感交流得不到鍛煉，需要民間以自然教育及藝術教育補救。

近年教育改革，新學制採取綜合教學方式，美其名為通識教育，卻失去傳統學科知識之傳承，宜恢復傳統學科教學，而輔以跨學科知識的交流。中學三年級及五年級的淘汰考試之消失，也令學生無法篩選，統統送到大學接受高等教育，這將令大學水平降低。宜推行分流，令技術教學及學術教學適應不同資質的學生，將不願意投入學術教育的學生區隔出來，轉到工業、商業及傳統技藝行業的教育。

科學普及知識之訓練，更為重要。香港社會看似現代化，但市民的科學知識甚為貧瘠，專業人士壟斷知識權力，市民只能仰賴專家，自己學科訓練之外，於醫學、衛生、飲食、居室等知識，多數道聽途說，令頗多違反科學的廣告可以胡亂推銷，充斥反智精神。

香港教育的歷史及哲學基礎知識傳授不足，令社會缺乏綜合理性判斷，市民無法有智力面對複雜的社會民生及政治問題，只能用偏狹的知識層面及自私的利益層面來看待事情。片面理性是香

港的社會病。所謂片面理性，就是堅持單一方面或某個範疇的理性原則，而不能運用各種理性原則來綜合判斷事情。例如堅持大陸人是弱勢，要無限度地動用香港的公共資源來救助，要開放香港的門戶來迎接，這就是片面理性。你向這些人說，香港不堪負荷、大陸人普遍公德敗壞、大陸人是中共在香港佈置的殖民，家庭團聚有兩成是假結婚的個案（甚至大陸公安部門也通知香港入境處調查），這些顯淺的理性判斷，他們是不會聽到的，因為如果他們一旦聽取這些理性判斷，綜合考慮一下，之後放棄和平大愛，他們的淨土世界就毀滅了。他們要面對這個骯髒的現實了。香港的知識青年組織社運、參與有機素食或食生、去台灣旅行透氣，變成了他們的靈性治療，他們卻不會將社運的理性、去台灣學到的本土鬥爭，帶回來香港的現實生活，這就是片面理性的病。

科學知識、合理性融會之後，香港便可以建立本土知識體系及學派，與外地對話，伸張香港文化。民間的文化機構或政府可鼓勵出版簡易知識入門叢書，或者用漫畫方式表達，擴充民間綜合判斷力，推廣討論文史及科學的風氣。加以時日，可形成小布爾喬亞的社群，即是具備文化意識的中產階級。小布爾喬亞具有專業技術及文化品味，薄有家財，可以締造及傳承香港文化。

吸納外來人才及投資

香港人口龐大，然而文化人才依然不足，文史、技藝及科學，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應鼓勵港人與外地人多作交流，並歡迎外來人才在香港停留或居住，吸納人才有三個圈：

一、海外港僑：不論中年的經驗豐富人員及年輕的一代，由於傳承香港文化及生活經驗，以及帶來海外網絡，都是必須首要吸納的。

二、南洋華僑：他們在戰前帶動香港創造轉口貿易及工業、資助教育（如陸佑資助香港大學），擁有更為牢固的遺民的華夏文化，也連結東南亞網絡及市場，他們的中介身份也適合在中港之間聯繫，是香港必須爭取的人才，香港應該吸納更多的南洋僑生來學及僑民定居。

三、大陸人才及外國人才：可以按照需要而吸納，擴大香港的文化交流網絡。

香港大城邦計劃： 統合深莞元惠， 建設大香港

大城邦計劃的構思與藍圖

- (八) 香港的外環帶：
購物、水貨、工農業
- (七) 香港本部：
高端增值活動
- (六) 西晉五胡亂華的啟示
不必懼怕港獨，
香港深入大陸
- (五) (四) (三) 重新釐定中港關係
- (二) 新時代的改革，
由香港大城邦開始
- (一)

結語：香港不是霸主，
而是師傅

香港的自治運動及文化復興，是華夏本土的事，也是國際勢力的棋局。英國在一九七九年得知中共鐵定收回香港主權的時候，已經想好了如何制衡中國、影響中國的十步棋局。其實他們在委派麥理浩來港的時候，已經開始佈置棋局。至於北京那群共產黨，只是想到要收回香港、蠶食香港的一步棋局。我的香港城邦論和華夏邦聯論，是為香港及中國佈置另一套棋局，同樣是十步的棋局。近代中國歷史上，沒有比這個更精彩的事。各位有幸，將可以目睹整個博弈的過程。我是代表香港和中共博弈，也是和英美博弈。

陳雲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面書留言

(一) 大城邦計劃的構思與藍圖

告訴各位一個秘密。香港在深圳灣的西部通道，於二〇〇六年十月底實施一地兩檢的時候，擁有大陸的口岸地區的海關土地使用權五十年，而且在該處實行香港法律，由港方人員執法，大陸人禁止進入。此中，有兩大靈異事件：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令，名為《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岸實施管轄的決定》，將深圳某塊土地租予香港使用和管轄。在其他國家的地區享有治外法權，這是一個國家才可以有的特權。時機成熟的時候，香港可以據此而批租大陸土地或託管大陸土地，擴大香港的領土範圍，解決香港的土地不足問題。澳門大學租用珠海市橫琴島上的橫琴校區，佔地約一點一平方公里，自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起，租界採用澳門法律，即為先例。

二、
《香港率先實施一地兩檢》，《亞洲週刊》，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人大於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的決定》。新校區的使用期至二〇四九年，可續期。租金共十二億澳門元。參閱《澳門大學橫琴模範式一國兩制三體》，《亞洲週刊》，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二、批出土地使用權五十年，由人大常委會在二〇〇六年通過，超越《基本法》的有效年限二〇四六年。即是說，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政治實體，可以超越二〇四六年。

兩件事，意味着甚麼？答案：中國與香港，實際上是邦聯的關係。只是中港兩方不便宣之於口。我的香港城邦論和華夏邦聯論，是基於政治事實。

從政要有前瞻性，要有想像力。香港現在是漢賊不兩立，將來是王業不偏安。香港大城邦的計劃，做得成功，香港的高地價政策迎刃而解，而且香港青年人大把事業可以做。

締結華夏邦聯，中間需要「香港大城邦」

香港城邦、華夏邦聯在現實政治上，是甚麼回事？為甚麼共產黨對此默不作聲？我幾句話解釋給各位知道。這兩個理論的目的是，是將華夏正朔歸於香港，香港成為華夏天下的文化正統的發揚者和詮釋者，香港成為華夏的梵蒂岡，我們講的粵語漢音、寫的正楷漢字、文雅中文，就如梵蒂岡用的拉丁文一樣，是文明的標準。當然，香港會集合華夏各地的文化人才精英，好像梵蒂岡集合教牧精英與神學研究一樣。

如此下去，共產中國的華夏文化負擔驟然減輕，中共可以面對其蘇俄正統來源而不必急於隱藏，他們可以正視其域外蠻夷來源，緩慢復漢，推行漢化計劃，好像滿清王朝的漢化計劃一樣。滿清王朝當年寬待明朝遺民（顧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屈大均、張煌言等儒士）及投誠儒生，令滿清可以漢化，就有這個政治智慧。中共可以借助香港過橋，安度政治與文化轉型，不會驟然丟失政權。情況猶如意大利有了梵蒂岡，意大利怎麼昏亂、總統怎樣荒淫無道、政壇貪污腐化，都不成問題。台灣方面，由於中華民國是單一民族共和國的構思，偏安多時，落地生根，台獨無可避免，因為國府統治的地方，就是民國的國土，都要進行民族建國行動，建立一個單一民族。華夏邦聯令正朔歸於香港，台灣朝野可以釋放其華夏文化負擔，安心成為一個建政於台灣、歸心於台灣的華人政體，其情況猶如南韓，但比南韓更為接近華夏，因為台灣會與中國、香港和澳門結成華夏邦聯。《中庸》說的，自誠而明，我的政治理論，是基於真誠面對現狀，給予一個互相諒解和彼此敬重的解決方案，互相扶持，互相保存，並行而不相害，共生而不相妨，此乃儒家政治的誠與敬。三

三 韓國、越南、日本、新加坡等曾經深受華夏文化影響或有華夏遺民的國家，可以用準成員、附屬成員國的身份參與，享有優惠國的待遇。這是重建華夏天朝的計劃。

可惜，香港由於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在八十年代中期被主權移交所打斷，故此無法勝此大任。地產霸權壟斷經濟和兼併樓房地產之後，新移民大舉侵入香港之後，自由行的購物走私客佔用香港公共資源之後，香港莫說是要垂範於華夏了，香港連自己的生存空間與發展空間也將不保。

大城邦計劃的總綱

香港需要同北京商討拓展領土或管轄區的原因如下：

一、英治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用經濟躍升及社會建構的方法，令香港經濟轉向服務型經濟及社會迅速轉型到中產社會，期間需要整固的時間和空間，特別是土地空間，以免香港的現代化過程中道而止，香港的華夏新文化無疾而終，令中國失去安全的實驗及借鑒之地。

二、文化主體之成立，必須向外宣揚。香港文化向外擴張的時候，就是香港文化自我認同的時候。文化必須外擴，才可以內成。以前香港文化外擴，由於沒有境外轄地，輸出的只是消費娛樂，不是堅實的香港文化，而是浮誇的通俗版本。香港在內陸有了管轄區，就可以推展香港的華夏新文化。期間，香港吸納大陸、台灣及海外僑社的人才來港，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法人員，建立龐大而開放的人才庫。

三、香港需要重新發展工業，與大陸地區——特別是鄰近的廣東地區接通產值鏈，提升國貨的實力。

四、香港的資金及大陸富豪寄存在香港的資金，都需要一個安全的、整全的華夏投資區，從農業、工業、金融和商業服務，都在華夏地區裏面，得到保存和升值，令中港的資金不致於流失國外，為他人作嫁衣裳，反過來掣肘中國。

五、香港亟須將不能適應香港生活的新移民或回流大陸的香港人安置到新區域，期間加以福利補貼及安居援助，減低他們在災難或貧困時期回港的壓力，這些準香港公民集中一起，可以運用群體效應，幫助建設轉變之中的廣東地區。這是香港的新殖民區，或者說是逆向殖民的地區。

六、香港管轄區行香港法律，用港幣，寫正體字，香港官員主理，黨委退居輔助或監督位置，之後黨委撤出。普通話在官方平行使用。簡體字容許使用，逐步排擠。

七、八十年代之後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樽頸，除了玩弄貨幣和資產遊戲之外，中國無法前進，亟須在制度上突破。香港的內陸殖民區可以垂範中國。

八、 中國的重生之路，必須通過香港。中國已經被中共搗爛，單憑中共之力，並無可能恢復國族元氣。中國需要的是負責任的殖民統治，另部分先進地區轉向華夏、轉向現代，正好由香港這個自己人來做。中共向外逃亡，香港如能轉向回歸內陸，可反轉中國敗亡之勢。

中國也借助過租界，突破政治困局，例如新加坡的蘇州科學園、日本熊谷組在海南省的特區，都是由於異國統治，不會成功。澳門的制度實力，也不夠用。香港統治深圳、東莞及惠州這三個環帶，香港文化與制度仍是夠用的。中港雙方和衷共濟，慎重考慮香港大城邦計劃，則香港很快就有New New Territories。

接管計劃會動用好多香港儲備金和公共行政、商業管理和科研人才，人力物力花費巨大。但始終是香港長治久安之道。香港是小地方，貿然接管新管轄地，必須分區域、分環帶而行，國民福利也會分開區域和環帶。環帶的實現方式如下：

一、先將羅湖某些地區劃歸香港，如河套區、羅湖商業城等，海關往北邊推移，香港政府進駐，黨委及公安、法政人員輔助執政，成為香港試驗租界，深圳人員逐步歸入港府統轄或撤出。羅湖的香港管轄區容許深圳原本進出的國民自由出入，但進入香港，依然維持出境手續。

二、外環帶的居民，統轄區的政府給予境外香港居民身份，福利稍遜，護照可以用「香港境外居民護照」，北京及港府代為游說外國，盡力爭取免簽證待遇。

三、香港接管大陸地區，必須尊重當地傳統，妥善保存風俗、方言、水土、動植物及文化古蹟，適當恢復古老地名，加入香港新的制度及禮儀，但容許地區差異，以帝國的格局來分區治理，故此必須用環帶的方式層層推展。

四、香港的方式是接管，而不是甚麼香港深圳同城化，香港要成立城邦的二環帶。這一方面可以防止香港城邦搞港獨，共產黨可以放心，二來是反饋香港的現代化予內陸，借助二環地帶來傳播香港文化，減低一點大陸人的抗拒情緒。

五、香港在管轄羅湖的時候，香港資金可以投資到深圳鄰近地區的工業和科研基礎，由香港龍頭整頓，提高品質和產量，方便內銷和出口。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可以在深圳設立分部，香港大學生和畢業生可以在外安全發展，實現理想。特別是大陸來香港留學的畢業生，可以在這些地區大展拳腳。

六、一旦香港的管轄區域漸次伸延到深圳羅湖區、深圳全境、東莞、惠州，香港財閥就要從事實業，他們的壟斷地位不再。香港的地價降低，招呼自由行的日用品購物生意，大部分轉移到香港的

二線區（最先是羅湖）。香港地價可以平穩。香港擁有大陸的新租界之後，港商可以安心在香港租界投放工業賺得的利潤，不必回流香港，而租界的地產價值也可以寄存財富及銀行抵押。

總綱定下之後，分條述之。當然，如此計劃，難以盡述，也是擇其要旨而言之。

(二) 新時代的改革， 由香港大城邦開始

深圳正在發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上海亦推出「自由貿易試驗區」，兩者均無法持久，注定慘澹經營。深圳來自五湖四海的外省人口從來都是信不過，前海爛地由CEPA從香港引入外國商人投資也是空城計。深圳已有數十個鬼城空無一人住了。

至於上海自貿區，則出於不成熟的政治決定，擺出大有作為的架勢。試舉一例，便知此法的局限。據吳大澂的文章指出，香港交易所數據顯示，由大陸二〇〇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始，到

二〇一一年的十年內，大陸之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港透過股票集資（只計主板）的總數為一萬九千二百億港元。如果在上海能籌到此數，他們不會留在上海嗎？大陸心知肚明，放在上海，不要說一千九百億，連一百億都無辦法籌到。

中國於九十年代末、千禧年左右提倡「與世界接軌」的思想，全力掃除傳統障礙，將農村改成市鎮。然而，十幾年過去，證明單憑大陸本身，還是無法與世界的軌道接上，這裏面有一個制度的轉盤、文化的轉盤，單靠香港無法做到，但香港大城邦卻可以做到。

後進地區的現代化（如以前的普魯士、蘇俄和近代東亞的日本、香港、南韓、新加坡、台灣），在生存競爭的催逼下，無可避免地選用了單一的擴大投入的發展模式，以犧牲其他發展來加大單一的經濟投入，例如犧牲工人權益和環境保護以降低工商業的成本、拆掉舊社區來發展工業用地和商場大廈、排擠小本經營者以造就大企業、以及犧牲大學教育的自主性來遷就企業對人才的需求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更借助專政力量吞併私有產業，鏟平公民社會，以推行國家資本主義（Staatkapitalismus）的建設。國企、集團和財閥的壟斷特權無疑有助提高生產規模，但卻妨礙創意流通、公平競爭和產業升級，偏差的國民教育和專橫的政治（從希特拉、斯太林到毛澤東、朴正熙、蔣介石、李光耀等）更扼殺公民的高級智力發展（如邏輯分析、純科學、哲學、數學、

法學、政治學、美學等），令這些後進地區的人喪失討論深刻學理的能力，在產品上最終淪為創意國家（如美國）的硬件裝配廠和軟件銷售場。

現在大陸的改革，卻不離單一發展議程。所謂單一發展議程，不論是經濟掛帥或者同時與之配合的政治掛帥，以壓制其他發展來成全經濟發展，摧折生機以達致一枝獨秀，已經不合時宜，難以永續發展。

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改革，要由大城邦開始。大陸要突破過去的發展思維，要從以前片面的現代化（以物品和服務的生產總量為量度標準），進展到整體的、綜合的現代化（以生產力、知識發明、社會穩定和生活素質為量度標準），政府的宏觀規劃，也應該從「最大化」（maximization）的單一目標，進展到「最優化」（optimization）的綜合目標。舉例，以最直的路線、最大的盈利和最高車速的方式籌建鐵路，是單一發展議程；但縱貫德國的Inter-City Express (ICE) 並不追求最高速，而是最優化的車速，平衡快速、安全與環保（火車減速時可以回收能源來發電），火車的零部件在沿線的工廠訂購，工人就地招聘和培訓，結合地方利益與就業政策，這就是綜合發展議程。

(三) 重新釐定 中港關係

香港的「限奶令」在二〇一三年三月推出，限制大陸人攜帶香港奶粉出境^四，大陸人叫苦連天，紛紛要港府撤回成命，救助大陸。我看到的是非常光明、非常有希望的一面。這顯示了甚麼？這顯示了香港人的文化優越性（cultural dominance），與大陸人的殖民依賴性（colonial dependency）啊。

中國人惡狠狠地責罵香港，心中其實是崇拜香港、依賴香港的。故此，我們香港人不要自滿，除了在現階段要堅持中港區隔之外，更要做好自己：肯定香港的文化優越感，增加知識，寫好中文英文，增強公民道德和人權法治，刷亮香港人的品牌。將來香港城邦自治建立，鄰近地方會來歸附香港，建設香港大城邦，垂範於中國的政治改革，創建華夏邦聯，實現東亞的大復興。

自主權移交之後，特區政府一直提倡中港融合，嘗試於本地單方面吸納大陸資本，最終失敗收場。根本的原因，就是施政者沒

四 根據俗稱限奶令的《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任何人如沒有出口許可證，不得攜帶超過私人用途分量的一點八公斤嬰幼兒奶粉出境。

有理解清楚香港政治經濟制度，貿然提出一時之策。現行的中港融合十分粗糙，不過是引入大陸人來港消費，利用龐大流量去養活服務行業。至於中間如何考慮將產業升級，將文化保存乃至提升，則付之闕如，放任市場調節。

大陸遊客的流量過多，他們所感興趣者，不是本地的奢侈品，而是本地的日常用品。在政府誤導底下，商戶開始冷待本地消費者，而巴結遊客。他們以為本地消費能力不足，要增加遊客抵港方有盈利。此或許並非無的放矢，但是以旅遊業推動經濟，則肯定誤會一場。已有經濟學者指出，旅遊業只佔香港近年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三至五不等，購買的貨物來自外國，香港可以分到的收益有限。然而，特區政府懷有政治任務，一直不肯處理本地問題，甚至假借遊客抵港製造就業，企圖控制底層經濟。梁振英嘗言，在新界西興建酒店，令大陸遊客方便抵港，發展地區經濟。

大陸遊客不是遊客，而是跨境的、低品味的洋貨採購者。一切外國的自由市場、跨境購物都不能輕易用來解釋中港之間的關係。因為中國是世上唯一由共黨獨裁統治卻走資本主義的大國，而香港卻是世界上唯一與中共接壤而被迫接受其侵略的國際城市。因為特殊的中港制度差異，中港之間的貨幣和關稅安排不同，而令大陸遊客有差價可以賺取。差價是由於人民幣兌港幣佔了便宜，而中國對外國貨課稅太高。於是中國遊客來香港瘋狂採購外國貨，用走私逃稅的方法運回大陸。

然而，香港為何又不能像八十年代那般，向大陸客提供本土農產品和特色服務呢？或者，也不能夠為大陸客提供形象與品質都經過香港改良了的中國貨呢？又或者，大陸客為何品味如此鄙俗的呢？首先，英國撤出之前，刻意栽培的地產霸權，用地租掠奪了利潤，用高地價排擠了不能短期牟取高利潤的經濟活動（工業農業、本土小企業）。全球資本主義的目標，是令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切斷香港的技藝傳承，全民做大集團的僱員，香港員工淺薄化、sales化，使香港不能成為中國產品邁向高增值的研發基地、品牌形象刷新基地，也不能成為教養中國人品味的地方。一句話：毒害香港，將中國斬首。中國長期成為世界工廠，中國人不能有自己的精良國貨可用，要以消費外國貨為榮。

香港從八十年代持續至今的高地價政策，在九七之前，是以樓房當作財富儲備品的方式，回收港商在大陸的投資利潤；在九七之後，是以樓房及金融投資的方式，吸納大陸官商在大陸的逃逸資金。中國收回香港而不拆解地產霸權，不能解放香港的整體生產力為中國服務，是深深地被歐美帝國主義套牢了，變成國際大租界、次殖民地。自由行來香港採購外國貨，只是佈局的冰山一角。這個佈局，在九七之前的八十年代，英國用地產霸權的方式佈置好，待中共的貪婪官員、無良商賈，一一失足掉落。九七之後，香港政府及香港傳媒的一眾詭辯之士，推出中港融合論，副題是香港邊緣化論。融合是甜頭，邊緣化是懲罰。官方的論調是，如果香港不與中國大陸融合，就會陷於邊緣化，其地位將被

上海取代。融合論的代表作，是CEPA、港珠澳大橋、高鐵、自由行、雙非人之類，任何一樣，香港都是賠本生意，而且賠得不清楚。同時，政府引入大陸遊客，其公民質素差劣人所共知，是故中港之間不時衝突。

到目前為止政府採取的策略，乃不斷提升整個城市的生活物價，借助各種手段維持高地價政策，扼殺本地實業單一發展金融行業。一言蔽之，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的管理手法，採用市價汰弱留強，使不符合實際生活標準的人士，自行離開此地，達成中港人口替換的族群換血計劃。

香港大城邦計劃，可以化解跨境經濟危機，重新釐清中港關係。簡單而言，香港邊界會向北拓展，統管深圳、東莞、惠州，土地大增，香港變成「大香港」。原有的邊界地區保留為農田及郊野，根本不必建屋。香港地價大跌之後，與新管轄區締結區域產業鏈，香港重新工業化，人口向北擴散，生產力迅速提升，港僑、港資回流，青年就業機會及晉升機會媲美八十年代。這就是我的香港城邦論的下集。

(四) 西晉五胡亂華的啟示

中港融合之前，必須認識到中港之間的三大不對稱：制度不對稱、流量不對稱、權力不對稱。中港的人口、資金、旅客和車輛，是不能互相對流的。中港之間行的是一國兩制，不是一國一制，中港之間的交流，是絕對不能放任市場或資金自決的。陸婦產子、自行購物、大陸車的自駕遊、甚至大陸資金來香港買樓，香港政府是不能毫無約束的。所謂中港融合，是要審慎處理的，不應該淪為商家佬的市場口號、不應該淪為左翼分子的愛國口號，而是必須要有香港本位的政治考慮與政策判斷。

沒有考慮清楚上述三大不對稱的中港關係，後果則是中港居民爆發族群衝突，消解香港公共秩序。縱觀華夏歷史，西晉年代亦曾出現族群鬥爭，引起當時士族警惕。曹魏時代，邊疆民族內遷中原後自立。元康六年，匈奴人郝度元聯合羌胡二族起兵反晉。當時關中大饑，秦、雍二州的羌人紛起響應，推氐族首領齊萬年為帝，擁兵七萬。此亂事歷時四年，方告平息。江統擔心內遷各族聚集過多，將威脅晉朝的統治，遂作《徙戎論》，建議遣返各族返回舊地。《徙戎論》在當時西晉朝廷由賈南風當政時期，不予採納。然而，不出十年，即有五胡亂華。

江統《徙戎論》立論簡明，就是漢朝以前華夏文明興盛，或者能禦夷於外，或者能以夏變夷。漢末以後華夏文化進入中衰，華夏於武力兵事不能自衛，於文化禮教不能化夷，長此以往，恐怕華夏淪亡，故此必須遷徙夷狄，使其離開中原，以免衝突。其中《徙戎論》的後段點出，引入新族久居華夏的禍患：「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語譯就是：「治理國家時，患難之處不在於貧窮與否，而是在於財富不均；憂心之處亦不在於人才多寡，而在於人心不安。四周國土遼闊，人才鼎盛，豈須胡族居住境內，方覺得充實哩！這些外族皆可頒令遣返，使他們返回原居地，慰解他們身處異域、懷念故土的鄉思，亦可紓緩國家的隱憂。故對我國益處甚大，亦可安撫四方，德政可傳頌諸萬世，為長久之策。」

《徙戎論》一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土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語譯大意，就是境外族群的道德和利益不同，如果因為他們處於弱勢而遷入京城，京城原本的士人會輕侮他們，

令他們心懷怨毒，之後他們繁衍眾多，就會來討債復仇，趁亂侵擾華族。異族和華族之間撤銷了屏障，華族又不作防備，一旦異族滋擾起來，華族就會敗亡，這已經是可見的了。

《徙戎論》正是目前發生在香港之事。港人之中的離地中產，憐憫大陸人而將之引入，給予福利，正是養虎為患。為了攻破香港人的心理防線，港府推行愛國教育，改造港人思想，輿論不斷放出香港是移民社會的言論，使本土港人與大陸新移民的身份看齊。

這種移民社會的言論，正是導致本地政局不穩定的因素。昔年中央政策組一份香港市民是否愛國的調查，發現九七以後，香港愛國的人數增加，故開始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二〇〇三年中共要求香港特區政府要為《基本法》二十三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文自行立法，限制香港人的自由。往後，香港人在七月一日慶祝香港回歸之日，五十萬人大遊行，董建華倉皇辭廟。然而中共及政府依然賊心不死，準備清洗香港本土居民，在香港發起族群替換之論。推出「新香港人」的論調。大陸媒體《人民日報》刊登李輝娜一篇文章，為「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文中強調所謂「新香港人」並非受人嘲笑的「阿燦」，而是成為融入香港社會的新精英，勸喻港人以另一種心態接受他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嘗言，要吸納優秀「雙非家長」資源，並完善配套措施。中共要在香港製造新香港人的觀念，可謂愚不

可及。香港是法治社會，也是繁華社會，舊香港人根基穩固，中共引入具備離地性質的、不服華夏教化的新香港人，無力修補香港文明制度，只是刺激族群鬥爭，促成香港人的族群觀念。

反其道而行之，倘若這群「新香港人」信守香港若干本地公民道德和文化風俗，言傳身教，將香港文化傳播到大陸，情況將會逆轉。地少人多的香港裏植入「新香港人」，為點燃火藥，最後會引發「分離主義」之大禍；地大物博的中國衍生「新香港人」、新華夏人，變夷為夏，帶領中國脫離蘇維埃政府治下的惡習，解殖歸華。

(五)

不必懼怕港獨， 香港深入大陸

中共以大幅度的人員流動和人口流徙，嘗試統治香港，不會成功。其必須容許香港普選，否則一旦中國崩潰，能夠在中國境內維持憲政秩序的地方——香港，就可以盡取中國的利益。而當香港不能普選而中共崩潰，香港可以自決前途，中共的利益無法取得保障。如果中共知道危機，必須在香港推行普選，採用立法會成員成為特首選舉的提名委員會的方案，令中共的黨支部——土

共與香港本土利益結盟統治，則不論在和平狀態還是戰亂時期，中共都會保護好自己的利益。這是香港人對中共發出最大的善意勸告。中共執意不聽，不信邪，不容許香港普選，我們香港人更開心。好戲在後頭。

香港是帝國的天下格局，中國是單一的共和國制度。帝國格局有向外推廣文化和擴展影響力的趨勢，大陸人來香港入籍、投資、留學和購物走私，香港人卻很少逆向而行。帝國的使命不是獨立，也毋須獨立，它的目標是擴張版圖和融合異己。中共不許香港收回入境移民審批權，是有它的顧慮的：香港向大陸地區逆向殖民。如果香港自治政府行使自己的審批權，香港可以設立二級公民制度，每日批准一萬人來香港取得二級公民身份，無福利，但有香港特區旅遊護照，二級居民返回大陸原籍居住，向香港納稅七年之後成為正式香港公民。如此，不出十年，中國的精英人口就會變成香港公民，中國變成香港實然的殖民地。全世界的國家、城邦或地方政府，都保有移民審批權，偏偏香港沒有，因為根據《基本法》香港有實然的主權，香港與中國之間是邦聯關係，香港的公民戶籍，是中共必須控制的，否則香港可以用發出身份證的方式，將中國完全殖民，大家明白了吧？

然而，中共害怕也沒用，應該此刻就與香港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否則一旦中國崩潰，中共滅亡而香港自治自立，香港就可以採用此法，在國際勢力的保護之下，將中國殖民。故此現時就

要好好扶植香港，不要心存僥倖。在兩地政府共治底下，「新香港人」不僅帶入現代管理技術，同時有效化解國內毛澤東思想的「不斷革命論」的盲目破壞慾望，將會成為中國再度釋放的驅動力量，化奇為正。

香港城邦計劃，乃是確立香港城邦自治，繼而向內陸推進大城邦計劃，厲行現代化，為日後華夏邦聯（兩岸四地結成邦聯）紮下基礎。此舉穩打穩紮，化解昔日秦政之餘毒，復興周朝萬邦來朝，締造東亞共榮，與美帝國平起平坐。

深圳前海、廣州南沙、浙江舟山都準備設立「小香港」，複製香港的免稅、資訊流通甚至若干法制，例如採用香港法律做司法調解。這就好，香港以後就變成「大香港」，成為大陸眾多小香港的「祖地」與廟堂了。中共口裏雖然詆毀香港、矮化香港，將香港自治運動說成是獨立運動，但在潛意識裏，卻是願意接受香港的一套，硬生生地將好多不肖子孫「藩屬國」，塞給香港人，要我們認賬。

香港要做的，不是與大陸融合，而是要香港品牌專利化，在大陸某些地方推廣香港模式，由香港人才協助管理大陸，並且收取版權費。我常常說，「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就是這個道理。好多人以為香港城邦自治論做的是孤立主義，其實剛好相

反，香港城邦要做的是擴張主義，恢復香港對外經貿文化關係的多元化，在對內方面，也要相對自主，對大陸城市擴大影響，並且維護香港本土利益。

香港甚至可以協助大陸的直轄市（上海、天津等）的行政革新，促進發展成為準城邦，在國際上活動，增加中國外交的靈活性。中國的直轄市城邦化，也可以有序地增加自治程度，避免地方割據，並且配合將來中港台澳結合成為「華夏邦聯」的制度構想。

這就是我的香港城邦發展構思，好有中國視野的。香港的本土覺醒和香港人的自治承擔，是頭等大事。如果中共掌握到這個香港公民意識覺醒，可以在香港發起華夏文藝復興運動，配合專利認證的方法，在大陸做出幾個核心的城邦，可以實在地促進大陸現代化。香港真的可以促進大陸發展，但不是用民主黨的先有民主中國、後有香港民主的傻方法，而是用香港城邦自治的方法，先保存香港在文化、地理、人口、經濟的整全性，香港先來雙普選，再用香港的文化意識和行政管理，輻散影響到大陸，促進大陸在八十年代工業化之後的另一次高階段的現代化躍升。

目前為止，世界政治的其中一個重心，乃是處理中國大陸的問題，香港更是首當其衝。以中國大陸為腹地，香港城邦可以考慮三種方案：

一是由北京安排之下，與廣東省地方政府合作，在珠江三角洲中行大城邦計劃，既可借助文化優向內推進，更可利用廣東省的資源補給，在本地加工，發揮香港轉口貿易的功能，向大陸市場內銷，形成華夏經濟區的雛型。

二是接續方案一，大城邦成型之後，港府與內地的直轄市聯絡，部分締結成為商業聯盟，並扶助對方成為自治城邦。

三是南進計劃。恢復香港與南洋關係，與東南亞國家以及太平洋島國連繫，連結當地華人社會及權貴階級，開拓香港市場及加強香港在境外政治影響力，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在外交上挾持威勢，方便以後同大陸協商。

完善公營服務，建立地方議會

香港大城邦計劃始於文化特區，成於華夏邦聯，以經濟特區的功能，换取文化特區的確立。嶺南文化特區將如何成為華夏邦聯，憑香港的經驗本事，本無多慮。然而，大城邦計劃提供的文化自立、政治安全與資本保障，足以引動整個大陸的人民。屆時嶺南文化特區成為國上之國，共產黨的中央統御力量勢將崩潰（可能化成黨派割據）。大城邦計劃要成功設立文化特區，須要中共陷入艱難管治的局面。

當中或許有兩個契機，一是廣州受大城邦感召，以嶺南精神抗拒中共，歸向香港。廣州一帶雖受香港殖民，然而香港只要協助廣州在省際競爭取勝，廣州享用到經濟利益成果，當不計較其政治權力的讓渡。二是中共權貴不堪內外交困，容許香港實行大城邦計劃，設立嶺南文化特區。然而，廣州以外、內陸各省人才資金如要進入嶺南文化特區，則必由中共權貴背後操作。換言之，嶺南文化特區的好處，不計廣州本地人民，中共權貴要優先享用，成為VIP，以便維持他們在北方各省的政治權力穩定；而且香港只宜在嶺南文化特區，倡導知識精英的開明專制，減低民主自由的批判思潮北上，避免激起北方各省百姓的慾望及叛變情緒，這是雙方的共識。

整個大城邦計劃能夠行之有效，關鍵為托柱換樑，將過往共產黨統治設下的黨委分階段撤走，以合乎現代規章的市議會取代。期間提供優良的公營服務，並重建地方議會體系。

大陸素來沒有地方議會可言，自中共建國以來，素來依賴黨委系統的政治，只有黨中央派出書記、黨員下地方，行集權之實。日常政務方面，政府以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事事加強管制，剝削市民公民自由，用專業理性挫敗日用理性，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力量。當中出現不少官民衝突，甚至鬧出人命。是故，在香港新管轄區內恢復市政局之類的地方議會，乃大勢所趨。將來大城邦於廣東省落實，將於設立地方議會，其主席負責管理戶籍身份，議員由該區全體選民選出。

(六) 香港本部： 高端增值活動

香港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其商業勢力，不宜停留於所謂「國際城市」論調。香港是政治與文化中心，社會容許激烈討論，言論開放，思想自由。同時，香港亦有能力做稅務天堂（tax haven），儲存大陸資金。九七主權移交之後，香港除了逐步放寬中國公司來港上市外，更乘機吸納不少中國銀行來港上市及開拓業務。

香港有文化及制度上的優勢，在華夏天下，在大中華經濟圈，香港城邦的角色是瑞士（金融中心）加 Benelux（促成歐盟）。Benelux 是比利時、荷蘭、盧森堡。Benelux 是歐洲人對低地三國的稱呼，台灣叫荷比盧。香港一定要取得新的託管地，因為投靠香港的人口太多，要開闢新的土地做一個 Benelux 出來。去過 Benelux 的，都知道這三個地方非常富庶、開放，文化豐富，而且行事低调。香港城邦論及華夏邦聯論，以香港為發展中心，以華夏天下為復興基地。香港應該學 Benelux，促成邊陲政治聯盟。盧比荷三國於二戰之後，敢向各國倡議「核心歐洲」之理念，最後形成歐盟。為何香港不可革新華夏，形成邦聯呢？

當然瑞士和Benelux只是比喻，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強過瑞士。雖然沒有提供優厚的稅務，亦沒有出名的虛擬法人組織註冊中心，但本地境外金融中心，乃歐美市場與亞洲市場之中介，為其他地區所不能比擬。而華夏邦聯，當然要由北京發起，香港是出理論、開會地點和總部地點，出聲、出地點、交收錢財。香港扮演的角色，就是理念上的說客，以及地緣政治的搭橋者。一旦香港普選而社會安定，香港可以與中共商議，在深圳及廣東取得託管地，用香港法律及官署，安置雙非人、新移民，香港人上去大做生意。由於香港很小，即使變成大城邦，也是小，故此我們安分地取自己一點利益，就夠香港人享用。香港人可以在大城邦裏面大展拳腳，也可以到華夏邦聯裏面去。大城邦是香港的根據地。

台灣看到追求心靈富足的社會，是正常的發展，香港本來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是這樣，可惜都被過渡期的社會動盪和九七之後的金融剝削、地產霸權和大陸人口入侵而破壞掉。提倡香港城邦自治，港人重奪政治主場，就是要接續香港的八十年代。只是我們要更進一步，不會如同台灣流於狹隘本土，而是進軍大陸，以現代城市帶領落後地方，垂範亞洲。要完成此等大業，可以參考英國如何對外貿易。英國自身之外貿，有其特殊之處。最明顯者，為英聯邦。作為大英帝國的延續，雖然有名無實，但在文化、經濟交流上，仍發揮作用。身為眾多會員國之首腦，英國與會員國貿易時，仍能享受優惠。例如，一個英聯邦成員國，可以

以借或租用其他英聯邦國家的使館，並可即時聯上英聯邦的海外出口市場及自由貿易區。英國仍能以為宗主之身份，享有貿易優勢，此乃日不落帝國之遺產，亦是英國仍能保有影響力的手段之一。

推行大城邦計劃，本地將來參考英聯邦的做法，順利打開大陸的貿易之門。只是香港的角色，比起英國當年所做的，要任重道遠得多。他要肩負起提攜後進的歷史任務，警惕那些普世、跨國、官僚層級的社會功能代理人，進行審慎的現代化。先進地區的工業化，會保存社會凝聚力，落後國家跟風，卻是瓦解族群文化。後進國家仿倣工業社會的去家庭、脫宗族的思維，社會不斷轉型，特別容易架空傳統生活，輸入左翼或右翼的空洞意識形態，毀壞自身文化。工業社會製造一群專業人士，而這些專業人士化為政治玩家時，會形成官僚制度，保障自己私利。不論左翼的福利社會、右翼的自由經濟等空洞的意識形態，都把後進國家害慘了。

香港一貫的生存定律，是以政治特權交換經濟優惠，沒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來與大陸交換經濟優惠，不論九七前後，香港都不能獨享繁榮。主權移交之後，香港的前途，取決於香港在中國進入新階段的開放改革和國際秩序的過程之中，所佔據的位置和所擔當的角色。一國兩制不是要消極地阻隔來自大陸地區的影響，而是要積極地配合中國將來的走向，以中外交界地區的特殊身份發揮獨特貢獻。

若要充分發揮香港的影響力，中共自己有義務維繫好兩地之間的區域經濟，而現行的「中港融合」政策，卻是放棄香港的地區特性。單純放下大陸人到來消費，有何功用？一旦中港結怨，觸發激進的港獨議題，分離主義會令中共束手無策。香港要做的只是產業轉型，中途或有美國幫手，出現陣痛，卻不是必死之局。中共卻是一個依賴出口維生的國家，不能開罪經濟夥伴。大陸應該與香港合作，借助香港的經濟地位打開貿易障礙，利用特區政府同外國政府協商，在香港輸出產品，打入外地市場。如此，東亞逐漸出現經濟聯盟。先做小，後做大。大城邦一開始限於大陸同香港貿易。做好香港同大陸，之後引入東南亞國家。

(七)

香港的外環帶： 購物、水貨、工農業

自八十年代起始，香港工廠北移大陸，本地工業式微。要是仍然採用傳統新市鎮模式的發展方向，政府必須於公共輿論中，提出「再工業化」的議題，維繫衛星城市的中低層生計。然而，歷屆施政報告中，並沒有考慮處理本地工業空洞化的問題。要重振香港的工業，恢復鄉土及城市生態，香港必須要取得新的領地，

管轄區域向北拓展，向北京取得新的租借地或共管地。首先是建議深圳羅湖區成為香港租借地的試點，採用香港制度（稅制、法律、行政），將香港的零售業向北拓展，紓緩香港市區的遊客壓力。這個建議可以拯救香港，也可以推進深圳發展。

實際點看，如今甚囂塵上的幼稚園、奶粉等問題，其實可以透過香港在深圳、東莞一帶實行完全香港化的經濟社會制度，培植出健康的乳品、食物、藥物、教育產業，以免過度需求而令內地人最終因為爭香港商品而出現雙輸局面，然後逐步效法香港金融銀行、外貿物流甚至各產業的管理模式。不過，要完全由香港人管理，則需要內地及中央政府高明的政治智慧和膽量，

工業方面，現時香港的工業基礎並未消滅，只是特區政府有意趕絕。活化工廈更是趕絕工業發展。過往政府沒有好好保護本地工廠，導致產業空洞化。他們沒有看到鄰近地區如何發展。廣東省的發展目標是委託的加工貿易，很多地方均設有保稅區，吸引香港等外資到當地設廠。香港進口大陸的產品，通常要收關稅，但工廠設在保稅區就不收稅。他們因利乘便，吸引外資進口零件，在保稅區加工，組裝後再出口。更為巧妙的地方，乃是當幾個不同的保稅區可以互供零件，只要申請單到香港即可，形成了獨特的「轉廠制度」。^五事實上，日本車廠在香港有生產線，鐘錶珠寶、玩具、高級成衣，在香港仍是大有可為。

香港的工業亦可循高增值及文化創意產品的方向發展。留在本地工業，也可以保存商業貿易的服務技術，否則香港的商貿人才只能有課本知識，難有實踐經驗。此外，食品認證、醫藥認證是香港可以做的精密工業，甚至建立類似「香港工業標準」（Hong Kong Industrial Standard）的權威，使中國產品得到安全保證，建立品牌，也為香港的科學人才提供就業和創業機會。大城邦將來的工業發展，可分為代工（日本汽車）及奢侈品製造。由香港本地公司主導生產意念，交由東莞、深圳等地生產，然後由特區政府游說各省，減低貿易配額，打入大陸市場。如有能力，更可建立疫苗工業，向大陸輸出醫藥品。

農業方面，由於在香港發展農業只是策略性和文化上的，香港的農地不足，但可以保存香港本土耕作，提供高質素的風土食糧，鞏固香港文化形象及推廣科學教育。要旨是保存農業知識的本土基地，支援食物加工、飲食業培訓、青年耕作教育及悠閒旅遊，並非提供足夠食物。另外，香港自廣東省輸入糧食，降低本地的食品價格。多出的，可以利用本地食品加工的方式輸入大陸，惠及低下階層。然後，香港建立農業技術及製造食水，作為輸入大陸及香港兩地的主要交易。農業為主線，所以應先做食物及製成品，以及日常生活品，比如食油、醬油、廁紙等。這批物

品所要求的技術不太高，香港有能力做。此外，政府其實可以在文憑試之後大力推動職業教育，擴大職業訓練學校（如IVF），鼓勵副學士以兩年職業教育為主，培訓人才。

財政獨立，用港幣起始，締建華元區^六

我在《香港城邦論》說過，港幣兌美元不能脫去一九八三年定下的鈎（「八〇港元兑一美元」），對人民幣也不能貶值，港幣對外對內皆失去貨幣政策自主權，成為「雙失」貨幣。中共要借助港幣為外貿屏障，只好犧牲香港的經濟自主權，這是港人被迫的「愛國捐獻」。而香港的地產財閥，則可借港元制度上的缺陷上下其手。他們對外宣稱，港元持續貶值乃美國聯儲局的政策所致。他們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指導港府合作跨境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

將來大城邦計劃生效之際，需要使用港幣流通，並且成為有錨貨幣。貨幣要行之有效，所用的錨（anchor），應該為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遞減速度極慢的物品。黃金最低，白銀次之。兩者皆不會損壞，可循環再用。保值及交易乃貨幣誕生的由來。遞減速度極慢，就可做到貨幣本來的功用：保值。不會損壞、可循環再用，便可做到貨幣本來的功用：交易。

古代由於用貴金屬為通貨，因此保值、通漲與否的標準，就是貨幣的成色，非常簡單。以古羅馬帝國在三世紀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為例，當時帝國行銀本位制。通用的銀幣自奧古斯都以來，成色為 95% 銀，通用了近三百年。及後帝國因外族入侵，內部政變、兵變不斷，導致預算不足，發行劣質貨幣應付開支。最瘋狂時，銀幣不過是鍍銀的銅幣，成色只有 2% 至 5% 。於是資產者將舊幣全數儲藏，避免貶值，市面上盡是劣幣，銀幣購買力大減，導致貨品價格暴增。此情況直至君士坦丁以金本位制取代為止，才得以紓緩。

至於石油，由於價格可以操縱，因此難以保值。上漲與否，非在市場和大眾，而在價值操控者手上。如此，貨幣成了戰爭的工具，而非交易的媒介。美國一九七一年違約關閉黃金窗，直接引發七三年石油危機。之後美國基辛格走去沙特簽定協議，沙特石油用美元買賣，奠定美元霸權地位。可以說，美元的錨是石油。美元的價值，在於美元可以購買石油！這是好多人忽略的： dollar ，油元。石油流量有限，結果印美元做成石油此能源價格大升，通脹飛升。如果用石油的話，經濟就真的受不了。因為石油是工業時代的血液。石油價格暴升，重創工業。黃金價格大升對經濟無害，只是告訴民眾政府正亂印銀紙，財政失控。

六：此節之內容，取自城邦論壇成員的討論，尤其是吳大澂、Kevin PC兩位。

至於人民幣比港幣更為不堪，因為支撐人民幣的錨，正是美債。實行大城邦計劃，貨幣一定要守住，不可亂印銀紙。不過，貨幣改革可以後一步做，先做好香港品牌，以輸出日常加工用品給大陸。就目前來說，港元可有兩種選擇，決定採用何種的錨，減少交易費用。一是重新恢復金本位政策。一是採用張五常教授倡議的「一籃子物品」之貨幣政策。簡言之，便是將一系列的貨物組成一個指數為錨，以變動指數內的貨物價格，用作調整貨幣。有了經濟共同體，分配好資源，港幣就可以在亞洲大玩有錨貨幣，準備締建日後的華元區。在此之前，各地維持自己的貨幣。

用外擴的方式發揚及穩固香港文化

讀歷史，學到的是長遠的視野。九七之後，中共派人下來香港殖民。那些雙非婦、雙非童都是要來衝垮香港的。中共想殖民香港，但只有帝國才可以殖民境外地區的。香港不是西藏，香港是境外地區，而且具備傳統文化和高度文明。中共派來香港的殖民，只是成全了香港的帝國本色，我們庇護了中國的難民。大家看那些來香港討幼稚園申請表的大陸媽媽就知道。歷史的弔詭之處，是香港接收了大陸人，將來大陸就要給香港新的領土。大家留在香港，放長雙眼來看。

告訴各位，香港接納大陸人，不是同情弱勢，而是出於帝國的本性（大英帝國和華夏帝國的本性）。大陸即使領土遼闊，卻不會接納香港人，這是因為中國是個民族共和國。英國在過去，也要香港接收越南難民，這也是出於英國的帝國的本性。新加坡就十分小氣！因為新加坡不是帝國，只是民族共和國，而且還是假裝的那種。歸根究底，就是沒有帝國傳承的文化底蘊。香港得天獨厚，百多年以高度文明來建設城邦，維繫社會穩定，現在修成正果，儼如帝國。其並非如同亞洲其他地區，需要借助國族運動，建構一套「立國神話」，證明起源。

告訴大家，這就叫做帝國主義。香港城邦論，是香港帝國主義的預備。帝國就是將一大群立場不同的人民按區域分隔，然後安排他們秩序，避免他們的利益衝突惡化，使之能持續運行，最終達致這些人民雖不見得達到自身最大的利益，卻能得到各自的均衡利益。這裏所指涉的帝國，比較接近尼德蘭帝國或葡萄牙帝國那一種商業帝國，而不是建立軍事強權的帝國（諸如蒙古帝國、羅馬帝國），也不是那種海權殖民帝國（諸如大英帝國、西班牙帝國）。

香港帝國在華夏邦聯之內，將來的國防由邦聯負責，現在的國防由中共負責。這是中港共榮、華夏復興的大方略，中共要自救，也只能成全香港，由香港帶起華南地區的全面現代化，突破

經濟發展的瓶頸。香港帝國秩序，也歡迎新移民加入。他們也有用武之地。只要香港取得新的殖民拓展區，生存空間擴張之後，新移民就不成問題。中港融合，必須用中港區隔的模式，道理不是很難懂吧？

要行帝國主義要有優越文化和制度資源，香港大城邦建立之後，可游說台灣加入。香港無世家，行事無信心，更無法建立規範，約束政府。台灣、香港合力，靠仿效東歐國家的脫共過程，重建文化貴族成為華夏的士黨。如此香港的大城邦計劃，就成為華夏邦聯的合作基礎。

(八) 結語：香港不是霸主，而是師傅

華夏王朝的「嚴夷夏之防」^七，今日稱之為文化國防。蠻夷處於中土，要嚴加區隔，再作交流，毋須斷絕來往。這情況近似周公平武庚之亂後的政治方略，就是將不服禮樂而作亂的殷民，限制在商墟故地，嚴加監管。不過，周公不叫他們做「蠻夷」，而叫「迷民」，一群被人教壞、迷蒙心性的人民。「迷民」一詞，

語出《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者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語譯就是：上天既然把中國的臣民和疆土託付於先王，今王自當施行德政，以調和、教導殷國的迷民，以完成先王的使命。大陸的人民，正是一群被蘇維埃境外勢力迷惑，以致丟失華夏道德風俗的華民。

儒家論上古九夷，往往以周代邦國為對照。因為上古九夷道一風同，經過周代禮樂的整合，最終變夷為夏，成為周代邦國的世系來源。故此《孟子》文中，雖言上古有東夷、西夷，仍會合稱中國。這是孟子從華夏禮治的整合局面，回溯上古變夷為夏的歷史，同時也在申明禮樂之教、華夷之別。

我以香港城邦論，斥中共為蠻夷，予以區隔；又以華夏邦聯論，說香港居於師位，引領中共復歸華夏，其實亦如孟子的周禮主張，分別在於事成與未成而已。中共之於香港不是域外，而是不肖。懲處不肖，能殺、能逐、能囚、能勸，做法從權而定。《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儒家行道，講求有德有位，香港的華夏遺民是居於城邦，正是有德有位，港人毋須妄自菲薄，只要同心同德，刻苦自勵，香港城邦必可再起，繼而復興華夏，解放東亞。

七：從嚴看待華夏與蠻夷的防備。

Insight 27

香港城邦論II

光復本土

作者 陳雲

出版人 曾玉英

責任編輯 梁澤生、陳嘯軒

書籍設計 Pollux Kwok

封面攝影 Thinkstock

出版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Enrich Publishing Ltd.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 71 號瀝洋工業大廈 2 樓

發行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Enrich Publishing Ltd.

電話 (852) 2793 5678

傳真 (852) 2793 5030

網址 www.enrichculture.com

電郵 info@enrichculture.com

出版日期 2014 年 2 月初版

承印 長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豐業街 10 號業昌中心 3 字樓

紙品供應 興泰行洋紙有限公司

定價 港幣 \$128 新台幣 \$550

國際書號 978-988-16810-4-1

圖書分類 (1) 政治評論 (2) 社會科學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2014 Enrich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支持環保

此書紙張經無氯漂白及以北歐再生林
木纖維製造，並採用環保油墨

Insight 27

香港城邦論II

光復本土

作者 陳雲

出版人 曾玉英

責任編輯 梁澤生、陳嘯軒

書籍設計 Pollux Kwok

封面攝影 Thinkstock

出版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Enrich Publishing Ltd.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 71 號瀝洋工業大廈 2 樓

發行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Enrich Publishing Ltd.

電話 (852) 2793 5678

傳真 (852) 2793 5030

網址 www.enrichculture.com

電郵 info@enrichculture.com

出版日期 2014 年 2 月初版

2014 年 3 月第二版

承印 長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豐業街 10 號業昌中心 3 字樓

紙品供應 興泰行洋紙有限公司

定價 港幣 \$128 新台幣 \$550

國際書號 978-988-16810-4-1

圖書分類 (1) 政治評論 (2) 社會科學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2014 Enrich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支持環保

此書紙張經無氯漂白及以北歐再生林
木纖維製造，並採用環保油墨

「三年前，香港高度自治開始淪落，本土抗爭出現，陳雲適時提出全自治的城邦論述；現在香港全面淪陷之勢漸成，他的光復本土論述，對關心香港前景人士，應是又一次醍醐灌頂的呼聲。」

—— 李怡（《香港思潮》作者）

香港如何突破僵局，訣竅就是四個字：光復本土。

香港是碩果僅存的城邦，而城邦的格局和文化，更是珍貴的中華國族資源。開拓中華天下的宏圖大計，以保存香港的城邦資源最為重要。要保存香港一百七十年的城邦資源，先要重新認識香港歷史，並肯定香港本土文化的價值。香港本土文化以華夏為本，以英國為輔；既保存了華夏王朝的粵語漢音、正體漢字及古雅文言，也接收了英國語文及典章制度，兼收並蓄，發揚光大。

本書繼承《香港城邦論》首部曲，回應當前日漸壯大的本土運動。作者從香港城邦自治切入，呼籲本土意識覺醒，繼而闡述香港所承傳的華夏遺教，以及英國治術的精髓，並勾勒出香港大城邦計劃的藍圖。

香港人不要灰心喪氣、妄自菲薄，只要同心同德，光復本土，香港城邦必可再起，繼而復興華夏。



天窗出版
ENRICH PUBLISHING



天窗網站
www.enrichculture.com



天窗書店App

ISBN 978-988-16810-4-1



9 789881 681041

HK\$128 NT\$550